

品出经济学三味

李仁君 著

三味

获取打开经济的钥匙——经济方法篇
于细微之处看经济——微观经济篇
知经济方能顺大势——宏观经济篇
利害得失皆由经济——政治经济篇
一方水土养成一方经济——区域经济篇
让经济学三味净化生活——经济时评篇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李仁君 著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出经济学三昧/李仁君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17—8958—0

I. 品… II. 李… III. 经济知识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318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陈 骥 (E-mail: Chenliu_bj@Sohu.com)

出版咨询: 电话: 13621098588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 B5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7—8958—0/F · 694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6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真正的经济学，既关注于财富本身又不失于人文关怀，经济学犹如一杯浓茶，虽有几分苦涩，几分神秘，但细品则出三味：一味快乐，二味厚重，三味致用。

经济学的快乐之味

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称“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追求人生的幸福就是追求人生的快乐，这是人生的本能要求和归属，萧伯纳把它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自然是有大师级的感悟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认为，经济学不过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任务当然是最大程度地增进快乐并减少痛苦。

经济学理解的快乐又是一种相对的快乐。不同人对快乐都有不同的理解，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快乐的方程式定义为“效用”与“欲望”之比。因此快乐总是相对的。按照快乐的方程式，快乐应与分子上的“效用”成正比，“效用”大小由财富的大小决定，这样，快乐程度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少是有正的关系的；但快乐还与分母上的“欲望”成反比，这样快乐程度的大小似乎又不与财富的多少成完全的对应关系，倒是和人们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恰合了“知足者常乐”的古训。

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黄有光，也十分强调经济学用“快乐”代替“财富”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按照黄有光的研究，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只能解释人际快乐程度差异的 2% 左右。在人的生命周期中，与人们的通常感觉不同，人在孩童时期还不是最快乐的，而到了壮年或者中年，也就是通常在 30 岁时，人的快乐程度会最低，再往后人的快乐程度又会不断上升，原因是 30 岁时面临着赚钱、养家、职业升迁与否、是否买房子等很多难题，而往后这些因素相继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所以，人一生的快乐程度是小时候和老的时候比较高，而 30 岁时最不快乐。从这个角度看，人在 30 岁压力最大时自杀，最不合算，因为此后人的快乐程度会不断增加。

经济学的厚重之味

经济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一方面，经济学因研究人类行为而被划为社会科学，但它研究的又是人类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由于和财富的关系，远远区别于人类的其他行为，使其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财富和生产关系就不能不涉及数量关系，因而它又兼具了某些自然科学的特性，但经济学的这种数量关系不似天体运动和分子结构这种数量关系的单纯，还掺杂了人间的私利和争斗在其间。故而，经济学需要多种知识的积累，经济学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学好的，经济学必须厚积薄发。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在某种程度是一个数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冷漠和正直。”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构建经济学大厦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一生辛勤著述，但只留下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他还有其他大量的著述，在其临终前付之一炬，据说是怕贻误后人。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而《资本论》还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还不断地与病魔和贫困做斗争，并留下了至理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对于不甘心沉闷，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的人，品味经济学就是一个充满挑战而又生产快乐的过程。

经济学的致用之味

经济学的致用之味出在对生活的面向。经济学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却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其实经济学最直白的道理就是教人如何占便宜的。理智的人对占便宜总是心怀谨慎，因为便宜不好占。但经济学恰恰强调的是，便宜要占，但千万不要单方面占便宜，自己便宜的同时，也让对方便宜。这就是谋求“双赢”的理念。而从理论上证明“双赢”及其实现条件，是由经济学完成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就是经济的一般均衡标准，也是“双赢”的标准。这应该是经济学可以致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

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克林顿的首席战略顾问为了使竞选集中在关键问题上，竟在他的办公室贴了一条标语：“笨蛋，要谈论经济！”当年克林顿大打经济牌而成功入主白宫，而今的世界，经济学家们更加雄心勃勃，正在越来越准确地预测着现实世界的经济走向。同时，经济学家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国政府和总统们的高级顾问。

经济学家投身于改进社会的这一趋势在我国就更加引人注目。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将近10%，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不断攀

升，经济学家功不可没。经济学家们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改革“市场化取向”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倡导增量改革，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同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经济学家们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经济学的致用之味在当代中国会更加浓烈。

经济学的三味，哺育了经济学的魅力：经济学引导人生走向快乐，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经济学的厚重决定了学习经济学是要付出努力的，但谁说努力的过程不是一种收获呢？经济学之致用不仅体现在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还关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

目 录

获取打开经济的钥匙——经济方法篇

1. 经济分析中的人：理性与概率	3
2. 假设本身并不重要：抽象分析法	5
3. 石油还能用多久：边际分析法	7
4. 均衡与社会和谐	9
5. 抢购风波与预期心理	11
6. 看不见的手	13
7. 看得见的手	15
8. 能相信经济学家吗？	17
9. “合成谬误”与“理性冲突”	19
10. “分解谬误”与“整体改革”	21
11. 经济学与数学的不解之缘	23
12. 经济学如何改变历史	25

于细微之处看经济——微观经济篇

1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29
14. 鲁滨逊的选择：生产可能性边界	31

15. 交易与拍卖	33
16. 从买车来看需求	35
17. 促销中的艺术：需求价格弹性	37
18. 从捕鱼话供给	39
19. 机会成本与农民盖房	41
20. 成本与收益	43
21. 吃苹果与看晚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46
22. 需求法则的反例：吉芬商品与吉芬效应	48
23. 搬家的学问：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51
24. 消费者剩余与买东西的乐趣	53
25. 你钱多了会花在哪里：需求收入弹性及其政策含义	55
26. 边际收益递减的故事	57
27. 歧视的后果	62
28. 游戏与市场进入	67
29. 囚犯难题与机制设计	69
30.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71
31. 反盗版中的帕累托改善	73
32. 让大家受益的事谁来做	77
33. 假如由别人来买单	79
34. 民主的魅力与缺陷	81
35. 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	83

知经济方能顺大势——宏观经济篇

36. GDP 告诉你	89
37. 蜜蜂的寓言与扩大内需	91
38. 时间偏好与贴现率	93

39. 利率升降与股市涨跌	95
40. 股市中的赢家	97
41. 投资给我们带来什么?	99
42. 借钱消费为哪般?	101
43. 跨期转移与跨代转移	103
44. 投资买房是不是时候?	105
45. 假如没有货币?	107
46. 为什么钱多了物价却没有上涨	109
47. 把钱拿在手上:货币需求	111
48. 问钱天下有几多:货币供给	113
49. 由穷变富的学问: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理论	115
50. 把钱埋在地下:乘数效应	117
51. 加息时代灵活理财	119

利害得失皆由经济——政治经济篇

52. 中美两国粮票的比较	123
53. 美元与经济秩序	125
54. 从柜台小姐拒收退款看制度的完善	127
55. 迂回生产+效率: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129
56. 集体行动+平等: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131
57. 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什么	133
58. 从“三讲”到“三个代表”	135
59.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误分	138
60. 市场经济与雷锋精神	142
61. 服务的层次	146
62. 从伊拉克战后重建说起	148

63. 我看萨达姆的被捕	151
64. 美国应从反恐中实现五大转变	155
65. 非典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157
66. 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十六大报告分配专题解读	159
67. 和谐社会古今释义	162
68. 新技术、新制度、新保障与农村建设	167

一方水土养成一方经济——区域经济篇

69. 比较优势与海南发展	171
70. 海南产业发展如何避免“荷兰病”	173
71. 订单农业做大做好的方向:农产品期货交易的作用	176
72. 学者扶贫与计生宣传	178
73. 生意人的生意经	180
74. 生态保持与经济发展孰优先	182
75. 粤海铁路通道对海南发展的影响	184
76. 构建儋州先进文化的几点思考	193
77. 在逛街中体味集聚效应	200
78. 海南产业政策的演变	202

让经济学三味净化生活——经济时评篇

79. 购物券利弊谈	207
80. 机票打折中的悖论	209
81. 谁决定了茶馆的暴利?	212
82. 农民毁田烧砖的背后	214
83. 从杀猪示信说起	216

84. 经济学视角中的剥削	219
85. “终身雇佣制”的启示	221
86. 赢家通吃的悲哀	223
87. 我们为什么还不是节约型社会	225
88. 当创新成为一种意识	227
89.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229
90. 如此省钱为何没能奏效？	231
91. 由吕布之死说起	233
92. 从经济学看和珅的媚上欺下	235
93. 己所不欲施于人	237
94. 对牛弹琴的后话	239
95. “为”不是“不为”	241
后 记	243



获取打开经济的钥匙

——经济方法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 经济分析中的人：理性与概率

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行为假定。在经济学家眼里，人们出于本能地追求自身私利的行为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要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呢？因为经济分析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实现某种最大化。

人是生存在一个稀缺性世界中的动物，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有道是：天上不会自动掉馅饼，免费的午餐并不存在。人们必须通过付出才能得到，但人们也不会长期做无效的付出，只有在付出带来的好处大于此付出的代价时，人们才会选择付出。人们心中的这本账就是成本收益计算。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而能做成的事情却很有限，因此便只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一个经典性的难题所提出的：“假如你的老娘和女友同时落入了湖中，在只能救一人的情况下，你会救谁？”若将这一问题询问不同的人，也许答案会各不相同。譬如，第一位先生说：“我会救老娘，因为老娘今生今世只有一个，女朋友嘛，以后还可以再有！”而第二位先生则说：“我会救女友，因为老娘会游泳！”

由此看来，这两位先生自然是有一些不同的。第一位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亲情至上主义者，而第二位先生则是一位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了，但这并不妨害他们两位都是理性的，在紧急情况下，他们都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假如他们在此紧急情况下，不是如此而是惊慌失措，既想救老娘又想救女友，结果两个都救不了，那才叫不理性呢！

理性也是在一定约束下的某种最大化，按照经济分析的逻辑，抽象的最优状态是不存在的，理性的人也只有现实中的种种约束下去寻求最优的状态。在前述的难题中，将老娘和女友都救上来岂不是更优的结果吗？但在实际给出的条件下，这又是极不现实的想法。因此两位当事人就只能在只救一人的约束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条件下，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具体来说，第一位先生在此约束下选择救老娘是一种最优选择，因为他是亲情至上主义者，所以选择救老娘；而第二位先生在老娘会游泳，而女友不会游泳的条件约束下，选择救女友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务实的最优选择。

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如果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实中怎么还会发生种种似乎是不理性的行为呢？比如，大家都知道酒后驾驶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可交警总是经常查到有人酒后驾驶？人不是理性的吗，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里我们需要把理性和概率联系起来分析。从个人驾驶的角度来看，这种危险性始终只是一种概率，而并非必然发生。假如这个概率为1%，那只是意味着他每酒后驾驶100次，可能会发生一次事故，因此，一个理性的个人也完全有可能冒一冒这个险。

但若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酒后驾驶却是十分可怕的行为。因为如果社会每纵容100次酒后驾驶，根据1%的概率，总会出一起事故，尽管其他99次没事。所以，从全社会的角度，交警严查酒后驾驶也是理性的选择。由此我们看到，个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有时还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

2. 假设本身并不重要：抽象分析法

在茫茫沙漠中，烈日当头，几个饥饿交迫的学者由于没有工具，面对一堆罐头食品与饮料一筹莫展。于是，他们讨论如何开启罐头。物理学家说：给我一个聚光镜，我可以用阳光把罐头打开。化学家说：给我几种化学药剂，我可以利用它们的综合反应来开启罐头。经济学家则说：假如我有一把开罐刀……

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对经济学家的嘲讽，因为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是总是依赖于一大堆假设。于是乎好像百无一用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最不是一门科学。但把经济学的假设作为一种方法来看，却是经济学家常用的一种抽象分析，其目的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最终得到研究结论。

其实，上面那个故事并不能说明只有经济学家的分析才利用假设，物理和化学不也是在空想么？试想，在沙漠中，如果连开罐刀也没有，又何来聚光镜和化学药剂？难道物理学家和化学学家会随身带着这些东西么？他们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本行来假设罢了，在茫茫沙漠中一样不能奏效。

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学家的假设最直接就觉得它最没有可能。相反，如果回到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的假设无疑是最容易与现实相符的，最易为人所接受的。这个故事只能说明经济学更加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般高深莫测。它所假设的内容平时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此，经济学家最能挖掘假设对理论的巨大作用，根据弗里德曼提出的假设不相关命题，即使假设本身是不现实的，但并不影响以之为手段得到正确的结论。

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分析，似乎又是经济学不得不做的选择。马克思说过：“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济，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此语道出了抽象分析对经济学的重要性。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假如你要去美国旅游，但对美国又不熟悉，为了全面地了解美国，你可以找到一张美国航天局制作的卫星地图，它虽然完整地记录了美

品出经济学三味

国的山山水水乃至一草一木，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由于它信息太全面了看了以后反而一无所获。

于是，你又找了一张美国旅游局制作的旅游地图，这是一张经过大量删减的地图，它不再详细记载到美国的一草一木，而只记载了主要的山脉、河流、道路、城市等有限的信息，但正是这张有限信息的地图却能给你以帮助，使你能够了解美国。这里的旅游地图是经过抽象和简化了的地图，一般的图都是有比例尺的，比例尺就起到了一个抽象和简化的作用，这正说明了生活中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需要比例尺为 1 比 1 的地图。

经济学的方法需要假设，但不意味着经济学只会停留在假设上，一定的假设只不过是得到了最终结论的手段，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往往是在不断放松假设条件并步步逼近真实的过程中取得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们认识问题总是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正如上述例子中，你在旅游地图的引导下进入了美国，但最后不会受到地图的束缚，你完全可以真实地饱览美国地图上并没有记载的山水草木。

3. 石油还能用多久：边际分析法

自从石油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主要靠丰富的低价石油推动了经济车轮的前进。尽管地质勘探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但所探明的新的石油储量明显减少，因为现有石油消费量同新勘探到的石油量的比例是四比一。在不久的将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终都会面临石油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假设地球上还有的石油储量都能被探明，比如说总共还有 20000 亿桶，而全球今后每年平均消耗 250 亿桶，那么全球石油还能供人类使用多少年呢？

这个问题似乎是太无聊了，因为哪怕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通过简单的计算也会得出还能用 80 年的结论。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未必是正确答案！虽然要准确地说出全球石油还能供人类使用多少年还受制于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而不大可能，但仅根据上述所提供的条件而论，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绝对少于 80 年。也许你有点奇怪，在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引入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

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法强调的是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去买烧饼，连续吃了五个才吃饱。于是，他感慨地说：“早知道这第五个烧饼可以充饥，当初只买这个就好了！”这个饿汉的结论虽然滑稽，但这里还是显示了边际分析的重要性。应当说，这五个烧饼本身是没有区别的，但在人们消费的过程中却是最后一个烧饼决定其价值。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消费感受中，最后一个烧饼具有决定性作用。

边际分析强调下一个或最后一个最有用，这个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大量运用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一批工程师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运动，这被称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在此以前，经济学家们饱受“水和钻石之谜”的困惑而不能自解。因为一部分经济学家深信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由其效用（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程度）决定的。但水和钻石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水是生命之源，人们一天都离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不开它，效用可谓极大；而钻石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可有可无，一辈子没有也没有大的关系，可谓效用极低。但在现实中，钻石通常比水贵得多，这就形成了悖论。虽然按照“物以稀为贵”的谚语，人们可以说，钻石比水要稀少，所以，钻石比水要贵，但按照经济学理论的要求，这正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而边际分析法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边际分析法，不是全部而是最后一个单位决定事物的价值。从起点来看，第一单位水的价值无疑是非常高的，但由于通常情况下水的数量极其丰富，到最后，一单位水就递减得不值什么钱了；而对钻石来讲，第一单位肯定不如水的价值高，但由于钻石的数量极其有限，到了最后一单位，钻石的价值就再也递减不下去了，这就形成了钻石的昂贵。“水和钻石之谜”由此得以破解。

现在再来看全球石油还能用多久的问题。石油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能源。尽管最近有科学考察表明，这种能源在地球上依然在不断生成，例如在墨西哥湾、黑海等，但其生成的速度，不是以年计算，而是要用地质年代来计算。所以我们只能以全球目前的 20000 亿桶石油储量为考虑对象。目前由于石油的储量还算丰富，所以人们使用的石油以其使用方便和价格低廉而远胜于其他能源。但在今后的石油开发过程中，随着石油数量的不断减少，其开采的难度会越来越难，石油开采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也就是说，不用等到 20000 亿桶石油开采完，在边际上，石油因其开采成本递增而价格会变得十分昂贵，以致于和其他能源相比，特别是新能源的使用，石油已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因而必然被人们所弃用。这就是在给定条件下石油为什么不能使用 80 年的原因所在。

4. 均衡与社会和谐

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理解为一种社会状态的话，我们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做些解读。鉴于此，我们对“和谐”的理解不可静止化，而要从其背后把握其中各种参与力量的均衡性质。

和谐是各种力量交互的结果和状态。均衡这一概念源自物理学，原指物体受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种作用力之下保持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来，均衡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指经济现象在多种经济力量作用下保持稳定的状态及其条件。现在，我们也可用这一概念解释社会和谐。

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都会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只要社会是和谐的，这些力量的交互就会达成均衡。但这里的均衡也可以理解为制衡，和谐社会的均衡是需要一定的制衡机制的。在这个机制中，社会各种势力应当是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赖的。

其中的关键是，在这个制衡机制中，是不能出现凌驾于一切力量之上的超级力量存在，否则，社会的和谐便不能稳定。我们注意到，在儒学形成的封建社会里，和谐理论常在，和谐社会不常在。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存在至高无上的皇权。明君圣主可遇不可求，和谐社会便不常有。在这种体制中，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够以民为本。

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意为：“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其意为：“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由此，我们也不难悟出，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多么地重要。

由此可见，“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立足于一定的文化的。这种文化就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和为贵”文化，强调：“天和”、“地和”、“人和”。与此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对立的是斗争文化。斗争文化是“斗为纲”，崇尚：“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么说，和谐文化是否意味着完全放弃斗争？也不是！和谐文化也不能排除斗争，人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矛盾、冲突和纷争，因此，和谐中也有斗争。但不同的是，和谐中的斗争始终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这是为实现和谐而进行的斗争。而且，在和谐文化中，斗争也是讲原则的。

《论语宪问》中记：“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意为：有人说：“以德行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啊？”孔子说：“那用什么来回报德行呢？不如以正直回报怨恨，以恩德来回报因德。”在这里，“以直报怨”不同于老子的“以德报怨”、佛家的“以身饲虎”，而接近法家的赏罚分明。

斗争文化就不一样，斗争本身就是目的，是为斗争而斗争，因为在这种文化中，斗争本身就充满了乐趣，斗争本身就是第一需要。在这种斗争文化下，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制造敌人，也要斗。

过去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与天斗，违背了自然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灾难性破坏；与地斗，损害了生态环境，过度耕牧，植被破坏。结果，土地沙化，沙尘暴肆虐；与人斗，阶级斗争扩大化，右派遍地，冤案连连，结果：百业俱废，九州迷茫。

以上关于和谐文化和斗争文化从来都是和经济学不相脱节的。在19世纪这两种文化在经济学内的交锋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提出“经济和谐论”，这种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各种生产要素通合作创造财富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各参与者的利益是协调一致，因而是和谐的。巴师夏的这种思想为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并在西方成为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斗争文化融入经济学，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分析范式，这就是立足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学说，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中，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生产关系的对立运动，以批判的姿态来审视现存的社会。两种文化在经济学范围内的分歧是20世纪的主题。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我们为阶级斗争所困扰，现在我们到了要以建设和享受和谐社会的时代了。

5. 抢购风波与预期心理

2003 年年初广东河源市发现了一种不明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后来被诊断为“非典型肺炎”，由于该病具有传染性，因而引起了恐慌，抢购药品的人们在河源各大药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全城药店的抗病毒药品很快脱销。与此同时，各种夸大其辞的谣言也不胫而走。随后中山市也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病例，病情和谣言在中山市也流传开来，并很快在广州市也形成了恐慌，市民对药品的抢购导致了各种防感冒、抗病毒的药品异常火爆。此后，通过各种形式，这种恐慌和抢购药品的风波迅速蔓延到周边省市。这种风波也波及到了海口，后来海口市也发生了市民抢购板兰根、食盐和粮食等的行为。针对市民抢购所造成的某些药品和粮油价格上涨，有关部门采取了限制价格、投放市场、加大宣传和正确引导等一系列措施。现在这一风波已基本平息，但其中还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预期的因素。预期就是人们对未来的看法。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人们的预期必然会影响到他的经济行为中去。当然，经济学家们把人的预期因素引入经济行为中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静态预期是一种最简单的预期，即人们认为本期将要发生的事可能会和上期相同而做出的一种预期。比如，因为去年“情人节”时，你的爱人给你买了件惊喜的礼物，那么你就会预期，他（她）在今年“情人节”时，还会送你惊喜的礼物；通常人们说的“买涨不买落”就是这种静态预期的作用，因为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某种东西的价格昨天涨了今天还会涨，所以越涨就越买；在股票市场中“追涨杀跌”也是这个道理。

适应性预期是比静态预期又有所发展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人们将会根据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感受来调整其对未来的看法。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草绳”就是适应性预期的作用。通过体会被蛇咬的滋味，改变过去不小心的做法，加强了对蛇的警惕。再如，在劳资关系中，雇员和雇主签订了工资合同，但没想到物价上涨，实际工资大幅下降，结果雇员损失惨重，那么“吃一堑，长一智”，在下次签合同同时，雇员就会坚持把考虑物价因素的附加条款加进工资合同里。

理性预期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预期，它把理性人的假设发挥到了极点。按照理性预期假说，人们能够在事先通过利用各种可得到的信息，做出合乎实际的预测，从而决定自己的对策。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期叫做‘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假说并不能保证人的预测总是与事实相符，但它却充分体现了人能够未雨绸缪的主观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升，给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以沉重打击，而日本则通过理性预期从中获得了好处。日本人率先设计出低耗油型的汽车，从而在世界汽车市场占居了有利地位。

从这次广东河源市传出的抢购风波来看，也有一定成份的理性预期因素。传染病刚爆发，便有一些商家预期药品及粮食会涨价，便大量进货迅速供应市场，这些商家可能会赚钱。但正如前面提到的，理性预期也并不能保证总是正确的，由于判断失误，预期可能是错误的预期；另外谣言的误导也可能导致错误的预期。比如，在这次抢购风波中，有不少人相信“非典型肺炎”会通过米油盐传播的谣言，于是在粮油盐供应稳定的情况下，发生了大面积哄抢米油盐的非理性行为。在权威部门公开澄清“非典型肺炎”是通过空气传播，而非通过米油盐传播的事实后，错误预期消失了，抢购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在抢购风波后期仍然大量进货的商家，最后存货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成了“烫手山芋”，这也是他预期错误的代价。

6. 看不见的手

在市场经济中是价格机制调节着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市场经济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极力去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能取得符合社会需要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价机制就像一只非常尽职的“看不见的手”，自觉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早在 1776 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形象地描述过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说：

“每个人都力求用他的资本，生产出最大的价值。一般而言，他既不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促进多少。他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所得。正是这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实现着他自己并不打算实现的目标。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常常能够，与有意去促进相比，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公益。”

通过“看不见的手”，人们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极大便利，虽然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的敏锐感觉。但是，一旦“看不见的手”被压抑，价格机制被人为地扭曲，由此导致的非常岁月则又让每一个有记忆的人难以忘怀。以广东地区在“吃鱼难”问题上发生的变迁为例，来反思这一问题是最恰当不过了。

我们都知道，广东是个鱼米之乡。但在改革开放前鱼米之乡也照样缺鱼少米。广东城镇居民，买粮要凭粮票，买鱼则要凭鱼票。就拿买鱼来说，虽然鱼价非常便宜，但普通居民买鱼却是一件难事。但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成年的广州人，都会记得为了凭票购买四分之一条鱼而半夜三更排队的情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在计划体制下，农副产品实行“统派统购”制度，广东生产的塘鱼，购销价格长期不变。广州居民所消费的塘鱼，几乎都由珠江三角洲的农村进行生产和供应，并且作为任务来完成。在固定上调的价格之下，农民迫于行政部门的派购计划不得不进行生产，但只要交售了派购数量就完



品出经济学三味

事了，而对供应品种和供应数量的增加不感兴趣。因此，在广州等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吃鱼难”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为了解决“吃鱼难”问题，取消了对塘鱼购销价格的管制，还对“统派统购”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多渠道经营并且放开了价格。在改革后的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广州市场上的塘鱼价格曾一度大幅攀升，鱼价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令人骂街的程度。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价格上升所导致的塘鱼生产有利可图，又强有力地刺激了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在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增加塘鱼生产的热潮。

经过一段时间的供给扩张之后，市场上对塘鱼的供需大致趋于平衡，价格从高点回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致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这时，塘鱼生产者之间在塘鱼品种的增加和销售方式与态度的改善方面展开了竞争，而使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增加，并得到了更方便的服务。从广东在20世纪70年代末放开塘鱼价格到20世纪80年代中，整个水产品的生产数量增加了5.13倍，品种则从原来的10多种增加到70多种。长期困扰着广州等城市的“吃鱼难”问题，终于在改革开放下得到了解决。

从广东解决“吃鱼难”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脱出来的政府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件，它只需要放开管制，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就完成了由“鱼价低，吃不到鱼”到“鱼价低，吃不完的鱼”的变迁。

7. 看得见的手

亚当·斯密以后，理论家们从各个角度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深入人心，没有人感到怀疑。人们深信“看不见的手”的良好运行，而政府当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行了。这种“守夜人”的角色只要求政府做好三件事：保护本国不受外国侵犯；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不受他人侵犯；建设和维持一些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

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强调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市场经济以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前辈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整整160年后，发表了一个新的学说：他认为，市场经济中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总体经济倾向于萧条的内在原因。因此，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应该全面干预经济的思想。从而，将“看得见的手”引入市场经济中。

“看得见的手”的学说把政府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提升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角色。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以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宏观调控可分为两种，当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的宏观调控；当经济萧条时，则实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主要是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财政政策则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通过收入和支出政策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看得见的手”。

我国在1994年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高达24.1%，当时我国就采取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成功地把过热的经济降了下来。1997—1998年，我国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价格水平一路下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当年居民储蓄存款达到5万亿的高水平。为此，国家首先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1997下半年开始至1998年，中央银行先后六次下调利率，以刺激消费，但居民存款仍不见减少。仅靠货币政策不行，接着国家实行了扩张性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的财政政策。1998年8月国家增发1000亿国债，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这一举措保证了我国在当年外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内有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还实现了7.8%的经济增长率。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暴露出“看不见的手”无法自行解决“市场失败”问题，因此，“看得见的手”要求政府成为“市场失败”的“纠正者”。“市场失败”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一个人或企业的行为使他人受到损害或得到收益，但该个人或企业并不会为此支付成本或获得补偿。外部效应既有正负之分，也有生产和消费之分。比如，一个化工厂的生产排污影响了自来水管的正常生产，就是生产的负外部效应；而养蜂业的发展使邻近的一个果园产量提高，就是生产的正外部性。再如，一个抽烟的人给另一个与他同室的不抽烟的人带来的痛苦，就是消费的负的外部性，而一个人买的一盆花给他的邻居带来的心情愉悦，就是典型的消费的正外部效应。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效应，特别是负的外部效应，“看不见的手”无能为力，必须通过政府的立法、税收以及补贴等这些“看得见的手”去解决。

除了“外部效应”导致“市场失败”之外，还有垄断和收入分配也会产生“市场失败”。市场经济中，由于优胜劣汰，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导致了低效率并损害了公众的福利，但市场本身并不能消除这一问题。同样，市场竞争会形成收入分配不公，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富人可能拿着优质的牛奶喂狗，而穷人的孩子连最劣质的牛奶也喝不上。这也是市场本身无能为力的。所有这些必须求助于“看得见的手”去加以纠正。

现代市场经济呼唤“看得见的手”，但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为谬误。事实证明，政府干预过度也会导致“政府失灵”，产生官僚主义和行政效率低下。“看得见的手”并不能完全取代“看不见的手”，正像“看不见的手”不能包办一切一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市场加政府的混合经济，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看得见的手”，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解决好那些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8. 能相信经济学家吗？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家的名声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一些讽刺经济学家的段子正在层出不穷地以各种方式涌现出来。在一些手机短信和网络笑话中，经济学们常被指责为一帮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古怪的人物。

记得有这样一个段子：

叶利钦有 100 个保镖，其中有一个想谋杀他，叶利钦不知道他是谁；克林顿有 100 个经济学家，每次决策前克林顿都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但是每次只有一个人讲对了，糟糕的是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如此看来，克林顿的麻烦比叶利钦更大。

鉴于经济学家之间互不信任的事实，也有人总结了所谓的“经济学家第一定律”：对于每一位经济学家，在这个世界一定能找到另一位和他实力相当，但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还有人把经济学家的危害做了进一步的推论：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业余经济学家；而唯一比业余经济学家更危险的，是职业经济学家。还有的段子认为，虽然经济学家讲的都很正确，但是却没有用处。

说是有两个热气球爱好者乘坐气球，结果被大风吹得偏离了方向，于是他就将气球的高度降低，以便找一个人问问现在飘到哪里了。这时候刚刚过来一个人。一个热气球爱好者问道：“请问我现在在哪里？”那人回答：“你现在在热气球下面。”这时，另外一个热气球爱好者说：“这个回答完全准确，但是绝对毫无用处。坏了，我们碰到经济学家了！”

类似的段子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出。然而我总是认为，这些段子如果不是来自对外人对经济学家们的一定程度的以偏概全，就是出自经济学自己颇具搞笑意义的自嘲。经济学家自己有时也对自己的学生调侃：“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不失业；但是，当你失业时，经济学可以让你明白你为什么失业。”

讽刺归讽刺，调侃归调侃，不管怎么说，经济学家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着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曼昆的那本流行的经济学著作中，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篮球巨星乔丹剪草坪要比邻居家的小姑娘又快又好，乔丹如果利用剪草坪的时间去做其他工作，比如拍商业广告片，可赚1万美元；同样长的时间，如果邻居小姑娘去麦当劳打工，可以赚20美元。那么乔丹应该自己剪草坪呢，还是应该请邻居小姑娘帮他剪草坪？

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乔丹不应该自己修剪草坪，而应该请邻居小姑娘帮他剪草坪。但是有人对此曾向我提出了质疑：

“经济学考虑某些问题只从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人们在从事活动的兴趣所在。如果乔丹是真的喜欢修剪的话，或者说修剪草坪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损失1万元又何乐而不为呢？健康和个人喜好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所以是不是可以不只从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一个可以参考的回答是：这决不是经济学家的错。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经济学家有时表现出的惊人的智慧。

说是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一同外出乘车旅游。去的时候，三个数学家买了三张票，而三个经济学家只买了一张票，数学家心想：“这下经济学家要被罚款了”。但是，当查票员过来时，三个经济学家一起躲进洗手间。看到有人进了洗手间，查票员就紧紧跟到洗手间门口敲敲门，躲在里面的三个经济学家递出一张票，查票员看看就算了。数学家们觉得这是一个节省开支的好办法，于是，在回来时，三个数学家只买了一张票，准备如法炮制。奇怪的是，三个经济学家连一张票都没有买。上车后，数学家一看到查票员就躲到洗手间，当数学家听到敲门声就把买的一张票递出来，但是票并没有还给他们。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敲门后把票拿走，并躲到另外一个洗手间里去了……

在乔丹修剪草坪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比普通人高明的地方不在于是否考虑利益之外的因素，而在于经济学家区分了乔丹的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的乔丹”和“作为消费者的乔丹”。乔丹不应该剪草坪的结论显然是对“作为生产者的乔丹”的描述，尽管他比邻居家的小姑娘剪草坪又快又好，但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必然是乔丹不剪草坪；如果“作为消费者的乔丹”去剪草坪，那已经和生产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消费行为，他不管是出于陶冶情操，还是修身养性，或是什么别的原因，都不影响他的这种消费性质。注意：乔丹剪草坪和园丁剪草坪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消遣，后者是一种工作。我们说乔丹不应该剪草坪是从工作的角度，而并不是从消遣的角度。看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济学家。

9. “合成谬误”与“理性冲突”

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因为从人性的角度，他深信“人是理性的”行为假设，即“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既然“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并能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引导着个人从自利行为向公共利益自动促成，那么，市场经济就不会出现问题。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一致性的初期景象。由自利行为驱动的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在人间的一再上演，迫使人们怀疑“看不见的手”是不是总能靠得住？

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十分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第十四版）提出了“合成谬误”的命题。其在经济思维方法上对“看不见的手”的修正意义十分鲜明。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一章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就是“合成谬误”。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合成谬误”问题。比如：1. 个人在经济萧条时试图多储蓄一些，可能会减少社会的总储蓄。2.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他的境况变好；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没有一个人的境况会变好。3. 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它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4. 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萨缪尔森通过“合成谬误”强调了与“看不见的手”相左的基本原理，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或日常生活中，对个体来讲是正确的事物、事情，对总体来讲则不一定正确”。其原因在于：“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结论的取得是存在前提条件的，而这一前提条件在总体情况下却不一定也存在。正是由于前提条件的不同，所以我们在分析“总体”事物或现象时要小心谨慎，不能简单地将“个体”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照搬过来。这就如同经济学中“囚徒困境”的故事。

“囚徒困境”说的是甲、乙两人涉嫌犯案而被警方关押。在审讯中两人分别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被告知：如果一人招了供而另一人不招，招供的那个人将免罪获释，不招的那个人被重判 10 年徒刑，这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人都招供，有可能各判 8 年徒刑，这是因为双方扯出了更多案件的结果；如果两人都不招，则因证据不足而各判 2 年。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很显然，甲、乙两人思前想后，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招供的选择。这种做法虽然对双方各自来说都是想谋求最好的结果，可以看做是一种“个人理性”；但实际结果却是他们最糟糕的，是典型的“集体不理性”。因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构成了一种“理性冲突”。

“理性冲突”和“合成谬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包涵的经济学思想能够深刻地揭示一个组织运行绩效的根源。比如：一支球队老打不出好成绩，人们往往会从体能、技术、体制等因素方面分析，可实际上真正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某种文化传统下的“理性冲突”和“合成谬误”，当球员在赛场所想的只是自己的风采，或是自己的位置，或者是在俱乐部的前途的时候，这支球队就不会有希望了。一个在个体之间热衷于窝里斗而不善于团结的国家或民族，其凝聚力和战斗力一定是不强的。

10. “分解谬误”与“整体改革”

萨 缪尔森提出了“合成谬误”，即“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错误的。这里相应地提出“分解谬误”，即“将一个问题的整体分解为几个局部，虽然可以使问题简化，但往往会造成谬误”。这就如盲人摸象。四个盲人不能目睹大象的全貌，只能通过摸象来感知。这种通过由整体到局部的分解虽然让盲人感知了大象，但却难免不以偏概全。摸了象身的盲人认定大象原来像一堵墙；摸了象牙的盲人坚信大象像圆滑的棍子；摸着象腿的盲人坚持大象像柱子；而摸着象尾的盲人则声称大象像根粗绳子。而实际上，对大象的全面感知必须把四个盲人的感知加以合成才能形成。

通过分解使问题得以简化这一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最先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分工”作为讨论的开篇，并将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或者说国家富裕的动因总结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亚当·斯密看来，分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亚当·斯密还举了一个很经典的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

分工使劳动者的专门化成为必然。“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

■ 品出经济学三昧

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

亚当·斯密也许过分关注于分工带来的巨大收益，而无视了任何分工背后的分解过程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马克思在对分工问题的理解上，就明显高于斯密。马克思不仅更详尽地分析了分工推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更加注重了分工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对分工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迁，通过“局部工人”这一概念揭示了劳动隶属于资本的程度随着分工的深化而加深的趋势。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

“分解谬误”提醒我们，当我们通过分解使问题得以简化时，不能无视“分解”造成的负面后果。比如，我们国家由传统体制转型为市场体制，这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复杂工程。改革之初，我国采用渐进改革就是一种“分解”，通过这种“分解”，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跟进；农村改革先行，城市改革跟进。这种“分解”无疑减少了改革的摩擦，降低了改革的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分解谬误”也告诉我们，改革不能永远处于孤军深入的状态，改革也要整体推进，相互配套，否则，“分解谬误”就会产生，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被“窒息”。因此，我国的体制改革是到了方方面面齐头并进的“整体改革”时候了。

11. 经济学与数学的不解之缘

当年诺贝尔设奖，据说因个人恩怨惟独没有考虑数学，着实让那些数学大师们扼腕叹息，但自从196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增设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举最大的受益落到了数学家头上，从此以后，数学家频频以经济学的名义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近年来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地强化。有人统计，从数学家纳什开始，从博弈论这座“金矿”中淘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数十位之众。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近一半以上是数学出身。这让正统经济学院毕业的人多少有点无可奈何。以往有人常抱怨“经济学帝国主义”，指责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现在看来，经济学本身也正在被“侵略”，“数学”几乎占领了所有经济学科的山头。面对一排排的数学符号和在各种假设中制造出来的数学模型，经济学的门槛现在变得越来越高。

实际上数学大规模地与经济学联姻，还要提到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一批工程师将微积分引入经济学而开创了边际分析，经济学也因边际分析的引入，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这就是边际革命。

经济学研究的人们的经济行为规律离不开经济变量的关系，而经济变量的关系必然也是数量关系，要精确地确定这种数量关系，数学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经济学便朝着不断有利于数学家的方向发展。由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应该两方面看。

一方面经济学的数学化使经济学朝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一门科学在架构自己的理论时必须符合逻辑，而数学是对逻辑的抽象，是最简洁，最美丽的逻辑。所以当这门科学成功运用数学时，它将会迎来辉煌。马克思也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数学可以避免繁琐的文字性逻辑语言而带来的不方便，

品出经济学三味

规避对文字性逻辑语言容易产生的曲解，甚至可以加速逻辑推导，加快理论研究的进程，所以，经济学的数学化有其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用数学代替经济学，还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盛行，甚至产生了相反的问题，那就是数学的误用和滥用。人们担心在经济学中仅仅为了数学而数学，或是用精美的数学去包装那些原本就没什么意义或者根本就不正确的东西，那么，这种经济学的数学化反而是误入歧途。

举例来说，假设有人提出一个命题说吃中餐有利于乒乓球的比赛成绩。这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这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像经济学的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是运用数学方法的，但是数学方法的运用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仅仅依靠数学的方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比如，为了证明吃中餐有利于乒乓球的比赛成绩，人们可以搜集很多样本，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检验，根据目前世界乒乓球的现实，要解释乒乓球的比赛成绩和吃中餐有高度相关的关系并不难，仅从数学的角度检验，二者也许是严格的高度相关。但是这与事实并不符合，在乒乓球的比赛成绩的解释因素方面，肯定有比吃中餐更有解释意义的变量存在。如果相信了从数学上得出的乒乓球的比赛成绩和吃中餐高度相关，模型就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即我们不能说乒乓球打得好的都是因为吃中餐的缘故。这是统计上的相关而绝不是理论上的因果。所以，经济学的数学化一定是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会有实际意义。

12. 经济学如何改变历史

一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不断突飞猛进的历史。自从经济学产生之日起，经济学家就在改变历史并继续改写着历史。

亚当·斯密一本《国富论》（1776年）不仅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科学，而且书中阐述的关于财富的学说，开辟了人类社会财富聚集时代的到来。由于亚当·斯密的财富学说首先在英国普及，英国自然率先实现了富国强兵，从而进入了新时代。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后不到100年的时间内，英国成为无与伦比的大帝国。据统计，1860年前后，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消耗的现代能源是美国的5倍、法国的6倍、沙俄的155倍。英国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全世界1/3的商船飘扬着大英帝国的旗帜。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凡是地图上涂有粉红的地方都有是大英帝国的领地，其领地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余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统治下的领土和人口总数都达到了全世界的1/4。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不仅成就了英国，而且对整个世界影响极大。所以，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赫然有名。

同样作为经济学家被收录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也许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在马克思逝世后大约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至少在名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已超过13亿。这个数字在人类史上比任何皈依其他思想体系的信徒还要多，从占世界整个人口数字的比例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

英国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虽没有入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但他也同样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凯恩斯在1936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及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此举不仅奠定了凯恩斯本人作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地位，而且其理论在二战以后被大部分国家所采用，造就了发达国家在战后长达 20 多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的“黄金时代”。其意义不可谓不显赫。

其实，凯恩斯的敏锐早在一战之后就已经显示出来，只是当时人们未能领会而已。

一战以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得胜的同盟国所要求德国支付的赔款用今天的货币计算达到惊人的 2000 亿英镑，它们还对德国工业施加了种种限制。和当时许多人的观点不同，凯恩斯不同意对德国采取这种过分的措施，他认为德国是被迫支付它所没有的金额，同时它获得这种经济实力的手段也被剥夺了。

凯恩斯于 1919 年 12 月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抨击。他认为这一赔款既不会得到全部的支付，也不会使和平得到保障。以后的历史证明凯恩斯没有看错，一战后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确为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的上台播下了种子。

二战中盟国再次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战争给所有各方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也再次成为天文数字。但是这次人们吸取了 1919 年没有听从凯恩斯主张的教训，1945 年没有出现那种灾难性的赔偿要求。

二战以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干预主义”政策来指导国内经济。其中以美国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为最，战后美国携二战余勇，加上凯恩斯学说，迅速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经济中心。



于细微之处看经济

——微观经济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1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一个朋友却给讲了一个“免费午餐”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开自助火锅店的老板，最近托他给物色几个特能吃的人，由这位老板出钱，找这些人来免费吃饭，但有一条，吃饭的人必须饭量出众才行。朋友惊呆了，这哪是做生意啊？这分明是行善嘛！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吃饭并不是在老板自己的店里吃，而是在对面那家自助火锅店里吃。果然没有多久，对面那家自助火锅店关门了，老板的火锅店成了那道街上的独家店。

在朋友的故事中，虽然这几个饭量大的人吃到了“免费的午餐”，但是他们却成了老板手中的一颗棋子。老板只花费了几顿饭钱，却取得了挤掉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免费的，它只不过是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投入的代价而已。实际上，凡事有收益就会有成本，有成本就要有收益。所以，在经济学上常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形象的说法。

为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与人类不能解决稀缺性问题有关。稀缺性问题是人类面对的永恒的问题。它是指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再多的资源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以，稀缺性问题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这种稀缺性问题与通常意义上的短缺现象不同，短缺现象是一种绝对缺乏的现象，它常表现为物资的匮乏。而稀缺性问题并不仅仅是物资的匮乏，它是个相对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再丰富的物资也不能解决稀缺性问题。

具体说来这又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是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人类需要的层次性，他们发现当较低的需要被满足之后，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就又产生了，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这种现象既是人性贪婪的表现，又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么？说是天上的一个神仙下界来想超度一个凡人成仙，但世人个个贪婪成性，颇令神仙失望。一天神仙又碰到了一个人，神仙想试试他，就将一块石头点成了

■ 品出经济学三味

金子，凡人居然不要，神仙又点了一块更大的金子给他，这个凡人还是不要。这人难道不贪？神仙想超度他了，最后问他：“那你想要什么呢？”这人说：“我就想要你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神仙大失所望。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另一方面是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人类要维持生存和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自然资源，这是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取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自然物。土地、矿藏、森林等都属于自然资源。显然，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是不可再生性的资源；加工资源，这也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但经过进一步加工以后，可以用于投入生产的那部分资源。机器、厂房、设备等都属于加工资源。所以，加工资源又被人们称为实物资本。由于受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人类实物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也有一个时间过程；人力资源，这是人类本身所提供的一种重要资源，它表现为各种劳动主体。可以说，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人都是人力资源。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因为企业家的才能是将各种资源组织起来，形成有效的社会生产的核心因素，企业家才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又与一般的人力资源不同，它显得更加宝贵和稀少。虽然从长期来看，人类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拓展人类可用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三种资源的质和量都不可能达到人类随心所欲的地步。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稀缺性问题的存在。以电视机为例，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一台普通的黑白电视机还只是少数家庭能够享受的奢侈品。到了 90 年代初，当黑白电视机还没有进入全部家庭的时候，彩色电视机已经出现在普通家庭的居室里。以后彩色电视机从平面直角到纯平显示、从数字化到网络化迅速发展，但稀缺性问题却更加得到了验证。试想，与“稀缺性”相反的是所谓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但从电视机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说黑白电视机进入全部家庭是“产品极大地丰富”呢？还是彩色电视机进入全部家庭是“产品极大地丰富”？恐怕这样的“产品极大地丰富”状态永远也不会达到！

所以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有，这免费的午餐也绝不可能吃得长久。也正是由于稀缺性问题的存在，才产生了将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和利用，以达到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科学。这就是经济学。

14. 鲁滨逊的选择：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的描述中，酷爱航海的鲁滨逊在商船失事以后漂流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鲁滨逊凭着自己的选择，只身在荒岛上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如果我们一旦引入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术语，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就有了浓厚的经济学色彩。

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在纵轴和横轴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坐标系中的曲线，它表示人们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两种产品的最大产量组合。

对于处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而言，他也仍然会面临这样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现在的鲁滨逊虽然两手空空，但他毕竟来自于文明社会，他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还可以利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进行生产自救。假设鲁滨逊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者用于爬树摘椰子，或者用于下海抓鱼。

这样鲁滨逊首先就有了两种极端的选择，他可以将一天8小时全部用于抓鱼，这个数量表示在横坐标上；鲁滨逊也可以将一天8小时全部用于摘椰子，这个数量表示在纵坐标上。这是鲁滨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两个极端的点，当然，除这两点以外，鲁滨逊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将一部分时间用于摘椰子，另一部分时间用于抓鱼，这又会有很多种组合。将这些点也都画出来，就得到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是鲁滨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如果观察鲁滨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并凹向原点的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表明鲁滨逊在现有资源条件下要想多抓鱼就得少摘椰子，也就是说，通过鲁滨逊的选择，椰子可以转换为鱼，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凹向原点则表明，将椰子转换为鱼的过程中，转换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当鲁滨逊拥有很多椰子的时候，生产椰子的效率几乎都是发挥殆尽了，这时一定量的劳动通过转换，用于多抓一条鱼，只需要放弃较少的椰子，但是随着调整的进行，当椰子的数量变少时，椰子的生产效率反而会回到较高的状态。这时，同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样用一定量的劳动多抓一条鱼，则要放弃更多的椰子。这是由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所决定的。

不管怎么转换，只要是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运动，鲁滨逊在生产上就总是处于有效率状态，或者说他不会窝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当鲁滨逊的生产选择沿着生产可能性边界运动时，他要多抓一条鱼，就必须少摘一些椰子。如果鲁滨逊的选择不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而是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内部，这就说明鲁滨逊的生产是无效率的，或者说鲁滨逊的生产窝了工。因为在此状态下，鲁滨逊可以在不减少鱼的产量的前提下，增加椰子的产量，或者在不减少椰子产量的前提下，增加鱼的产量，而重新回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这说明原先的状态不是最好的。

尽管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事生产都是有效率的，但鲁滨逊究竟会选择哪一点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鲁滨逊的生产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所以，在这里是鲁滨逊个人偏好决定了生产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具体位置。假如鲁滨逊是个典型的素食主义者，他的选择就一定在纵轴上的那个点上；反之，如果鲁滨逊偏爱食鱼，那他的选择就一定位于偏向横轴的点上，当鲁滨逊这样选择时，资源就得到了优化配置，实现了微观经济效益。

对鲁滨逊来讲，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的那些点又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更多的鱼和更多的椰子，但由于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是鲁滨逊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的。如果鲁滨逊可以增加劳动投入，这就需要鲁滨逊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他完全可以得到更多的鱼和椰子，这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当然，鲁滨逊也可以在不增加劳动投入，而是改进生产技术的前提下，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扩张。比如，鲁滨逊不再赤手空拳去抓鱼，而是造船结网，用渔船捕鱼；也不再爬树摘椰子，而是造采摘器在树下摘椰子。结果鱼和椰子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鲁滨逊通过更加充分地利用资源，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经济增长。

15. 交易与拍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海南大开发中，由于投机过盛，出现了泡沫经济。作为泡沫经济破灭的见证物，在海南抬头可望的一栋栋难看的“烂尾楼”群，构成了与椰风海韵极不协调的一道无奈的风景线。一年前，三亚市为了美化市容和解决“烂尾楼”问题，曾经推出“炸楼”举措，一时引起人们的关注。近闻三亚市又推出新举措，那就是通过拍卖方式，促进“烂尾楼”的改建或拆除工作的进展，又给人以振奋。

拍卖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设计和制定拍卖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早在罗马帝国的末期，拍卖掠夺来的战利品已经很普遍了。大约公元 7 世纪，在我国也出现了拍卖圆寂和尚遗物的拍卖市场。在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拍卖占据了美国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美国财政部每周都要采用一种密封竞价法拍卖出数十亿美元的国库券。内政部在拍卖市场出售联邦地产上的采矿权。在发达的拍卖市场，卖主们卖出古玩和艺术品、花卉和牲畜、出版权和伐木权、邮票和酒等等，范围非常广泛。

大量的交易采用拍卖的方式不是偶然的，拍卖使竞争发挥得更加充分，因而它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方式。实际上拍卖的方式并不止一种。现在全世界流行的拍卖的方式共有四种：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一级密封价格拍卖以及二级密封价格拍卖。

英国式拍卖是最常见的那种拍卖方式。这种拍卖方式的场面最具戏剧效果，所以经常出现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具体作法是，通常高定一个底价，也叫保留价格，意思是如果竞买人出价低于这个价格，物主保留优先购买权。拍卖开始后，由拍卖师主持竞买过程，所有竞买者集中在一起，按照由低到高、逐步推进的方式公开竞价。拍卖师连续地喊出较高的价格直到只有一个意愿竞买者留下来为止。经拍卖师一锤定音以后，这个竞买者就以最高的价格获得拍卖物。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荷兰式拍卖是另一种公开竞价的拍卖方式，它也是由一个拍卖师主持，拍卖师在一开始就叫出一个很高的价格，然后不断地降低价格直到某一个竞买人出面表示愿意以那一价格买下拍卖物为止。这种拍卖形式因在荷兰被用之以销售出口的花卉而得名。

一级密封价格拍卖是一种密封竞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参与拍卖的竞买人把自己的出价写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递交给拍卖师，经拍卖师开启信封后，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得到拍卖物，并且实际支付他报出的价格。

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密封竞价拍卖。它是由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维克里教授在 1961 提出的，所以也叫“维克里拍卖”。在这种拍卖中，也是密封竞价，经拍卖师开启信封后，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得到拍卖物，但是只支付等于第二高竞价的价格。

四种拍卖形式虽然具体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先来看英国式拍卖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这两种拍卖从最终效果方面来看是等价的。比如，在一个二级密封价格拍卖中，最有实力的竞买人的竞价是 2000 元，第二有实力的竞买人的竞价是 1000 元，那么按照拍卖规则，最有实力的竞买人得到拍卖物，实际出价 1000 元。而上述同样的情况在英国式拍卖的公开竞价中，当第二有实力的竞买人的喊出 1000 元的竞价时，假设每次出价的最小升幅是 1 元，那么最有实力的竞买人只要报出 1001 元，就能得到拍卖物。在极限的意义上，这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的结果是完全等价的。现在再来看荷兰式拍卖和一级密封价格拍卖。在这两种拍卖方式中，拍卖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出价将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出价越低，赢得拍卖的机会也越小，但一旦赢得拍卖所获取的额外利益越多；相反，出价越高，赢得拍卖的机会也越大，但一旦赢得拍卖所获取的额外利益将越少，甚至带来亏损，成为“倒霉的赢家”。在这个意义上，荷兰式拍卖和一级密封价格拍卖具有等价性。另外还可以证明的是，如果竞买人是风险中性的，英国式拍卖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要比荷兰式拍卖和一级密封价格拍卖产生较高的平均价格。

上述四种拍卖的方式同时也适用于招标，其实在英文里，拍卖和招标本来就是同一个词（auction），但在中文里是分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拍卖和招标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引导出“价高者得之”的结果，而后者引导出的是“价低者得之”，当然是在保证信誉和质量的前提下。不管是拍卖也好招标也好，如果能作到规范操作，我们的生活中自然会少一些腐败少一些“豆腐渣工程”，多一些廉洁多一些效率。三亚已经开了个头，但愿我们能够借助拍卖和招标这一机制，逐渐消灭那一栋栋难看的“烂尾楼”群。还椰岛一个美丽，不啻是海南人民的福祉所在，亦是天下所有热爱环境和期盼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16. 从买车来看需求

多年前笔者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两位同窗好友都姓赵，但在形象上却大相径庭。其中的一位肤色粗黑，脱发较重，尽显老成持重之态，再加上年龄又长几岁，所以我们都称其为老赵；而另外一位却长得身材瘦小，面庞稚气，且本身年龄也小，因此被称为小赵。这两位不止“五百年前是一家”，平日里关系也最为要好。

衣食住行总是最基本的需要，所以，入校之初比较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搞一辆车子。有一天老赵想到旧车市场买辆二手单车，小赵听说要买车非要一块去不可。到了车行，两人看了一辆又一辆，意见却不尽一致。见此情形，热情的老板操着一口浓重的天津腔，冲着老赵建议：“嗨，我说大哥，这买车呀，还是得听孩子的，为嘛？因为这车毕竟是孩子骑的。”此言一出，气坏了两位买车人。

车没有买成，还窝了一肚子气，甚觉无聊，老赵决定去公园走走，一进公园，碰见一位少妇带着一个可爱小孩在散步，老赵顿时又来了兴致，随即上前攀谈开来，逗孩子可是老赵的强项。不觉间买车阴影渐渐散去，好心情又悄然复得。即将离去，少妇亦彬彬有礼，教着孩子说：“乖乖，跟爷爷再见！”老赵又懵了。这也许是老赵进津以来最难忘的一次“黑色遭遇”吧。

老赵买车的遭遇隐含了一个需求的问题。经济学中所说的需求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愿意并且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行为和关系。要形成需求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是购买愿望，二是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所以说，需求首先是一种人类需要，但需要并不等于需求，只有那些有支付能力支持的需要才是需求。因此，商品营销的过程不仅仅是满足需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创造需求的过程。在支付能力已具备的条件下，商品营销者怎样有效地去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愿望，促成需求实现，的确是一门艺术。在上述老赵买车的遭遇中，虽然车行老板热情有余，但由于言语失当，反而熄灭了老赵原本强烈的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购买欲望，使潜在的需求化为泡影。类似的例子也还有不少，在海口市海甸岛上，有好多家火锅店并排在一起，本来一家三口吃火锅价廉物美，火锅店生意也挺红火，但后来搞的人们都不敢去了，原来随着竞争的激烈，各个火锅店争相拉客，客人下车还未站稳脚跟，一群火锅店的众伙计们便蜂拥而上，甚至拉拉扯扯，在这种情况下客人们哪还有食欲可言？最终拂袖而去的不在少数。这些火锅店的经营者和车行老板一样，没有研究好消费者心理，破坏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就破坏了需求的形成过程。

只有同时具备购买愿望和支付能力才能形成需求，但影响需求形成的具体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影响消费者购买愿望方面来讲，主要有消费者偏好、消费者预期和广告宣传等因素；从影响消费者支付能力方面来讲，主要有消费者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政策等因素。市场的开发就是需求的开发，在搞清了以上各种需求影响因素以后，市场的开发就有了针对性而别具效率。举例来说，我国已经入世了，不少汽车厂也在忙着降价，关于汽车进入家庭的话题又多了起来。笔者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蓝领朋友，一个是教授朋友，这两个朋友的实际情况很不相同，但在汽车进入家庭方面却颇为一致，那就是近期不会拥有汽车，尽管这只是同果不同因。

先说蓝领朋友。蓝领朋友是一家公司的职工，公司离家很远，工作节奏又很紧张。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得起大早，太辛苦。从蓝领朋友内心来讲，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即使考虑到降价的因素，蓝领朋友盘算一下自己的收入，还是养不起一辆汽车。因此，购车计划只能作罢。而教授朋友则是一所高校的知名学者，改革开放所启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运动，给这位教授朋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经过几年的讲学、办班，教授朋友也成了有钱人。对教授朋友来讲，买车和养车的费用问题早已不在话下，但教授朋友仍然没有买车的意思。据教授朋友自己讲，我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家与学校之间，活动半径不超过一公里，即使外边有事，也总有专车接送。所以，对我来讲实在没有必要买车。

鉴于以上情况，汽车销售公司在开发这两类市场时，必须区别对待了。蓝领朋友虽然有强烈的购买意愿，但却受制于支付能力不足，汽车公司要想满足这部分需求，就要解决这部分消费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开发经济适用车型以及实行汽车消费信贷等；教授朋友没有形成需求主要在于其购买欲望没有被刺激起来，汽车公司可以考虑通过广告攻势和营销策划来改变他的消费观念，使这部分潜在需求得到开发。

17. 促销中的艺术：需求价格弹性

药 商 A 和药商 B 是一起对做药品生意的同行，药商 A 做的是保健药品生意，而药商 B 做的是普通药品生意。在那年“十一”期间，为了充分利用“黄金周”所带来的无限商机，药商 A 和药商 B 早早地就筹足了货源，并且双双打出了降价大酬宾的招牌。红红火火的一周很快就过去了，节后盘点，药商 A 果然狠狠地赚了一把，而药商 B 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盈利反而减少了。同样的商业背景，同样的营销策略，结果却如此悬殊。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药商 B 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价格调整与收益变动的关系中，需求的价格弹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呢？首先要说明需求法则：在正常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与其需求量（销售量）成反方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某种商品价格提高，销售量减少；价格降低，销售量增加。根据生活经验，需求法则所表明的这种关系的确不容怀疑。同样根据生活经验，不同的商品在价格调整时，销售量变动的幅度是大不相同的。为了反映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销售量变动的幅度大小，经济学家引入了需求价格弹性这一概念。需求价格弹性是用销售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百分比来表示销售量对价格的反映程度。

商品需求弹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生活必须程度以及可替代性大小等因素。比如，象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销售量变动就很小，这类性质的商品被称为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另外一些诸如旅游、服务、保健品等奢侈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销售量变动就很大，这类性质的商品被称为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

对于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不难想象，如果商家降价一定比例，必然会使销售量增加的比例更大，因而总销售额就会增加，假如利润是销售额的一个固定比例，那么，商家就能增加利润；而对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情形就正好相反，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如果商家降价一定比例,虽然也会使销售量增加,但增加的比例小于降价的比例,那么总销售额反而减少,利润也减少了。现在,不难解释为什么药商 A 降价能赚钱而药商 B 降价反亏的现象了。原来药商 A 经营的保健药品是奢侈品,属于需求富有弹性商品,因此降价能使销售额增加,即通过“薄利多销”而增加利润。药商 B 经营的是普通药品,属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因此降价反而使销售额减少,从而使利润减少。

药商 B 的教训说明,对商品价格进行调整,必须对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否则,就有可能事与愿违,好事办成坏事。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1979 年我国农副产品调价,猪肉上调 20% 左右,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下,猪肉的需求还是比较富有弹性的,所以,猪肉涨价后人们的部分购买力转向其他代用品,猪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国家不得不将一些三、四级猪肉降价出售,加上库存积压,财政损失 20 多亿元;再加上农副产品提价后给职工的补助 20 多亿元,财政支出增加 40 多亿。

此外,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都要考虑需求价格弹性的具体情况。首先,对于那些需求缺乏弹性的生活必需品而言,价格必需保持基本稳定。比如,对农产品来说,如果价格大幅度下降,会使生产者收益减少,从而对生产不利,这就是“谷贱伤农”的原因所在。大概我们都记得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这样的情节,小说里的“旧毡帽朋友”在风调雨顺,多收了三五斗米之后,满怀着改善生活的愿望去粳米,却因为米价的大跌而使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这是对“谷贱伤农”这一格言的最生动的写照。为了避免“谷贱伤农”,现在各国政府都对农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一般的做法是,当农业丰收时,政府按照“保护价格”收购农产品,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正当利益。

其次,如果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根据需求弹性理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收入会大幅增加。但由于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它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问题,如果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期间,政府就会相应的出台有关经济政策来稳定农产品价格。比如,在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生的粮油价格上涨风潮中,国家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政府制定了“最高限价”,为粮油价格上涨设置了上限;另一方面,政府将大量国家储备粮油以平价投放市场,以控制粮油价格,最终粮油价格上涨风潮被有效地遏制住了。

18. 从捕鱼话供给

2002年8月份，海南为期两个月的伏季休渔解禁开捕，海南市场上又恢复了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消费者又可以吃到从海里捕上来的各种生猛海鲜。从休渔到解禁，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海洋捕捞产品的供给问题。在经济学上，供给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在每一价格下，生产者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某种产品的数量。要形成有效的供给，必须同时具备供给的愿望和供给的能力这两大条件。

影响供给愿望的因素主要有：供给品的价格，投入品的价格以及预期等。实际上，供给品的价格越高，投入品的价格越低，预期赚到的利润越多，生产者就会越倾向于多供给。因为生产者的供给愿望主要来源于追求利润的动机。以海南海洋捕捞为例，虽然海南四面环海，海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很难见到大量的海洋捕捞产品供应市场，其原因就是那时海洋捕捞产品价格很低，而且定得很死，渔民也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海洋捕捞产品价格放开，渔民出海的积极性提高了。从投入品的角度来看，使用以风力为动力的帆船作渔船的主要投入就是人工和设施的费用了，但在使用机动渔船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燃料消耗的费用。在海洋捕捞产品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渔民出海捕鱼所需投入品的这些费用越高，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少出海；这些费用越低，渔民就会越倾向于多出海。

哪些因素影响供给的能力呢？主要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因素。任何供给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的，只有掌握了某种产品的生产技术，生产者才有可能向市场提供该种产品。不同的生产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以捕鱼为例，用帆船作渔船只能捕到数量不多、种类有限的海鱼；而使用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进行捕捞就是另一种概念了。比如，在海南省护渔行动中，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了大吨位、适航性能好的渔船结

品出经济学三味

帮开赴中、深海区作业，探索中深海捕捞的组织方式，提高捕捞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生产者的经营管理知识也能影响供给，科学的经营管理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所以，一个管理有方的船队要比一个管理混乱的船队更有生产效率。

政府政策可能是既影响到供给愿望又影响到供给能力的一个因素。比如，政府对某种产品征税，如果税收不能完全转嫁出去，就会影响该种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该种产品的供给能力。政府有些政策可能是禁令，即不准做什么，比如禁止供应毒品；或在规定时间内不准做什么，比如规定时间内休渔。以休渔为例，休渔期内海鱼的供给就中断了，但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定期休渔是完全必要的。据“世界鱼类中心”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由于世界人口的急骤增长和无节制的滥渔滥捕，未来 20 年内发展中国家的 10 亿人将无鱼可吃。按全世界现有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类消费鱼类数量要翻番来计算，50 年之内海洋的鱼类储量将无力满足人类的消费。可见，如不采取措施，海洋鱼类的市场供给将会出现危机。

通过一定时期的休渔，实现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供给。据了解，海南在今年休渔期间，海洋渔业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休渔措施，加强监管，使休渔工作落到实处，全省 3279 艘休渔渔船全部入港，违规作业渔船明显减少。从休渔的效果来看，海南省休渔 4 年，效果十分明显，渔业资源得以迅速恢复，捕捞产量连年递增。南海水产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几年开捕后的平均鱼获率比休渔前提高 1.5 倍，鱼的个体增大一倍以上。在品种方面，马鲛、乌鲳、蓝圆鱼参、带鱼等鱼汛旺发。通过休渔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现在，休渔在海南已变成渔民的自觉行动。通过休渔，实际上是提高了渔民海洋捕捞产品的长期供给能力。

19. 机会成本与农民盖房

用 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是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所深信不疑的。经济学家们则进一步将这一原则总结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所说的“成本”，既包括实际上已经支出的成本，即会计学上的成本，也包括实际上并没有支出，但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十分重要的成本，这种成本被称为“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一种因放弃而产生的成本。一种资源可能有多种用途，但它往往只能被选择用于一种用途，那么在放弃的那些用途中，最好的那个用途就是这一选择的机会成本。比如说，你有一间门面房，可以有三个用途：自己住，没有收入；租给别人，每月收租金 1000 元；自己开店，每月获纯利润 900 元。因为只能选择一种，所以，当你选择自己住，你每月的机会成本就是 1000 元；当你选择租给别人，你每月的机会成本就是 900 元；当你选择自己开店，你每月的机会成本也是 1000 元。看来，还是选择租给别人，机会成本最小。因此，这间门面房最终应该选择租给别人，才符合“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的信条。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也深谙此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从中可以看出机会成本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从当代中美两国农民在盖房方面存在的差别比较一下，也不难发现机会成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积攒大半辈子盖房，然后给儿子娶媳妇，通常都是农民们一生中的大事。那么，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呢？一般都是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自己准备材料。待材料一应俱全后，则在农闲的时节，找来一大群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将房子盖起。这种盖房的方式十分原始，盖房用的工具也极其简单。往往是一个木工，既做门窗，又做架构，还顺便给主人做几把椅子；而砌墙、装修等也多是由同一批泥瓦工完成，这里边绝不会有很复杂的内部分工。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再来看美国的农民是如何盖房的。通常，他们会将盖房的活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各种费用统一与建筑商结算。建筑商揽到这笔业务后，先找专业公司设计好图纸，然后再去找分包商，比如，专门处理地基的公司、专门砌墙的公司、专门做木工活的公司，每一类业务都有众多相应的专业公司提供服务。仅就木工活而言，就包括五类：屋顶的架构是一个专业做大批架构标准件的分包商；做厨房的柜子及饭桌又是另一个专业木工分包商；做楼梯也是一个专业公司；而室内的门窗、地板、墙脚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负责；支撑房子的木架结构又是另一个专业公司。专业工人用的工具，则五花八门，十分复杂。在这种盖房过程中，建筑商除了将盖房的各项业务分解后转包给其他专业公司外，可能什么也不需再多做。

我们暂且不论中美两国农民的盖房方式到底孰优孰劣，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中美两国农民在盖房方面会存在这样的差别。由于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不发达，农业生产率也不高，因此农民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是极低的。他们可以非常从容地用最原始的方式盖自己的房子。农民自己的机会成本低，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机会成本也一样地不高，所以，这种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将房子盖起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今年张家要娶媳妇了，大伙儿就帮助张家把房子盖起，明年李家要娶媳妇了，大伙儿就帮助李家把房子盖起。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美国市场发育程度高，经济发达，农业生产率本身也高，因此农民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在这里美国农民不是不可以自己去联系各个专业公司，但高额的机会成本使他宁愿将盖房的活全部承包给一家建筑商。首先，这个农民有自己专门的工作，或许，他一个人要负责耕种上百亩的农场，如果放弃手中的工作去亲自联系众多的专业公司，他的损失将会很大，这就是机会成本。第二，他对这些专业公司根本就不熟悉，如果要自己去做，他就得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盖房的各种材料和造价，然后再去调查和比较每家专业公司的情况，直到最后确定签约。在这些专业公司替他盖房的过程中，他还得去监督每一项业务的质量，简直不胜其烦。并且，在他花费大量精力掌握了各种“盖房要旨”后，他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盖第二栋房子，这些知识也就白费了。所以，他宁愿将不熟悉的盖房业务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他自己则去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安排使得他的机会成本最小化了，所以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20. 成本与收益

甲：哎呀！大哥，好久没见了，最近忙什么啊？

乙：噢！我正要告诉你，我现在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甲：那你教什么课呀？

乙：经济学。

甲：给大伙儿说说经济学好不好？

乙：经济学嘛，一定要记住，凡事有收益就会有成本，有成本就要有收益。俗话说得好，“欲想取之，必先与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甲：不过呀，我发现这天底下还真有“免费的午餐”呢。

乙：能有这事儿？

甲：有啊，前些时候就有个哥们儿让我给他招聘人才。

乙：什么人才？

甲：能吃就行，吃得越多越好。

乙：有什么条件么？

甲：唯一的条件就是我出钱，你吃饭。一顿吃不了三斤肉以上的，免谈！

乙：我觉着也不对劲呀，你看，他掏钱，我吃肉，吃少了还不行，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圈套吧？

甲：我郑重地向你保证，除了到点吃饭之外，绝对不让您干别的事情。

乙：这倒还不错，最后找到了人么？

甲：找到了，一下子招聘到了十二名彪形大汉，你还别说，这几个人还真行，个个犹如八戒再生，胃口出众，饭量非凡，可以说，那吃饭的场景真是犹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呀。

乙：噢，十二张大嘴，整整一打啊！这么吃下去，您这位哥们能承受得了么？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甲：没问题！我这位哥们是开自助火锅店的。

乙：那一打子人饭量那么大，长期吃下来，你哥们的火锅店，岂不是早晚要关门？

甲：那倒不会，他花钱请人白吃，不是在自己店里吃。

乙：那是在哪儿吃？

甲：在他对面那家自助火锅店里吃的。

乙：瞧，硬是把人家给吃跨了。

甲：你看，这是不是“免费的午餐”？

乙：话虽这么说，可您那位哥们花了小成本，得了大收益啊！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那就是“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垄断了市场”。

甲：我这位哥们不光是开过自助火锅店，他可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靠着脑瓜活，胆子大，靠钻法律的空子，抓市场的契机，几年下来他是告别了贫困，嘿嘿，成了百万富翁。

乙：当上了大款儿。

甲：我这个哥们不同于一般的大款儿，他特别怕露富，所以，富了以后尽管每天都是节衣缩食，心里还是不踏实。

乙：这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甲：可不？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这位哥们索性搞到了一套叫化子的破烂行头，收拾好万贯家财，要饭去了。

乙：加入了丐帮，这下心里踏实点。

甲：计划是这样，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不到三年，我这位哥们在丐帮也呆不住了。

乙：出了什么事儿？这丐帮弟子也当不成了？

甲：事儿倒没有，我这哥们万万不能容忍的是，乞讨要饭三年，个人财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直线上升，这下想把财富降下来的宏伟愿望就这么彻底落空了。从此以后，我的这位哥们变得更加坐卧不安了。

乙：真有这么厉害吗？

甲：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假设他一天只需要先准备 1 块钱，打个比方，要想买新衣服，不能着身子去，得先穿着老衣服去。

乙：明白，这就是投入的成本，那收益又是多少呢？

甲：再假设他一天能要到 10 块钱，这就是他的收益。你算算他的毛利润率是多少？

乙：这么一算，他的毛利润率应该是 900%，这简直是东北亚乃至世界上最高的毛利润率了。

甲：暴利行业呀，没办法，我这位哥们当机立断，赶紧停止行乞，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万全之策。

乙：是什么好办法呀？

甲：他静下心来，经过苦思冥想，忽然茅塞顿开，那就是饭也不要了，每天读读书，看看报，一不小心居然还拿了一个学位，最后到某大学去当了讲师。一年下来财富直线下降，这下心态才算平静下来。

乙：啊？是这么回事！

21. 吃苹果与看晚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小时候我曾经去过一个苹果园，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代，经济落后，物资短缺，平时很难能吃到苹果。到了果园看到满园的苹果，幼小的我早已垂涎欲滴了，当从主人那得知我可以随便吃的指示后，我兴奋地跳了起来，于是开始了我的苹果大餐。

第一只苹果是那么的可口，以至于我急不可耐地接着吃了第二只，感觉依然不错，一直吃到第七只苹果感觉才平淡下来，但是忍不住还是吃了第八只苹果。结果正是这第八只苹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吃了第八只苹果没多久，我就感觉不妙。闹了肚子以后，才后悔不该吃这第八只苹果。

大约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老百姓在过春节的年夜饭中增添了一套诱人的内容，那就是春节联欢晚会。记得一九八二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出台，在当时娱乐事业尚不发达的我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晚会的节目成为全国老百姓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题材。晚会年复一年地办下来了，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大，技术效果越来越先进，场面设计越来越宏大，节目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不知从哪一年起，人们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价却越来越差了，原先在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赞美之词变成了一片骂声，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一道众口难调的大菜，晚会也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年年骂，年年办”的怪圈。

吃苹果与看晚会似乎是不相关的两件事，但二者的背后都共同隐含了一个经济学的原理，那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消费物品是为了得到效用，而效用就是被满足的程度，边际效用则是最后增加的物品带来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一个人在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他（她）从中得到的效用是越来越少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被视为一种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但在其背后也有生理学的基础：反复接受某种刺激，反应神经就会越来越迟钝。在我吃苹果的往事中，第

一只苹果感到特别好吃，由于刺激反应弱化，第二只苹果就不如第一只那么可口了，第八只苹果就递减成了负效用，而给我带来了麻烦。同样，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欢呼雀跃，但举办次数多了，由于刺激反应弱化，尽管节目本身的质量在整体上未必没有提升，但人们对晚会节目的感觉却越来越差了。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时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尽管有时我们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了第一次最重要。难怪人们最难忘的是自己的初恋，最难忘恋爱中第一次约会的地点。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但为什么“物以稀为贵”就很少有人追究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的经济学原理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物品的价值高低主要取决于成本和效用两大方面。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主要就看效用了。但在决定物品价值高低时，不是总效用而是边际效用在起作用。以水和钻石为例，从总效用的角度，水是生命之源，而钻石不过是装饰之物，前者不知要比后者重要多少倍。但由于决定物品价值的是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又是递减的，钻石数量极为有限，那么最后一颗钻石的边际效用就很大。而水的数量极为丰富，最后一单位水的边际效用就递减到了几乎不值什么价钱了。假如水的数量也和钻石一样稀少的话，那么水的价值不知会比钻石高出多少。弄清了这一原理，我们就能够解释很多事实，比如，做为足球弱国中国为什么也有球员能到英超踢球？虽然中国的优秀球员比不上英超的最优秀球员，但在边际上他们也比很多英超球员优秀。鉴于此，一些用人单位就要注意了，在招聘员工时“非某某名校免谈”的招聘方式极有可能漏掉有价值的员工。

22. 需求法则的反例：吉芬商品与吉芬效应

通过观察人们不难发现，在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一般与其购买量之间存在着跷跷板效应，即商品价格高了，人们购买的量就少；而商品价格低了，人们购买的量就多。这是经济学中有名的“需求法则”。

需求法则的完整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商品的需求量与其价格成反方向变动关系”。需求法则的这种跷跷板效应源自两种更具体的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当商品价格下降时，人们会用这种相对而言更便宜的商品去代替别的类似商品，因为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也包含了别的类似商品的价格不变，那么降价了的这种商品就显得便宜了，所以，人们就会多买，这是替代效应发挥了作用。

举例来说，在馒头和面包价格都是1块钱时，一个人一个月吃30个馒头和30个面包，现在假定面包不变，馒头降为5角钱，那么，这个人一定多吃馒头和少吃面包，这是因为馒头比面包便宜，他用馒头代替面包的缘故。

当商品价格下降时，人们还会因为这种商品的降价而使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而有能力多购买这种商品，因为其他条件不变，也包含了人们的名义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就使他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在商品是正常商品的情况下，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也会多买；而对于那些低档商品，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反而会减少消费和购买。这都是收入效应发挥了作用。

还以上例来说，在馒头和面包价格都是1块钱时，一个人一个月吃30个馒头和30个面包，共需60元钱；现在假定面包不变，馒头降为5角钱，那么，这个人即使只维持原有的馒头和面包的消费量，也只需要45元钱即可，他多出来的15元钱还可以再多买一些馒头，这是因为他实际可支配的钱更多了，由于馒头和面包都是正常商品，那么他消费馒头和面包的数量也会更多些。

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的商品都遵循需求法则，但不等于说没有“反例”。其

实需求法则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会出现所谓的“反例”。

第一种情况是“吉芬商品”。1845年，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发现，有一类商品，其销售量与价格之间并不呈反方向关系，价格上涨不但不会导致销售量减少，反而使之增加。譬如，土豆就属于这类商品。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涨，但爱尔兰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土豆的消费。后来，经济学家就把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

吉芬商品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上述现象来看，吉芬商品应该是那些比较低档的生活必需品，马铃薯在欧美算是比较廉价的食物了，也是普通老百姓主要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在正常情况下，老百姓虽然以马铃薯为主食，但也还可以少量搭配一些肉食类制品来消费。但在爱尔兰灾荒期间，由于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商品涨价，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实质性地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平常还可以少量涉及的高档食品就完全不敢问津了，老百姓要吃饱肚子只好更加依赖马铃薯。于是就出现了随着马铃薯的价格上涨，其销售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怪事。

马铃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未必是生活必需品，但像大白菜这种蔬菜，对于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对于我国北方老百姓，就特别熟悉了。大概在若干年以前，我国北方老百姓在漫漫冬季每家每户都要储备几十斤甚至上百斤大白菜过冬。虽然大白菜是老百姓们的主菜，但是也还有一些高档的蔬菜作为点缀。如果碰上大白菜价格上涨，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苦，因为他们的收入实质性地减少了，他们就要更多地消费大白菜而远离高档蔬菜。所以，从这点来看，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大白菜也有吉芬商品的性质，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马铃薯。

第二种情况是奢侈品。奢侈品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奢侈品的购买增加更快。在已经富起来的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往往会发生炫耀性的消费，价格越贵，人们越买，价格便宜了，人们反倒不买了。据一个开服装店的朋友讲，他曾进过一批相当不错的服装，他原打算薄利多销，尽快出手。但由于判断的失误，打错了算盘，标价太低反而没怎么卖动。后来，他灵机一动就在原来的价格后面加了个零，结果很快就销完了。它反映了富起来的人们已开始追求炫耀性消费的一种倾向。

在炫耀性消费中，许多名车名酒往往成为大款们追逐的对象。现在我国汽车正在走入家庭，这两年来我国家用汽车市场呈现出持续火爆的行情。值得注意的是，对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并不是汽车越便宜就越买，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一个笔者认识的中产阶级的人士在谈到买车问题时讲到，我骑一辆价值50块钱的单车并不觉得丢人，但要我开一辆价值5万元的汽车却感到有点拿不出手。最近海南马自达汽车公司推出的一款M6型新车，据说价位定在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这正是迎合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购车需求。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第三种情况投机性商品。在投机性强的市场上（例如，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上），人们有一种“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即价格上涨时，人们认为还有上涨空间而抢购，价格下跌时认为还没有到底而抛出。这与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和投机的需要相关，也可以看作是需求法则的一种反例。

上述三种反例不但不能推翻需求法则，反而是以特殊的方式验证了需求法则。

以“吉芬商品”来说，大饥荒使得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涨价了，这就与需求法则强调的“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前提不同。既然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涨价了，那么，替代效应就微不足道，而收入效应则非常明显。土豆又属于低档商品，那么，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穷人反而会增加减少消费和购买。

在奢侈品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是单纯的“买贵”，而是讲究品牌和质量。这从根本上并不违背需求法则。当我们把一辆名贵的汽车和一辆普通的汽车提供给一位富豪时，他虽然选择了后者，但不要认为他是“买贵”，因为这对他的实际需要来说，也许并不贵。他的需要不同于普通人对于普通汽车的代步需要，他更主要的需要可能在于体现实力和地位的炫耀性需要。这时一辆名贵的汽车和一辆普通的汽车就不能看作是同一种商品了。需求法则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比较两种不同的商品，从而得出某种关系。

至于投机性商品的情况也是改变了需求法则强调的“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是一个常量，但在投机性强的市场上，人们对商品未来价格的走势的预期是一个变量，这种预期因素影响到他的个人决策。由此形成“越买越涨，越卖越落”的反常现象。

23. 搬家的学问：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去年表弟成家以后从父母家中搬出，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对于一个两口之家来说也够了。这算是表弟的第一次搬家。两个月以后表弟被一家大公司录用，公司为表弟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住起来是相当的宽敞，甚至有点浪费，但由于房子是公司提供的，表弟也就心安理得地住着了。这是表弟的第二次搬家。两个月以前，听说表弟又搬家了，这次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原来，表弟的公司改变了政策，以前是公司统一为职工租房，现在改为把住房租金发给个人，由个人来决定如何租房。在这种背景下，表弟结合自己的需要，用公司给的钱换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之外，还省下了一部分钱补贴家用，这就是表弟第三次搬家的理由。

表弟虽然在一年之内连续搬了三次家，但按照经济学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解释来看，倒也在情理之中。收入效应是指当人们实际收入增加时，对某种商品的消费量就会增加；而替代效应是指在相互有替代关系的商品中，如果其中一种商品价格下降，人们就会用这种商品去替代其他商品，从而增加这种商品的消费。如果说表弟第一次搬家是其独立生活的开始，那么表弟第二次搬家则是由于公司做出的统一消费，也是一种强制消费，对于表弟而言，也就不存在选择的余地。当公司取消了租房政策而将原来租房的这笔钱直接发给职工以后，表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租住公司提供的三室一厅的房子的情况下，却换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假设其他方面相同，两室一厅的房子总是比三室一厅的房子便宜，对于表弟的需要来说，两室一厅的房子就足够住了，所以，在第三次搬家中，表弟必然会用两室一厅的房子去代替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就是替代效应的作用。那表弟为什么在第三次搬家中没有回到第一次搬家中的一室一厅的房子去住呢？因为当公司给表弟发下一笔租房款时，表弟现在的实际收入比进入公司以前的实际收入大大地增加了。在原来的收入水平下，表弟只能租用一室一厅的房子；现在表弟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既然收入增加了，他就有能力租用两室一厅的房子，当然他也愿意住两室一厅的房子。这是因为收入效应发挥了作用。

那么，如何评价表弟三次搬家的福利状况呢？

虽然从住房大小来看，第一次搬家住的最小，第二次搬家住的最大，第三次搬家住的居中，但实际福利情况则是第三次搬家给表弟带来的福利最大，第二次搬家次之，第一次搬家最小。因为第一次搬家时，表弟的收入水平还不高，只能租用一室一厅的房子，福利有限；第二次搬家虽然房子最大，但对表弟的收入水平和需求状况来说，还不是最合适的，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但由于是公司统一提供的，也无法调整，因此表弟的总体福利水平被打折了折扣，当然比第一次搬家的福利水平还是要高的；第三次搬家使表弟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了最大化，因为他在可以选择第二次搬家的三室一厅房子的情况下，第三次搬家却选择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并将省下的钱用于更值得花费的方面，这种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选择可以使表弟最满意，因而提高了他的总体福利水平。

从表弟三次搬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福利状况的影响，并由此得到启发：相同价值的货币和实物给人们带来的福利状况通常是货币大于实物；在收税的情况下，假如只是为了筹措相同的税款，通常比例税要比定额税给纳税人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在某种损害发生以后，现给予同等程度的补偿，通常反使当事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譬如，通货膨胀发生以后，政府给居民发放同等程度的物价补贴之后，很多居民都会感到补贴以后的福利状况反而比通货膨胀以前有所改善了。

24. 消费者剩余与买东西的乐趣

大多数人都不是到了急用某物的时候才上街买东西，除非人特别忙。事实上，人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总是喜欢上街逛逛，本来漫无目的，结果却买了很多东西。这么说，买东西一定给人带来了不少乐趣。经济学对此做出的解释是：人买东西带来的乐趣，在于他得到了一种消费者剩余。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首先定义并描述了消费者剩余的存在。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的一种心理满足感，这种感觉来自你对某种东西愿付的价格与你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生活中每当一宗交易由双方自愿达成，通常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果：卖方挣了钱，买方得到了实惠，这背后就有消费者剩余在起作用。

我在海口时很想买一个电子辞典，逛了数码商城之后，相中了一款叫“名人310”。逛了几家发现这一款价格都在600元以上，而且打折的余地很小。我虽然很喜欢这部电子辞典，但由于价格不够理想，所以还不能下决心购买它。

到上海学习期间，我住的地方不远处也有一家数码城，有一天下午我逛街时就进去了，在电子辞书的专售柜台果然有“名人310”在出售，标价580，比海口便宜一点，看了机器之后我便开始了讨价还价，售货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人虽然很热情活泼，但价格却咬得很死。我坚持的底线是530元，当我最后报出来后，小姑娘的态度有了一定的变化，她说：“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我得请示一下”。她打电话不知跟谁说了几句之后就对我说：“好了，就做给你吧！”

小姑娘态度的突然转变反使我产生了一丝犹豫。因为一是我还没有货比三家，二是根据买东西的经验，小姑娘有故弄玄虚之嫌，就像有些卖主嘴里说着“您再添点吧，这价钱实在太低了，没法卖！”，但手里已经在给你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向你发出了想卖的信号一样，都是想让顾客感到自己得到了很大便宜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的一种姿态而已。但我不会上当。正在不想买的当头，商场看门的大爷不耐烦地嚷嚷到：“早就下班了，要关门啦！”我正好顺水推舟地说：“唉，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再说吧！”却见柜台里的小姑娘面露遗憾之色，嘴里还说着：“不要紧的，我马上给你开票，很快的！”但我已溜之大吉。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公交车到比较远的地方多看了几家数码商城，发现价格和昨天那家都相差无几，还有个别商场的价格赶上了海口的水平。最后我来到了一家叫“大润发”的规模很大的超市。一进超市，首先看到了一条很醒目的提示标语：“如果您在周边地区购买了比我处更便宜的同类商品，请持有关证明，大润发无条件为您补差！”看到这条承诺，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看来可能不虚此行。

找到了数码柜台，果然看到了“名人 310”。更使我惊喜的是，上面赫然标价 378 元！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低价，而且是在一家有信誉的大超市。物美价廉，我还犹豫什么？立马决定买下。当售货员拿出机器后，我发现这不是我喜欢的颜色，而且再没有别的颜色了。我问售货员：“下午还会有别的颜色吗？”她说不清楚，因为下午不是她的班。我只好遗憾地回去了。中午休息后，我突然萌生了再去一趟“大润发”的念头。到了“大润发”后，我发现柜台换了一位小伙子，我问他：“名人 310 有没有淡绿色的？”“有啊！”果然他拿出了我最喜欢的那一色调。这回大功告成，我终于如愿以偿。那天我很快乐，因为通过购买“名人 310”，我得到了 $(530 - 378) = 152$ 元的消费者剩余。

25. 你钱多了会花在哪里：需求收入弹性及其政策含义

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经济越是发展，人们的钱就会越多，而钱越多，花得钱也越多，但钱花在了哪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又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换言之，如果要问：你钱多了会花在哪里？经济学中的“需求收入弹性”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

需求收入弹性是用来反映特定商品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水平变化的反应程度，也就是当人们收入变动百分之一时，引起的特定商品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率。由此，人们可以把增加的收入的花费去向依据需求收入弹性分为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商品是需求收入弹性小于零的商品。对于这部分商品，当人们收入增加以后，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反而减少了，称为低档商品。也就是说，有了钱以后人们绝对不想光顾的就是这些商品。比如粗粮、陋室和破旧衣服都属于此列。

第二种商品是需求收入弹性大于零但小于一的商品。对于这部分商品，当人们收入增加以后，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却不如收入增加的幅度大，称为正常商品。也就是说，有了钱以后人们不会大量花在这些商品上，对这种商品的花费绝对量也会增加，但相对量却在减少，这些商品主要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十九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将会减少，此法则被称为恩格尔定律。

第三种商品是需求收入弹性不但大于零而且还大于一的商品。对于这部分商品，当人们收入增加以后，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得更多，这类商品称为高档商品（奢侈品）。也就是说，有了钱以后人们必然大量光顾在这些商品上。对于各种名贵的汽车、住房、珠宝、豪华旅游等高级消费品都属于此列。

■ 品出经济学三昧

需求收入弹性是制定经济政策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大的行业，由于其需求量的增长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其发展速度也就应当快些。收入弹性小的行业，由于其需求量的增长要慢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其发展速度就只能慢些。以住房为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出现了房价上涨的趋势，房价上涨是因为房子数量少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人们的住房需求猛增又是因为这些地区人们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就要求建筑业要有较快的增长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汽车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汽车进入了家庭，这就决定了我国汽车业的较快发展，同时也对社会提出了配套的要求，比如，更宽阔的道路和更多的停车位，但很多地方的道路和停车位都是由过去的决策决定的不可更改的现状，这和当前大量的钱流入车市和房市形成了激烈的冲突。

按照恩格尔法则，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的消费在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少。这是恩格尔研究了大量家庭的消费模式后得出的结论，并多次为以后的学者们所证实。这一结论对于农业劳动者而言，决不是一种福音。由于食品是必需品，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多都是小于一。于是恩格尔法则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时期，农民不大可能像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那样富裕起来，因为食品消费不会跟国内总产值保持同步增长，人们增加的收入不大可能大量光顾食品，那么，农民的收入不会像国民收入那样增长得那么快。因此世界上形成了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的惯例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美国这些保护和扶持已取得成效，集中表现在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在 1940 年，每个美国农民种植的粮食可以养活 11 个人。今天，一般的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足可养活 80 人。而在中国农业的保护和扶持还任重而道远。

26. 边际收益递减的故事

一

——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

这个家喻户晓的古老故事在很多年以前就被拍成了电影，如今更以歌曲等多种形式令人耳熟能详。人们感受三个和尚的故事不只是其情节的趣味横生，更在于其蕴涵哲理的深远。从经济学的角度，三个和尚的故事印证了一个规律：边际收益递减。

二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说，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使用多种投入生产一种产品时，当只有一种投入是可变的，随着这种可变投入的增加，产量的增加也会越来越多，但超过一定限度后，这种增加的产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使总产量绝对地减少。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就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从边际收益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一个和尚挑水吃到两个和尚抬水吃，说明边际收益已经递减，当发展到三个和尚时，已经递减到没有水吃了。这应该是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生动的写照。

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一学说在 18 世纪提出之后，发生了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从递减性出发，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趋于下降的趋势，从李嘉图以后的众多西方学者据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抱以极大的同情；另一种观点通过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强烈批判了这一规律，认为它抹杀了技术进步对收益递

品出经济学三味

减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开始就非常强调这一批判性的结论。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争论关键是技术因素在产量变化中的作用。但技术进步因素对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是与考察的时期长短有关的。

三

在短期内假设技术水平不变可能是现实的。这样，在短期内边际收益递减应该被当作一个客观的规律来看待。说它是客观的规律，主要是因为这一规律是由生产的技术特征决定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递增是暂时的，而递减则是必然的。边际产量递增是生产要素潜力发挥，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产量递减，则是生产要素潜力耗尽，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所致。

如果在短期边际收益递减是规律，那么人们是不能违背它的，否则，就会发生“没有水喝”的悲剧。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饥荒事件。据中国科学院在 1989 年的一个报告，当时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有 1500 万，还有一些其他数据也说明，1959 年和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这个损失数字超过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总伤亡。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当时的解释是两条：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联逼债。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因素都不能成立。首先，“自然灾害说”难以自圆其说，中国这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有灾害也不会神州大地处处受灾，总是可以进行余缺调剂，不至于死这么多人。而且历史上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有过，但也没有发生如此规模的大饥荒。所以，自然灾害之说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苏联逼债说”理由也不充分，中苏关系交恶是从 1960 年下半年开始的，大饥荒中大量人口的死亡集中发生在 1959 年到 1960 年的上半年，这与苏联逼债的关系不是很大，况且当时苏联曾借粮食给中国东北，使得东北地区大饥荒的损害最轻。所以，苏联逼债的说法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么，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只能归结为政策出了问题。由于当时实行的政策违背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而受到了规律的严厉的惩罚。在“大跃进”运动所掀起的空前政治热潮下，失去理智的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定胜天”的豪情被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国各地的粮食亩产“卫星”竞相上天，为了获得高产，各地超限度的推行“密植”导致了粮食产量的灾难性的减产，这就是大饥荒悲剧的真正原因。

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短期内是无法超越的，人们只能遵守它，而别无选择！

四

如果在一个充分长的时期内考察某种产品的生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否可以超越呢？

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的因素要发挥作用，人们是可以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的。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是突破边际收益递减的两个途径。

在三个和尚的故事中，因考虑了这个因素，故事也有了新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个和尚渐渐地引入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个和尚的制度创新的故事：一个和尚人挑水吃，总比两个和尚抬水吃或三个和尚没水吃要好，寺庙里的方丈从长计议，决定立下个规矩，鼓励三个和尚都能抢着去挑水。为了奖勤罚懒，方丈规定，三个和尚各自挑水，到吃晚饭的时候，看谁挑的水多就给谁奖一盘炒豆腐，谁挑的水少就吃白饭。于是三个和尚就拼命抢着挑水，展开了挑水竞赛。通过这种制度创新，寺庙里尽管和尚不断增加，但再也没有缺过水了。

三个和尚的技术创新的故事：由于和尚们住的寺庙离河边比较远，一个和尚挑水一趟下来，疲惫不堪，挑的水还不够多，于是三个和尚协作起来，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三个和尚合作挖了一条渠，还装了一个轱辘，第一个和尚负责摇轱辘，第二个和尚负责把水倒入渠中，第三个和尚休息轮换，通过这种安排，三个和尚既轻松又有吃不完的水，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给和尚们带来的福利。

五

从三个和尚的故事再回到现实中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国早已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梦魇中清醒过来，但实际情况是，我国从建国以来，一方面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而另一方面可耕地的面积却因种种原因一直在减少，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有限的土地上连续追加投入，得到的产出的增加将越来越少，这似乎很可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国再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这不能不归功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的突破。

首先是农业科技进步这一技术创新所发挥的作用。

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长期中，这一规律的其他条件——技术水平不变——发生了变化。这就不能不提到袁隆平的故事。袁隆平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的过程颇传奇色彩。

当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一处野生水稻稻穗饱满十分显眼，尽管当时理论界流行说法是水稻属于自花授粉，不存在杂交优势，但袁隆平凭直觉断定这是不多见的

品出经济学三昧

自然杂交水稻。袁隆平把那处十分显眼的水稻种子拿回去重新栽培，长成以后优势不见了。对此别人都很气馁，而袁隆平心理却有数，因为杂交优势是逐代衰减的，这正说明水稻杂交优势可能是存在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以后，袁隆平将一种水稻花的雄蕊掐掉，再用另一种水稻花来授粉，就培育出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种杂交水稻的稻秧长得很旺盛，但稻穗却很平常。袁隆平反而从中得到了启发，这证明了水稻杂交优势是存在的，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是想办法要让水稻杂交优势发挥在稻穗上而不是稻秧上。

不知多少次实验以后，袁隆平他们终于培育出了体现在稻穗上的杂交水稻了。面对大家的狂喜，袁隆平却在发愁，虽然在实验水平上成功了，但在大量种植的情况下，水稻花授粉时，把每一个水稻花上的雄蕊掐掉要费多少人工啊！实验水平的成功并不等于实用意义的成功。

创新还得继续进行，又经过一番周折，袁隆平培育出了一种“雄性不育系”，这种水稻天生不长雄蕊，大量种植时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隔行间种，到授粉时节只需要两个人拿两根竹竿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夹在一起就完成了授粉。至此，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才算完成，水稻种植技术进入到“杂交水稻”时代。在袁隆平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科学家通过联合攻关，现在已全部破解了水稻的基因密码。杂交水稻这项技术因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而对全球的水稻供应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其次是农业用地政策这一制度创新发挥的作用。

制度创新也是遏制边际收益递减的有效途径，因为制度创新通常也会使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得以存在的“其他条件”发生变化，从而走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在我国农业生产方面，1979年我国实行了一项土地制度创新，那就是土地大包干制度。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土地大包干制度实际上是退步了，因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还可以使用拖拉机、播种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而在大包干制度下，农民们放下机器又用上了沿用几千年的农具和牲畜。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增加农业劳动投入难道不会导致农业收益减少？

大包干制度在牺牲了技术的同时却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经济环境下无疑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土地制度创新，农业收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我国农村改革由于在包干制度而获得了成功。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又有不同了，对内我国对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清算，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我国已经入世并与世界经济接轨。大包干制度的土地制度创新效应也已基本释放完毕，如果再不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边际收益递减的制约。在国内外竞争更加激烈和产业化要求更加严格的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告别小农经济，走向规模经营已势在必

行。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土地制度创新又开始了。

2002 年我国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的同时，肯定了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地流转，可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和交换等。这一土地制度创新将对我国农业收益的增加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可以改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但不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需要一个在长期中艰苦探索的过程。当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尚未完成，其他条件不变仍然成立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认识到边际收益递减依然是作为一条规律而存在的。在短期，我们必须尊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定合理的投入限度；但在长期，通过积极地实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战略，打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可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

27. 歧视的后果

歧视就是差别待遇。在生活中最常见的应当是价格歧视，即同样的产品卖给不同的人，收取不同的价格。然而，推而广之，在同一个生活范围内，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的歧视现象，还有多种形式。“不同的人”不仅仅是“经济特征”的不同，而且还可以是“种族特征”的不同，或是“性别特征”的不同，或是“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的待遇”既可以是“不同的价格待遇”，也可能是“不同的就业待遇”，或者是“不同的美誉度的待遇”。由此，除了“价格歧视”之外，相应的还会产生“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等等。

先说说“价格歧视”。

经济分析表明，一旦产品的卖方形成了垄断，就非常容易形成价格歧视，价格歧视通常有三种形式：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

当卖方垄断势力比较强大且信息也比较灵通的情况下，卖方可以对每一单位商品都收取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将消费者剩余全部收归已有。假设某地区只有一个牙医，并且他清楚每一个患者愿意付的最高价格，他将对每一个患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使他们刚好愿意治疗，这样患者们的全部消费者剩余都转移到了牙医那里。这种情况是一级价格歧视。

一个垄断的卖方还可以根据买方购买量的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比如，电信公司对客户每月上网时间的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对于使用量小的客户，收取较高的价格；对于使用量大的客户，收取较低的价格。垄断卖方通过这种方式把买方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据为己有。这是二级价格歧视。

三级价格歧视则是指垄断卖方对不同类型的买方收取不同的价格，买方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卖方收取的价格就越低；买方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卖方收取的价格就越高。通过这种方法，垄断卖方就从需求价格弹性小的买方那里榨取更

多消费者剩余。比如，有的旅游景点对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实行价格歧视，对外地游客收取较高的价格，对本地游客收取较低的价格。

显然，价格歧视使产品的卖方尽可能多地获益，因为通过价格歧视，原本属于产品买方的消费者剩余也被转移到了卖方那里。但是，按照经济学家的分析，价格歧视在经济上却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价格歧视是满足帕累托标准的，通过价格歧视，卖方获取的最大收益，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值。如果垄断的卖方实行统一价格，虽然也能达到一个最大的收益，但却小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值，因而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当然，价格歧视要行得通，垄断的卖方必须能对买者的不同特征进行有效的区分和分割。这种不同可能是买者的需求强度的不同，也可能是购买量的不同，或者是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关键是要对这种不同进行有效的区分和分割。比如，航空公司之间经常发生价格大战，优惠价常常只是正常票价的 $1/3$ 甚至 $1/4$ 。然而，即使是价格大战，航空公司也不愿意让出公差的旅客从价格大战中得到便宜。但是，当旅客去买飞机票的时候，他脸上并没有贴着是出公差还是私人旅行的标记，那么航空公司如何区分乘客和分割市场呢？原来，购买优惠票总是有一些条件，如规定要在两星期以前订票，又规定必须在目的地度过一个甚至两个周末等。老板派你出公差，往往都比较急，很少有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计划好了的国内旅行，这就避免了一部分出公差的旅客取得优惠。最厉害的是一定要在目的地度过周末的条件。老板派你出公差，当然要让你住较好的旅馆，还要付给你出差补助。度过一个周末，至少多住两天，两个周末更不得了。这笔开支肯定比享受优惠票价所能节省下来的钱多得多，更何况，度完周末才回来，你在公司上班的日子又少了好几天，精明的老板才不会为了那点眼前的优惠，而贪小便宜、吃大亏。就这样，在条件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优惠条件就把出公差者排除得八九不离十了。

价格歧视只是实现利润的一种手段，并无道义和伦理上的含义，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则表现为“超经济的歧视”。因为涉及到道义和伦理上的关系，这些歧视不独为经济学关注，同时也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所关注。但是，这些“超经济的歧视”却惊人地适用于经济学的分析。

以“种族歧视”为例，当首数美国。美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对黑奴血腥的贩卖和奴役，到近年来美国种族歧视的种种丑闻，构成了美国人权记录中最尴尬的一页。长期的种族歧视使美国的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民族成为白人之下的二等公民。少数民族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分析，种族歧视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能够增加歧视者的收入，而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同时蒙受损失。要维持歧视，或者说要购买歧视，歧视者就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歧视纯属一种偏好，像任何一种商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品或劳务一样，对它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价格这样一些变量。

在贝克尔的分析中，假定美国少数民族和美国白人使用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但少数民族劳动要素丰富，白人资本要素丰富。因此，白人的劳动收益较高，黑人的资本收益较高。种族歧视使白人劳动收益和少数民族资本收益获益，使白人资本和少数民族劳动受损。但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净损失大于白人，所以，美国种族歧视总体上的受害人是美国少数民族。

南非也曾是一个以种族歧视而著称的国家。从 1910 年以来，南非占少数人口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建起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在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人民经过多年的奋争，终于在 1994 年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也成了南非历史上首个黑人总统。新政府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的同时，还对在种族歧视期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

南非的国家赔偿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对在南非的华人却并不是什么福音。在南非实行种族歧视期间，华人因为肤色不够白，作为黄色人种的华人自然也在被歧视之列。而在南非终结种族隔离政策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时候，华人却又因为不够黑，因而被排除在国家赔偿的对象之外。如此，南非的种族歧视只能由华人来买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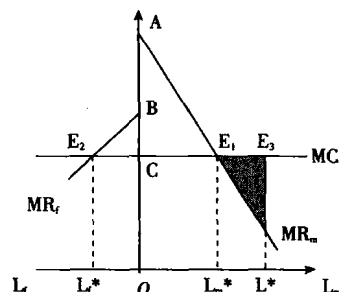
说到“性别歧视”，还必须回到中国。虽然说性别歧视也许在整个世界上都算得上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在中国人心中烙上的性别歧视的印记就格外深重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性别歧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不能参加科举，女性不能做官，女性不能入伍，大多数的女性甚至不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在很多庄严肃穆的场合，女性还要回避，等等。因此，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戏剧中，有代父从军的“女将军”——花木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状元”——孟丽君，还有阴差阳错的“女附马”——冯素珍，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性别歧视”的主宰下的“漏网之鱼”，因而才成为戏剧中具有独特看点的题材。

如果效仿贝克尔，我们也可以对“性别歧视”进行一些经济分析。“性别歧视”的结果不仅使女性受到损害，而且也使歧视女性的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受损。假定男性与女性在生产上的边际成本相同，但男性的边际生产率总体上高于女性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边际生产率不论男女都是递减的，所以，女性尽管在生产率的总体上低于男性，但在边际上，还是有不少女性，比如，名列前茅的女性的生产率有可能比男性中排在后面的生产率要高。在这种条件下，“性别歧视”将女性驱逐出生产，必然将使社会总产出受损，而取消“性别歧视”将使社会总产出扩大。

如右图所示， MR_m 为男性边际生产率曲线， MR_f 为女性边际生产率曲线，

MC 为边际成本曲线。那么，在不存在“性别歧视”的条件下，社会产值最大化的男性就业量为 L_m^* ，女性就业量为 L_f^* ，社会总就业量为 $L^* = L_m^* + L_f^*$ ；在“性别歧视”存在的条件下，女性不能就业，社会就业量要达到 L^* 的水平，社会就必须雇用低生产率的男性，而使社会产值受损如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随着男女平等观念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中国“性别歧视”似已渐成昨日黄花。但与此同时，地域歧视却在悄悄地抬头，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2005年3月30日，深圳市怡丰路黄龙塘市场附近，警方挂出了“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把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推向了格外喧嚣的地步。

河南人惹谁了？这已成为我国“地域歧视”中最悲壮的叩问！为什么遭受“地域歧视”的不是别人而是河南人？

首先应该承认，河南人之所以被歧视，是因为在河南人中的确是出了一些害群之马。但害群之马哪儿都有，为什么“地域歧视”的板子偏偏打在了河南人身上？客观地讲，河南地处中原，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的农村与城镇居民比例同中国的总体比例基本一致，河南最具整个中国的缩影。好的方面，河南是代表：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境内，造纸、活字印刷、火药，可能还有指南针也都是在河南发明的；坏的方面，河南也是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一家河南省医药公司制售假药的案件，被中央政府打击假冒伪劣消费品的活动曝了光。尽管每个省份都有假冒伪劣产品，但此后中国人一想起这类问题就会想到河南。另外，河南部分农民在不卫生的技术条件下卖血，导致艾滋病患者人数剧增的事件，也极大地损害了河南人的形象。

但“地域歧视”却不是一个多赢之策，虽然表面上，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使全体河南人为之买单，然而“地域歧视”的受害者绝不止于此。

第一，“地域歧视”将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因为“地域歧视”只认区域不认人，河南人中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如果因为“地域歧视”而被拒之门外，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损失就大了。

第二，某些“地域歧视”本身就意味着损害。以深圳警方的“地域歧视案”为例，“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那么，河南籍以外的团伙敲诈勒索犯罪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不是纵容犯罪吗？

第三，“地域歧视”将危及每个人。今天他们被歧视了，明天就有可能是你们，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例如，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但到大批河南人因天灾人祸四出逃荒时，操河南方言的人就成为被歧视者。如果我们任由“地域歧视”之风形成，以后必将人人自危。

第四，就地域歧视而论，歧视者自己也难免自讨苦吃。且不说，深圳警方因地域歧视一案后来吃了官司而且败诉了，“河南籍”本身还是需要定义的。《辞海》（1999年版）关于“祖籍”的解释是“原籍；祖先居住占籍的地方。”这种解释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给人一种莫衷一是的感觉。“祖”，《辞海》说指“父母以上的尊长”，《辞源》说指“祖先，祖父”，两种解释的意思是一致的。那么，是祖籍河南叫河南籍呢？还是出生地在河南叫河南籍？还是长期在河南工作生活叫河南籍？如果举报人按照以上标准都去领奖，必定会让歧视者穷于应付。如果按祖籍标准，也许一个人可能自以为不是河南人，但经不住往上推几代，说不定也是河南人了。比如，毛泽东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人，按《韶山毛氏族谱》中的《源流记》：毛太华“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一些人就认为毛泽东祖籍在江西吉安吉水龙城，即今吉水县八都镇。但1997年郑艮安发表《毛泽东祖籍在浙江衢州》一文，打破了毛泽东祖籍江西说，明确提出了浙江衢州说。在郑艮安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刘玉琛著文《毛泽东祖籍新溯——河南原阳》，经过考证，说韶山毛氏的始祖为周文王之子毛伯郑，其封地在今河南原阳境内。

由此，“地域歧视”可能会闹大了！

28. 游戏与市场进入

在中华文化中与酒相关的典故和轶事数不胜数：曹操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李白借酒赋诗，武松借酒打虎，皆被传为美谈。与酒相关的各类游戏精彩纷呈。比如，猜拳行令就是最普通的一种形式。人们通过这种游戏为饮酒助兴。但凡游戏就会有输赢，如果借助一些经济学的方法，我们就能够破解其中某些游戏输赢的秘诀。

通常在人们所玩的游戏里，一般是不存在占优策略的，即必胜的策略。比如，在“剪刀、石头、布”的游戏中，游戏规则规定：剪刀胜布，布胜石头，石头胜剪刀。在这个游戏中，如果两个选手同时出招，那么谁也没有一个必胜的策略，每个选手只能通过揣摩对手的心理并采用一定的概率组合，才有可能获胜。而这也正是游戏本身的乐趣所在。然而，当我们把“剪刀、石头、布”的游戏规则稍微修改一下，两个选手不是同时出招，而是交替出招，就像下棋一样，那么，对第二个选手而言，这里就出现占优策略了。比如，第一个选手出“剪刀”，第二个选手就出“石头”；第一个选手出“石头”，第二个选手就出“布”；第一个选手出“布”，第二个选手就出“剪刀”。可见，在一个游戏中一旦出现了占优策略，就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因而这个游戏也就不能玩了。

有些游戏可能有一些隐蔽性，表面上看似不存在占优策略，因而是可以玩的，但实际上它有占优策略，当掌握策略的人和没有掌握策略的人玩这类游戏时，掌握策略的人总能百战百胜，形成骗局。当然，运用博弈论的一些知识，我们也不难揭开这种秘密。

比如，人们经常在酒桌上玩的一种游戏叫做“挤三十”。这个游戏是：准备30个棋子，两个喝酒的人轮流抓棋子，每人每次最多抓3个棋子最少抓1个棋子，抓住最后一个棋子的人罚酒认输。乍看起来，在这个游戏中似乎两个人都有被罚酒的可能，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先抓必胜的游戏。运用博弈论的“逆推法”，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游戏中的占优策略。

这一游戏取胜的目标是让对手拿到第 30 个棋子，那么，第一个选手显然必须要抓到第 29 个棋子，方能获胜。而要抓到第 29 个棋子，考虑到对手一次最多只能抓 3 个棋子，所以第一个选手一定要拿到第 29 向前数 4 个数的那个棋子，即第 25 个棋子。用同样的方法向前推，第一个选手要想获胜，必须抓到第 1 个棋子。因此，第一个选手抓到第 1 个棋子是取胜的第一步，接下来，对手每次抓“若干个棋子”，第一个选手只要抓“4 减去若干个棋子”，就能稳操胜券了。所以，在这个游戏中，只有先出手的人才有可能把握获胜，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先动优势”。

游戏中的输赢其意义只在于娱乐，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谁若能及时把握“先动优势”，谁就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先动优势”这一特性在厂商选择市场进入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例子在大型连锁折扣店的经营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沃尔玛是大型连锁店行业的一个极其成功的公司。沃尔玛的成功固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关键在于其采取了成功的市场进入策略。大多数的经营者都认为，大型折扣店依靠较低的价格、较低的装修与库存成本经营、要赚钱就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因此，这类商店无法在一个人口在 10 万人以下的城镇上经营并获得利润。但沃尔玛的经营者山姆·华尔顿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从美国西南部的小镇上开始他的实践，到 1970 年就开出了 30 家“小镇上的折扣店”，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沃尔玛的实践表明，一个 10 万人口以下的小镇所具有的市场容量并不太大，但却足够容纳下一个大型折扣店，并能让它获得一定的利润。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其他连锁店的经营者也认识到这一点时，沃尔玛已经大量占领了这样的市场。特别是，对这样的小镇来说，开出一家连锁折扣店可以盈利，因为这家折扣店可以成为小镇市场上的垄断者；但如果开出两家来，市场容量就不够大，这两家折扣店就必然要亏损。因此，对小镇市场来说，连锁折扣店的竞争就面临一种市场进入的博弈。

当厂商面对这样一种博弈的时候，“先动优势”就是厂商成功的关键。一家厂商一旦进入市场，第二家厂商就只能选择不进入的策略，除非它抱有“拼个鱼死网破”这种非理性的经营观念。先进入市场，就成为这个市场上的垄断者，并可获取 50 万元的年利润；如果有第二家厂商进入，那么两家都要亏损 20 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先进入的厂商，凭借先动优势垄断整个市场。

29. 囚犯难题与机制设计

在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中，博弈论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囚犯难题”是博弈论中的一则经典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甲、乙两人涉嫌犯案而被警方关押。在审讯中两人分别被告知：如果一人招了供而另一人不招，招供的那个人将免罪获释，不招的那个人被重判 10 年徒刑，这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人都招供，有可能各判 8 年徒刑，这是因为双方扯出了更多案件的结果；如果两人都不招，则因证据不足而各判 2 年。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很显然，甲、乙两人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是招供还是不招的选择。对甲来讲，不论乙做出何种选择，“招供”是甲的最优选择；同理，对乙来讲，不论甲做出何种选择，乙的最优选择也是“招供”。这样（招供，招供）就构成了这一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即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结果的一种均衡状态，他们得到的结果是每人被判刑 8 年。

在这个故事中，每人被判刑 8 年最终结果，若从两人福利总体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所有结果中最坏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两人都不招供，每人各被判 2 年的那种情况。但是，这种（不招，不招）从集体的意义上最好的结果，却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故事被命名为“囚犯难题”。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生动地揭示市场失灵的现象。

根据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必然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这一原理，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对该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证明。但是，任何经济理论只有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的过程中，尽管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这种情况就是市场失灵。从“囚犯难题”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个人角度最优的选择（招供，招供）与集体角度最优的选择（不招，不招）产生了不一致。这

品出经济学三味

种市场失灵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那么,怎样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呢?在博弈论看来,不是采用集权和专制的方式,而是采用机制设计的原理来加以纠正。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是最基本的一种机制,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设计一些制度安排,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囚犯难题”的故事中,就有可能通过机制设计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比如,由于江湖义气和黑社会的存在,形成了一种惩罚机制。因为任何一方若因招供而被释放出去的话,就会受到黑社会的报复性惩罚,这样,双方都会坚决不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最优的选择就成了(不招,不招)。这与集体最优的选择变得一致了。这样,市场失灵就可以用机制设计来加以纠正。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市场失灵不乏成功的例子。我国消费者在购物时,往往不习惯于索要购物发票,而某些商家实行的不开发票可以优惠的作法,也加剧了人们购物不要发票的倾向。对于商家来说,不开发票逃避了税收,对于购物者来说,不开发票少掏了腰包,因此从私人的角度来看,不开发票似乎是一种最优选择;但是不开发票却导致了税款流失,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又将影响国家职能的发挥,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所以,从集体的角度来看,不开发票决不是一种最优选择。这里,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产生了冲突。通过行政办法解决这一冲突必然会因成本高昂而收效甚微,但从机制设计的思想出发,还是不难解决这一问题的。比如,税务部门通过“发票抽奖”的活动,向人们提供一种购物要发票的激励机制,让购物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索要发票。

好的机制设计能够产生正向激励,而不好的机制设计则会产生反向激励。比如,当英国爆发口蹄疫期间,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怪事:英国农民故意将未感染口蹄疫病毒的牲口感染上这种病毒。原来这与英国政府的一个机制设计有关。为了尽快遏制口蹄疫的蔓延和弥补口蹄疫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英国政府决定,对每一头被屠杀的牲口都以口蹄疫爆发前的市场价格给予经济补偿。英国政府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这个措施,鼓励农民配合政府遏制口蹄疫的蔓延。但由于口蹄疫的爆发,使得牲口价格一跌再跌,口蹄疫爆发前牲口的市场价格早已高出了市价许多,英国政府以口蹄疫爆发前的市场价格进行经济补偿的政策,诱导了一些农民擅自挪动牲口,争相感染口蹄疫病毒,使得口蹄疫愈发严重。在此例中,如果英国政府在口蹄疫爆发期间,按随行就市的价格进行经济补偿,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30.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虽然经济学很早就认识到了信息的价值，但传统理论只是在假定完全信息的条件下研究经济问题，这显然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度简化。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研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不完全信息是指由于信息不完全或者说不对应，一方占有信息优势，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这时信息优势的一方就会利用他的优势为自己谋福利，产生机会主义的动机，使价格机制失灵。如果这种机会主义发生在市场交易的事后，就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如果这种机会主义发生在市场交易的事前，就被称之为“逆向选择”。我们分别以保险市场和旧车市场为例来说明。

在保险市场上，投保人是保险的买方，保险公司是保险的卖方。在保险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主要发生在交易之后。当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之后，保险的买方（投保人）显然要比保险的卖方（保险公司）更有信息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投保人的行为，或者无法完全获知投保人行为的全部信息时，投保人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使自己受益而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这就产生了“道德风险”。比如，投保人在买了家庭财产盗窃保险之后，就不愿花钱加固门锁；在买了汽车偷盗保险之后，就不愿安装先进的防盗装置；在买了火灾保险之后，就不再细心察看灭火设备等等。而保险公司所能得到的信息只能是实际发生损失的情况，至于这种损失是由于意外情况造成，还是由于投保人的行为不当造成，保险公司无从得知。或者说，保险公司要弄清事实真相，所付出的成本会高得惊人。

在旧车市场上，卖方显然比买方更有信息优势，因为他更知道车的底细，他对旧车的内在质量要比买方知道得多。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卖主往往会以次充好、以高档车的价格出售低档车。比如，将生锈的钢板喷上油漆，隐瞒实际的行驶里程等等，而买方在短期内无法分辨。当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后为

品出经济学三味

时已晚。这样，明智的买主只愿购买低档车，而卖方即使真把高档车带进市场也只能被买主按低档车对待。这样，就使得高档车全部退出市场，在市场上成交的就只有低档车了。在旧车市场上，这种高档车不能卖出去，而低档车却先卖出去的反常现象就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相比，“逆向选择”往往发生在市场交易之前。其实在前述保险市场上也同时存在着“逆向选择”，所不同的只是买方拥有信息优势，这时产生的“逆向选择”是只有风险较大的人才去购买保险。

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人们可以采用某种机制设计。比如，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就可以通过“部分保险”或“保单内加入扣除条款”的机制，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部分保险”使得保险公司只对承保财产的部分价值承担保险，其余部分由投保人自己负担；“保单内加入扣除条款”是指保险单内规定保险公司对某一数额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的条款。通过这些机制，能让投保人分担部分风险，同时也留给投保人一些动力去采取防范措施，从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在旧车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使得旧车市场成为穷人买车者和劣质车出售者或急于脱手而亏本出售者汇集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有一个按质论价的地方，在旧车市场上，高档的旧车车主也不会轻易甘心被低档的旧车驱逐出市场。为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就产生了一种“信号发送”的机制。这种机制通常表现为如下作法，高档旧车的卖主可以提供较长时间的免费保修承诺，甚至向购买者提供质量保证，如果买到的旧车质量有问题，购买者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退货或得到某种经济补偿。通过以上的方式，高档旧车的车主们就发出了一种信号，以区别于低档旧车，因为低档旧车的车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再也不能以次充好了，这样就避免了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的发生。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政府也可以通过健全立法和加强指导等手段来降低“道德风险”，比如，在旧车市场上，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一种旧车服务部来向购车人提供指导，以尽量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从而达到减少“逆向选择”。

31. 反盗版中的帕累托改善

盗版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是困扰人类精神产品正常生产的一大社会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众所周知，在诸如电脑软件、影视产品和出版物等生产领域内我国一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盗版活动。人类科学技术的一切进步都在盗版活动中得到了体现。盗版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设备越来越精良，盗版产品的质量也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消费者想通过产品的质量来辨别正版与盗版也已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由此导致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明星们在出版个人专辑时往往遭遇到进退两难的尴尬。一方面，专辑被疯狂地盗版印证了人气的火爆，所以明星们都不愿面对专辑无人盗版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当红的明星们又难以舍弃因专辑惨遭盗版而损失的巨大经济利益。

从正版产品到盗版产品的时间差也越来越短了。据说，国内第一贺岁片大腕儿冯小刚的新片《一声叹息》尚未公开发行，盗版光盘已捷足先登，抢先投入了市场，结果《一声叹息》的“首映式”异常清冷，让人始料不及，再加上票房收入的损失，的确给《一声叹息》的原创人员以沉重打击。盗版书籍之猖狂亦不让光盘。当代大散文家余秋雨，其作品以历史文化为根基，溶入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深受海内外华语读者的喜爱。但令人烦恼的是，几乎每本散文集出来之后，无不被疯狂盗版，以至于作家新近的一本散文集《霜冷长河》在出版前竟未敢取书名，据说书稿还是作家一步一个脚印亲自送到主编手中的。余秋雨说：“能在盗版书出版前，抢上十天时间就算是打了一场漂亮仗。”由此，盗版行动之迅猛在我国可见一斑。

盗版产品为什么能长盛不衰？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专利及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相对较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不论是对正版产品的消费意愿还是对正版产品的支付能力都是偏低的。这就决定了我国

■ 品出经济学三昧

消费者在精神产品的消费方面存在着较普遍的“盗版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正版产品在生产中要投入巨大的前期制作成本，这就决定了其价格不可能像盗版产品那样随意降低，而盗版产品由于没有这一巨大的前期制作成本，它和正版产品相比就拥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从而更能满足市场需求。在这一基本国情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促使每个消费者自觉使用正版产品，那么，盗版现象就不会轻易消失。

盗版产品和盗版现象的大量存在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现象。比如，盗版有时会成为市场开发的一种可以利用的商业信号。据《南国都市报》报导，有这样一个事例：以唱海南话歌曲而成名的海南本土音乐人冯磊，在刚出道时，曾经为联系投资人伤透了脑筋。冯磊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海南话歌曲专辑《老家海南》的CD。为了扩大海南本土音乐的影响，冯磊计划发行专辑《老家海南》的VCD和录音带，但是由于考虑到海南话歌曲的市场问题，投资人不能下定决心投入资金。后来有一件事改变了这种状况，这就是几位投资人在调查市场时，惊奇地发现市场上已经有了从《老家海南》CD翻录过来的盗版录音带。这下投资人开始觉得，这个投资应该可以“双赢”。于是很快就促成了《老家海南》的VCD制作发行合同。

由此看来，关于盗版与反盗版的问题，我们应该多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些分析。记得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萧伯纳曾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的确，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帕累托更明确地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能在不损害某些社会成员的福利的条件下，至少能提高另外一些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就存在着使人们的福利改善的可能。这种改善后来在经济学上就叫“帕累托改善”。根据这一经济学的哲理，让我们来谈谈盗版及反盗版的问题。

不可否认，在盗版的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到了改善，这就是盗版者和消费者。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是“帕累托改善”，因为它损害了正版产品生产者的福利。盗版产品的这种“非帕累托改善”的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恶性结果：如果盗版现象不能被有效地制止的话，正版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就得不到保证，人们创新和创作的原动力就会消失，这样，社会的精神产品的供给就会严重不足。因此，为了保护正版产品生产者的权利，促进创新和创作的原动力，就有了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据说在人类近代发展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因为较早地确立了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而东方世界的落后则是因为缺乏这么一个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为反盗版提供了一种基础和依据。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了反盗版的打击力度。通过各种手段销毁了大量盗版产品，端掉了几百家非法光盘生产线，在打击盗版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打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是保护正版产品知识产权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也

应该认识到这种打击方式毕竟也付出了代价。比如，被销毁的盗版产品也是一种资源，本来也是可以用于消费的，却被人为地销毁了，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消费者本来可以消费的产品没有消费到，也是一种福利的损失。当然，我们再一次重申，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这种代价是应该付出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打击办法呢？也就是说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能不能使消费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也得到提高，或者说使社会总的损失减至最小，从而寻求一种“帕累托改善”呢？

我想，从下面几方面着手是可以达到这种改善的。

首先，从长远来看，应该完善和健全专利和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与执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这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已出台了，关键是要强化执法从而改变目前执法方面的不力状况。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来逐步增强人们的“正版意识”。只有这样，反盗版的执法成本才能降下来，普遍性的盗版现象才会不复存在。

其次，就近期来看，对盗版行为最好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打击”的办法。对那些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内容不合法（反动淫秽）的盗版生产者要严厉查处，对这些盗版产品则坚决予以销毁；对那些制作精良（假冒但不伪劣），内容合法（不反动也不淫秽）的也要严厉查处，因为它侵犯了知识产权，但对这些盗版产品本身，则完全可以区别对待，不必一概都付之一炬，比如，可以将其转给版权所有者来处置。这样，既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版权所有者的损失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因此，这里形成了“帕累托改善”。

最后，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我国目前几乎全民皆用盗版的大背景下，反盗版的执法成本自然是居高不下的。这样，法律手段很难包办一切，但是知识产权还是要保护的，因此在逐步改善法制环境为主的前提下，辅之以必要的补偿手段是现实可行的。这里的补偿手段是指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被侵权的权利所有者的损害程度给予一定的补偿金的做法。这种补偿金的来源可以以“补偿税”的形式从民间征收，也可以从现有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之所以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盗版的存在使全民为之“受益”，那么依照“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道理，全民也理应为之承担一定的责任。

“补偿税”方案是这样一种思路。第一，在承认正版产品的原创者享有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在法律上不再禁止他人的复制行为，从而使以前非法的盗版行为合法化、公开化。这样，原来的盗版行为就转变为复制行为：原来的盗版产品就转变为复制产品。所不同的是，复制产品比正版产品便宜，消费者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第二，虽然复制是合法的，但是复制者必须申报登记并依法纳税。这种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补偿税”，它由税务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征收。在征收的

品出经济学三味

税款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按一定比例补贴给正版产品的原创者以保护其知识产权。如果某种产品被复制的越多，这种产品得到的补贴税款也越多，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就越得到了体现，而消费者和复制者也分别得到了福利的改善。

第三，当盗版合法以后，许多原来处于地下的盗版行为就会公开到地上来，成为复制者合法经营。当然，同时也会有另一些盗版者为了逃税，仍处于地下，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那种打击盗版的行动就转变为打击偷漏税的行动。也许有人会说，打击偷漏税本身并不是一件很有成效的事情，由此而否定“补偿税”的可行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打击偷漏税是我们维持正常经济秩序的最基本的防线，打击偷漏税的对象不仅包括侵权的生产者，而且也包括合法的生产者。如果说，我们真的不能有效地征收到“补偿税”，那么对盗版这种侵权行为的其他处理方式就更难付诸实施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由“禁而不止”到“补偿税”这种打击行动的转变，它最大的好处是给人们带来了福利上的“帕累托改善”。

32. 让大家受益的事谁来做

当 你需要消费一种物品时，通常你要花钱来购买，否则你将无法得到它，然后当你消费这种物品时，别人就不可能再得到并消费它了。这是在我们生活中占绝大多数的由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所具有的特征。然而还有一种和私人物品完全不同的所谓公共物品，比如：国防、公路、电视节目等等。这类物品由于收费通常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类公共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以后，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消费它，也无法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消费范围之外，这是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征；此外，像国防、公路、电视节目这样的公共产品在消费时又具有这样的特征，即一部分人在消费的同时不妨碍另一部分人同时在消费，这是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特征。所以，国防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一旦建立起国防体系，你受益并不影响我受益，所有公民都会从中受益，不管他们是否付费。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以上两个特征：非排他性特征意味着公共物品不能收费，非竞争性特征似乎又意味着公共物品不必收费，这就决定了公共物品通常是那种让大家受益而又无法收取回报的事情。所以，公共物品传统上就不能由市场有效的提供，而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是通过税收的方式筹集资金，然后通过国家预算向国民提供各种公共物品。以美国为例，近来对国防这种公共物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美国的国家预算中国防支出的比例一再提高，现以稳居各类预算支出的首位。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都不能直接收费。比如，公路可以通过设立收费站而对过往的车辆直接收费。但是，通过设立收费站而对公路的消费直接收费，也使公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立收费站本身就是在损失社会资源，同时收费站的设立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车速。为了避免这些社会浪费，某些间接收费的方式就值得考虑。以海南高速公路为例，与大陆大部分地方不同，当你行驶在海南的环岛高速公路上时，你不必考虑停车交费的麻烦，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收费站。难道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海南的公路是免费行驶的？不是！海南高速公路的消费实行了间接收费的方式，也就是将养路费打在了汽油费中，再由汽油费中拿出一部分来结算给海南高速。这是一种结合了海南岛的自身特点的收费创新。

实际上可以实行间接收费的不止高速公路一种公共物品，电视台和大多数的网站也都是通过间接收费而提供公共物品。电视节目和网站信息是公共物品，谁都可以看，而且不必付费，但是电视台和网站可以通过提供广告服务而收费。当公众通过电视和网站欣赏节目或搜集信息时，就得忍受广告的干扰。这是解决电视节目和网站信息这些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一种间接收费方式。如果你不想经常受到广告的干扰，你也可以选择付费的电视和网站。随着技术或其他条件的改变，原先无法收费的东西现在变得可以收费了，比如，电视信号通过加密和解密就由间接收费方式变成直接收费方式。

如果对公共物品的直接收费成为可能，典型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已经发生了变异，尽管这种物品在使用上还具有非竞争性，但在收费上已不具备非排他性，这种公共物品就变成了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又叫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的特殊性在于，在一定条件下它和公共物品一样具有非竞争性，你用不影响我用；但在收费上又具有和私人物品一样的排他性，你不付费就被排斥在门外。当公共物品变成准公共物品以后，其由私人来供给也不成为问题了。其实在间接收费方式下，已经出现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在国外有很多电视台就是由私人经办的，现在大量的网站也都是私人提供的。在直接收费方式下，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知识产权物品。知识产权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一种公共物品，其在使用上是非竞争性的，但版权法或专利法等法律给知识产权物品强制性地提供了一种排他性的特征，没有付费就不能使用，否则就是侵权行为。从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物品的法律保护有加强的趋势，其目的是为了鼓励私人对知识产权物品的供给。

某些公共物品除了国家和个人提供方式外，由行业协会来提供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因为公共物品国家提供毕竟增加了财政负担，由私人提供始终存在着收费上协调的困难。例如，海南房地产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楼盘价廉物美而空气质量好，虽然也吸引了一些岛外人士的注意，但却始终没有一个大型的对外推介的规划。难道是岛内没有达到这种实力的开发商，相反，很多开发商都具备这种实力。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呢？通过调查方知，向外推介海南的房地产对众多开发商是公共物品，其中一家做了，整个海南房地产界受益，这种让大家受益自己受累的事自然谁都不愿做。后来由海南房地产协会牵头，组织多家会员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对外推介活动，还评出了海南十大最受岛外人士欢迎的楼盘。成功地向外界展示了海南房地产的独特吸引力。这说明由行业协会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的有效性。

33. 假如由别人来买单

生活中人有高矮胖瘦俊丑各种各样，但经济分析中只承认两种人，消费者和生产者，而且每个人都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作为消费者，每个人通过物品的消费从中获得满意感，也就是效用。在正常情况下，你的满意程度只与你消费的物品和你自己的行为有关。但市场经济有时也会意外地使你的效用与别人消费的物品和别人的行为发生了联系，这就是消费的外部性。消费的正的外部性将使别人消费的物品和别人的行为提高你的满意程度。比如，邻居养在阳台上的鲜花，也同样给你带来了心旷神怡的美感，你既无需告知对方，更不需付费；而消费的负的外部性将使别人消费的物品和别人的行为降低你的满意程度。比如，你是一个不抽烟的人，却偏偏和一个嗜烟如命的家伙住在了一个房间，虽然你也没有说什么，但被动吸烟给你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此你受害匪浅，却又无处诉说。

作为生产者，每个人都要与成本和收益打交道，这是在市场经济中没人能够例外的。而且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结果必然是，每个人的成本都是他自己的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每个人的收益也都是他自己行为的收获。但市场经济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的成本不光是你自己的行为引起的，还有别人的行为给你引起的成本；你的收益也不只是你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也还有别人的行为给你带来的收益。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了生产的外部性。发生外部性以后，你的成本就包括了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你的收益也包括内部收益和外部收益。

如果你作为一个生产者，你的成本等于内部成本加外部成本，这就说明发生了负的外部性。一个自来水厂通过对一条河的河水进行净化而向居民供水，其投入设备折旧和员工的工资构成了其成本，其向居民供水所得构成了其收益。这时其成本和收益都等于内部成本和内部收益，没有发生外部性。后来，在这条河的上游又开了一家造纸厂，造纸厂生意非常好，但自来水厂发现，造纸厂的生意

品出经济学三味

越好，自己的效益就越差。原来造纸厂向河里排污给自来水厂对河水的净化带来额外的负担。自来水厂的成本除了来自自己的行为之外，还要承担来自造纸厂的行为引起的成本。也就是说，自来水厂凭白无故地为造纸厂买了一部分单，这就是生产的负的外部性。对于这种负的外部性问题，起初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对制造外部性的一方予以制裁，比如罚款或迁停关转等等。后来经济学家则认为，制裁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通过明确地界定产权，使市场机制自己解决这一问题，也许会更好。

正的外部性的情形正好相反，即你的收益等于内部收益加外部收益。正的外部性存在表示你免费搭了别人的便车。比如，一个苹果园主通过出售他的苹果而获得收益，他除了给果树施肥、除草和剪枝之外，就能靠老天的恩赐收获苹果了。可忽然来了一个养蜂人，结果由于一大群蜜蜂给苹果花充分授粉的缘故，那年苹果园主的苹果获得了大丰收。而这一切并没有花费苹果园主丝毫。这正是生产的正的外部性。在这个例子中，生产的正的外部性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苹果园主获得了丰收，养蜂人采到了蜜。但生产的正的外部性也并不总是这样尽如人意。在有些情况下，正的外部性导致的搭便车效应将极大地损伤生产的效率。比如，在我们传统国营企业中，由于体制的原因，虽然两个人能力和努力不同，因而对生产的贡献不同，但只要两个人资历相同，那么他们得到的报酬就基本相同，这样，干得差的就搭了干得好的便车，于是谁也不愿干了，国营企业的效率怎么会不江河日下？所以，现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能消除外部性而充分体现效率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

34. 民主的魅力与缺陷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停止过对民主的探求，什么是民主？民主是通过大多数人的参与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意愿与保障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因此民主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专制就是少数人说了算，而独裁则是将大多数人的意愿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民主相对于独裁的魅力不在于专制体制下独裁者个人有多坏，而在于民主体制在为大多数人谋取福利时，能较好地突破独裁的弊端。独裁的弊端之一是，即使独裁者个人的出发点完全是为着大多数人的福利着想的，但用于独裁者个人的权威和局限，却往往造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退一步讲，即使独裁者个人总能“好心办好事”，但相对于民主，独裁也还是有其弊端的，那就是独裁者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利，而破坏了民主制下“好事大家做”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社会，好事专由某一些人或某一个人垄断地来做，就剥夺了其他人做好事的权利。这既不公平又无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对领导人连任的届数都有一定限制。

民主制度的运行有效地突破了独裁体制下的这两大弊端，因而它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又因为民主是与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就被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们不懈地追求。在我国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被举为“德先生”而大加提倡，而西方著名诗人斐多非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著名诗句，在精神的层面上，故然可以看作是对自由的讴歌；但在现实的取向上，却是张扬了民主的魅力。

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化，对于民主也是一样，因为民主也不是万能的，民主同样存在着缺陷，如果民主绝对化了，其缺陷也同样会产生新的弊端。

民主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绝对的民主将产生巨大的成本，而抵消了其效率。如果事情不论大小通通付诸于全社会的公共选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最彻底的民主，但实际上，这又是最不经济的民主了。所以，即使在世界上最民主

■ 品出经济学三昧

的国家里也没有实行过这种民主。人们通常只把选举领导人和决定国体这样的大事交给全民来公决，而把其他大部分的事情授权于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的制衡机制中进行运作。

即使忽略了绝对民主的运行成本，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绝对的民主在理论也是行不通的。如果将社会全体成员的意愿加总而形成一种社会福利函数，那么理想的社会福利函数应该满足这样一些条件：第一，所有的社会福利状态都可以排序；第二，社会排序是可传递的；第三，排序与个人偏好正相关；第四，社会排序唯一地取决于个人偏好；第五，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社会。经济学家阿罗证明了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原因，民主体制下的公共选择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上述五个条件中有些只能是注定被有限地追求；在一些一致同意的规则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公共选择，将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投票进行公共选择是最常见的办法，然而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每个人都表明自己的偏好的情况下，却有可能选不出一个均衡的结果；或者公共选择的结果可能与人们的偏好无关。

假设投票人甲、乙、丙对三个备选方案 A、B、C 的偏好评价是：甲认为 A 优于 B 优于 C；乙认为 B 优于 C 优于 A；丙认为 C 优于 A 优于 B。如果三人同时投票选一个方案，结果将是 A、B、C 三个方案各得一票，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过半而入选；如果选择程序分阶段淘汰，即先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然后再与第三个方案竞选，那么容易验证，根据不同的选择顺序，A、B、C 三个方案都将有可能入选。这样，公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就不取决于人们的偏好而取决于选择程序本身。这就是投票悖论。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投票悖论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了绝对的民主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在推进民主建设的同时，也不可将民主绝对化和极端化。

35. 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

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市场日益繁荣，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让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制假贩假屡禁不止，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严重伤害，诸如“热水器置人于死地”、“美容不成反毁容”、“影碟机不出图像”之类的报导时常见诸报端。虽然各有关专业打假机构，包括各地工商管理部門和消费者协会等，不断增加打假力度，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有关条款出台以前，这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究其原因，恐怕部分地取决于有关法律界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界限方面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有效的经济打假行动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首先作些说明。科斯定理是以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名称命名的。其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外部性因素的存在，市场主体，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某些活动中可能会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比如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影响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的例子，在此例中企业并不负担噪音污染的成本，而是将其转移给了消费者和社会，这就是外部性因素的存在。这样，自发的市场机制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就会失效。为了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纠正市场的失效，传统的经济理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加以解决：比如，强令企业迁到另一个地方或处以罚款等。20世纪60年代，科斯在他的一篇经典性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中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办法未必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方式。

科斯首先论证了，在不存在市场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即在利用市场机制达成

■ 品出经济学三昧

交易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代价和费用,或者说在此过程中不会有种种“扯皮”现象发生,任何的产权初始界定都不会影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只要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清楚的,任何形式的产权界定都会产生同样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所不同的仅仅是财富分配效果的差异。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交易费用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实际上任何一项市场交易都要在寻找交易对象、签订契约以及监督履行等方面花费大量精力和费用,而且,日常经济生活中“扯皮”现象也是屡屡会发生的,也正是这些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前例中企业和居民对噪音污染问题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行加以解决,从而造成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科斯强调了不是简单地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恰当的法律安排和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尽可能地减少交易费用,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趋于一致,使“外部性”被“内部化”,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实质。

科斯定理已是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热门理论,运用科斯定理来探讨一下我国的经济领域中的“造假”与“打假”行为,也许能给我们以启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前述由于对侵权进行赔偿的数量方面的模糊性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模糊性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一个较大的市场交易费用,受害的消费者在“讨回公道”的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遇到种种“扯皮”的麻烦,因而高昂的交易费用阻碍了一些消费者进一步索赔的行动,到头来只能以“吃一堑,长一智”的自我安慰作罢;另一方面,这种模糊性降低了欺诈厂商的成本,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欺诈厂商,因为欺诈厂商可以冒较小的风险,通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来谋取高额利润,而将消费上的损失——一种成本——转给了社会 and 消费者,在这里不法厂商有一种肆意妄为的动力,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不断加大,外部性难以得到消除。

然而,到了1993年,在我国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当年的10月份,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明文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加倍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后,特别是“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造假”和“打假”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消费者中出现了“知假买假”的逆向选择现象。北京的一名消费者王海成了“敢吃螃蟹”的第一人,王海通过主动性地大量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得到加倍赔偿而发了财。王海从此走上了职业“知假买假”的道路,并且频频胜诉。在“王海现象”的示范效应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更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近年来,除了北京的王海之外,还有河北的刘殿林,重庆的叶光,武汉的张磊,海南的琼一维等纷纷创造了一个个“职业打假”的奇迹。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了索赔的目的,

主动性地知假买假究竟应该不应该得到加倍赔偿支付。中央电视台在“三一五特别行动”节目中就此问题采访了许多人，得到的回答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在广大的消费者心中，王海式的职业打假人士无疑成了“打假英雄”，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大加赞赏；而工商界的一些人士则认为王海式的知假买假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行为而是一种敲诈；工商管理部门和法院对知假买假这种行为有时也相互争执。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利益的偏执，对其做出一些法和经济学的分析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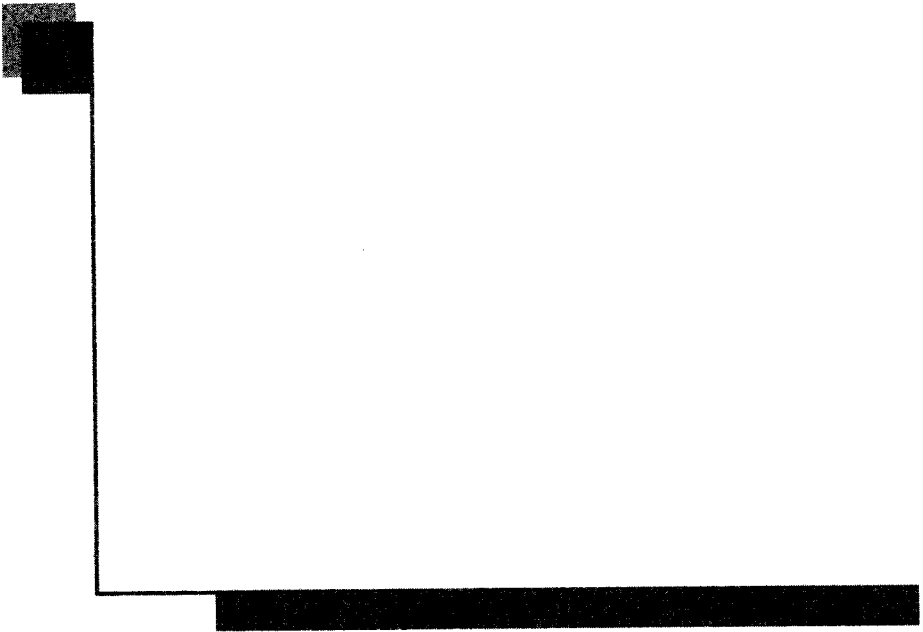
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最大的意义在于，它首先改变了欺诈厂商的成本状况，因为现在欺诈厂商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如果买了假货的消费者一旦起诉的话，欺诈厂商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将不仅承担其自身的成本而且还要加倍承担原先可以轻易转嫁给社会的成本。这样，一个欺诈厂商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会趋于一致，假冒伪劣商品的供给积极性就大大降低了，外部性被有效地内部化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加倍赔偿”条款的出台，实际上也降低了消费者在交涉有关问题时的交易费用，他也更有积极性地去发现并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然后通过索赔获得相应的利益。也就是说，“加倍赔偿”的规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它能推动更多的消费者去“知假买假”，而假货在这种机制下，自然也就只会“越买越少”，这样，假冒伪劣商品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市场秩序得以维持。这一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向我们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解决经济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往往比采用其他手段更加有效。

按照科斯定理的启示，在涉及外部性问题时，未必一定要通过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适当的法律界定和制度设计来解决这类问题将更为有效，这就很容易解释在打假问题上，为什么各地工商管理部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往往是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长久，甚至还会陷入“屡打屡假”的怪圈之中。“加倍赔偿”规则的出台，作为一种法律界定或制度设计，由于它有效地减少了市场交易费用，所以使市场能够通过自律来纠正其失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知假买假、加倍赔偿与科斯定理的这番分析，也有助于说明人们经常讲的这样一句话：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主要取决于“人治”，因而对人的觉悟和自觉性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主要是在市场主体间的游戏中进行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这些市场主体是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游戏的，经济运行的绩效也就是游戏的绩效，它主要取决于规则，取决于“法治”，因而市场经济对法制也就有着更高的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最首要的职能就是建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立健全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为社会创造一个理想的法制环境。法制建设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节约交易费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本身扮演着双重角色。



知经济方能顺大势

——宏观经济篇

36. GDP 告诉你

由于财富本身是由五花八门的各种商品组成的，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年创造了多少财富似乎很难说清楚，但 GDP 可以简捷而准确地告诉你。GDP 即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境内所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这是从一个国家的国境范围内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换个角度，比如从一个国家公民的角度来衡量同样的问题，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了国民生产总值，GDP 就变成了 GNP。在当今国与国之间互有投资和劳务输出的条件下，GDP 就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和观测的一项重要指标了。

值得注意的是 GDP 既包括了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的价值，又包括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产品的劳务价值在内。为了避免重复计算，GDP 的统计和计算只考虑最终产品，而不计中间产品，这是通过每个生产环节都只记增加值的办法来实现的。既然 GDP 是按一定时间计量的，那么某年的 GDP 就只统计当年的产品价值。这也就是，以前年度生产的但在今年卖出的，没被计入今年的 GDP，而今年生产的但还没卖出去的产品却是已经计入了今年的 GDP 中。当然还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如果 GDP 是用当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的，那就是名义 GDP；如果采用一种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 GDP 就是实际 GDP。

虽然 GDP 可以告诉你一个国家财富的总量状况，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状况，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率就用 GDP 的增长率来表示的。但是 GDP 也并非十全十美地令人满意。一方面，GDP 总是漏了一些该记入财富总量但事实上却没有记入的因素，比如：一些地下经济活动，像黄赌毒这些违法的交易就没有人去申报，但客观上却是以财富的形式在交易；家务劳动也是创造财富的，但由于没有在市场上交换，GDP 也无法将其统计在内。一位先生工作繁忙，他不得不到劳务市场聘用一位女子作家庭服务员，那么这笔交易是要体现在 GDP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中的，后来这位先生和这位女子结婚了，同样的家庭劳动由原来的交易变为现在的家庭内部活动，GDP 就减少了。

另一方面，GDP 还包含了一些本来应该扣除但实际却没有扣除的因素：比如人类追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一位当代欧洲学者不无风趣地讲到：“一条公路上两辆汽车对驶，擦肩而过相安无事，几乎对 GDP 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相撞，GDP 马上会说 Very good，因为撞车以后伴随而来的是警察处理交通事故、修理汽车或新购汽车、新闻报道、医院救护等等，这些都可刺激 GDP 的增长，难道这样的增长是人类所追求的吗？”

另外 GDP 因其自身的缺陷似乎还掩盖了一些东西。比如两个国家 GDP 总量相等，似乎两个国家的实际财富和国民享受到的福利也相等，其实不然。虽然两个国家 GDP 一样，但构成可能不一样，假如一个国家大部分由军火构成，另一个国家大部分由民用品构成，难道前者能比后者享受到更大的福利吗？同样，即使两个国家人均 GDP 完全一样，也不一定表示同样的财富和福利状况，因为有可能一国分配两极分化，另一国分配相对平均，这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建议把 GDP 进行一些调整，加上漏掉的因素，再减去不该算的因素，得出经济净福利 NEW (NetEconomics Welfares) 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 GDP。但由于 NEW 的操作性不如 GDP，故而萨缪尔森建议的 NEW 并没有实际运用起来。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强调用绿色 GDP 来代替 GDP。所谓绿色 GDP 就是在原来 GDP 统计中扣除自然资本消耗以后求得的数字，即国内生产总值 GDP 减去产品资本折旧、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资源消耗之值。这是反映了包括人力资源和环境资源在内的国民财富。我国学者把绿色 GDP 分解为五个指标：第一，单位 GDP 的排污量；第二，单位 GDP 的能耗量；第三，第二，单位 GDP 的水耗量；第四，单位 GDP 投入教育的比例；第五，人均创造 GDP 的数值。对绿色 GDP 的强调反映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37. 蜜蜂的寓言与扩大内需

蜜蜂的寓言是说：从前有一群蜜蜂过着挥霍、奢华的生活，整个蜂群兴旺发达，百业昌盛。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习惯，崇尚节俭朴素，结果社会凋敝，经济衰落，最终被对手打败而逃散。蜜蜂的寓言的确引人深思。按照传统道德观，勤俭节约，增加储蓄是美德；奢侈浪费，减少储蓄是败行。将蜜蜂的寓言引寓于人类社会，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厉行节约使社会经济萧条，那人们岂不是进退维谷：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放弃传统美德，要遵守传统美德，就得忍受经济萧条。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也不难解开这一节约的悖论。

社会总体经济活动可以看成是一个流量循环系统。这个系统联接着企业和家庭这两大主体以及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这两大市场，并且同时存在着两套流量循环。一套流量循环是实物流量循环，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生产要素市场流向企业，企业界生产出来的各类最终产品通过最终产品市场流向各个家庭；另一套流量循环是货币流量循环，家庭出售生产要素给企业，获得要素收入，货币由企业流向家庭，家庭用得到的收入购买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货币再由家庭流向企业。在这样一个总体经济活动中，如果家庭都能够全部花掉他们的收入，则企业每年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也必然全部被消费，总体经济活动将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此周而复始，循环流动。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全部花掉他们的收入，家庭没有花掉的收入通过金融市场形成了储蓄，储蓄和消费不同的是，消费的发生使货币又直接流回了企业，而储蓄使货币从流量循环中漏出，企业收回的资金越来越少，经济活动岂不是越来越收缩了？不必担心的是漏出的部分通过金融市场还可以以投资的形式再注入进来。这样看来，家庭的收入以消费和投资的形式又回到企业中，形成流量循环。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从实物流量循环来看,消费对应的是最终产品,而投资对应的是中间产品,包括各种机器、设备以及生产资料等。由投资所对应的中间产品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消费不足形成了漏出,而投资作为注入则填补了这个缺位;另一方面由投资产生的这些中间产品意味着未来更多更好的最终产品可供人们消费。所以它就要求将来必须有更多的消费来接纳这些最终产品,如果没有这种消费的增加,必然会产生经济过剩的危机。所以,按照蜜蜂的寓言,铺张浪费反使经济繁荣,但是这个繁荣只能是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不能使经济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崇尚节约、增加储蓄会使当前的经济低落,但如果能转化为生产性的投资,则为将来更高水平的经济提供条件。据研究不论是传统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经济的起飞大都经历过一个高储蓄、高积累的过程。但是不要忘记,通过储蓄和投资形成的更高的生产力对消费本身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能力的提高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提高。发达经济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如何刺激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对消费和投资的研究表明,人们的消费与收入有着比较稳定的关系,投资则极具波动性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消费与投资的不足会导致总体经济活动的萧条。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了宏观经济分析之先河,强调国家干预。他甚至提出一些奇思异想,比如,把钱装在瓶子里埋在地下,然后再让另一部分人把它挖出来,以解决失业问题。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已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但相当一部分的产业都已进入相对过剩阶段。通货紧缩代替了通货膨胀成了我国宏观经济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我国已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导向。净出口作为一种外需,也可以成为宏观经济流量循环中的注入,但我们还必须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净出口的增加依赖于进口,而进口又具有较大的对外依赖性,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化解危机做出了贡献,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出口形势的恶化。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我国的出口形势马上就受到了影响,但由于我们有“入世成功”、“胜利申奥”和“足球出线”等利好事件的发生,使得扩大内需得到了有效的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38. 时间偏好与贴现率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经常面临这样的选择：即在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选择现在消费，还是将来消费？或者选择现在消费多少，将来消费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偏好现在消费，而不是将来消费，这就是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时间偏好假说。

从人们的生活经验来看，不难验证这一假说。一款同样的汽车，人们内心的愿望必然是马上就能得到，而不愿等到二十年以后再得到；一笔同样的财富，人们都希望能在年轻时获得，而不是到年老时才获得。

由于时间偏好的存在，未来一定价值的东西折合成今天的价值就必须打一个折扣，决定这个折扣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一个比率，这就是贴现率。人们根据一定的贴现率，可以将未来的一定价值折算为现在价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会根据一个不同的主观贴现率，来调整自己眼前享受和长远享受的结构。

一些人主观贴现率可能非常的高，也就是说，要让他放弃现期消费的话，必须给他很大的补偿才行。这样，一定量的未来价值在他心中就贴现为较少的现值。和一般人相比，主观贴现率越高，一定量未来价值在他心目中越小于实际贴现的现值。这些人便更偏好于现期利益，而不太在乎未来利益。作为一种极端情况，如果主观贴现率为无限大，再多的未来价值在他内心中只能贴现为零现值，在实际中此人将会完全偏好于当前利益。“今日有酒今日醉，管它明日喝凉水”就是一种主观贴现率无限大的人生哲学写照。

相反，另一些人的主观贴现率则非常地小，这样，一定量的未来价值在他内心中可以贴现为较多的现值。和一般人相比，主观贴现率越小，一定量未来价值实际贴现的现值就越小于他心中的理想值，使他放弃现期利益。零主观贴现率是另一种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多么久远的未来价值也和现值一样重要。

品出经济学三味

具有零主观贴现率倾向的人，必然认为当前利益不重要，而将一切留在将来。这些人往往被世人指责为“会赚钱但未必会花钱”。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式的吝啬守财的艺术形象正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

当已知未来价值，要算现在价值时，我们需要一个贴现率；相反，当已知现在价值，而要算未来价值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率。利率和贴现率是有联系的，尽管二者计算的方向相反，但反映的实质是一样的：利率的存在可以这样解释，因为我牺牲了眼前消费，利息就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实际上，以调整贴现率为主要内容的贴现率政策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市场经济中各公司之间因商业信用关系而产生了大量的商业票据，即承诺在一定时期付款的凭据。如果持有商业票据的公司想提前取得资金，就可以拿到商业银行去按一定贴现率进行贴现。商业银行如果资金短缺了，还可以再拿来这些商业票据到中央银行去申请再贴现。因此中央银行调整再贴现率就成了一项重要的调控手段。

从 2001 年下半年到 2002 年上半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先后十一次降息，以期望刺激美国已经陷入衰退的经济。在市场经济国家，利率不是已经市场化了么？格林斯潘又是怎样下调利率的呢？原来格林斯潘只要降低再贴现率，就会鼓励商业银行到美联储通过再贴现商业票据获得资金，因为这样做和以前相比成本更低了。商业银行资金更多了成本更低了，就有能力和动力向企业和公众以更低的利率提供更多的贷款。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利率降低会使更多的人心目中的主观贴现率高于市场利率，感觉到利率偏低，从而做出调整，增加眼前消费。这样，中央银行就达到了刺激经济的目的。

39. 利率升降与股市涨跌

关注股票价格的波动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股民做梦都想握住股市波动的脉搏。然而正如“股市中没有专家，只有赢家和输家”所言，完全把握股市波动之规律则很难。从理论上讲，假如其他条件不变，股票的价格主要取决于股票的收益和利率这两个因素，用公式表示，即股票价格等于股票收益除以利率。

股票收益是指上市公司分配给股票持有人的各种回报，它可以是以现金形式派发的股息，也可以是以送股或配股方式形成的股份，总之，前提是上市公司有可供分配的盈利存在。可见，股票的价格与股票的收益是成正比的，而股票收益显然又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有关。因此，股民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预期的好坏，将是决定该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涨跌的决定力量之一。

而利率则是一个政策变量，由中央银行控制，如果金融当局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通过调整利率，进而影响到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故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打一个喷嚏，美国股市乃至整个世界股市都会为之一震。从上述股票价格的决定公式来看，利率处于分母的位置，所以，股票的价格与利率是成反比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就是利率提高，股价下跌；利率降低，股价上涨。所以，利率的变动就成为了股市价格变动的最基本的力量。

利率的变动对股市价格变动的机制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可以利率降低为例来说明，利率提高的情形只不过正好相反。

原来利率降低首先会影响到股票收益的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使各上市公司投资成本减少，从而投资增加生产扩大，利率降低也使消费者的消费成本降低，从而增加消费，扩大内需，这些基本面的改善都有助于上市公司改善经营业绩，从而使股票收益提高，这种力量会促使股票价格上升；其次，由于利率处在股票价格决定公式的分母上，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利率降低，股价必涨。但在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这一形式的背后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利率没有降低以前，股票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均衡状态，即一单位货币用在存款上得到的利息，和同样一单位货币用于股票上得到的股息是完全相等的，现在，既然利率降低了，这说明同样一单位货币用于股票上得到的股息要比用于存款上得到的利息要多，那么，只有股票价格上涨，才能重新达到“同样一单位货币不论是用于股票上得到股息，还是用于存款上得到利息都相等”这一状态。所以，股价就必须上涨。

不过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在时间上还是有快慢之分的，利率降低对股票收益的改善一般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会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利率降低对均衡调整的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有一系列事件为证：1996年5月和8月，我国央行连续两次降息，以启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刺激宏观经济走出低迷状态，虽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但对沪深股市带来的刺激不小，形成了一个历时超过两年的大牛市，并在当年年底冲上了历史的高峰。其间，为了抑制股市的过度投机，证监会先后推出了涨跌停板制度、清理违规资金入市和加大新股发行力度等多项措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涉及香港，国际炒家企图炒作攻击港币获利，但香港金融管理部门及时提高了港币的短期贷款利率，增加了国际炒家炒作港币的成本，使国际炒家惨败，从而成功地确保了港币的稳定，但还是引起了香港股市的下跌；20世纪我国的最后一次降息是在1999年的6月，这也是央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七次降息，它为股市“5.19”行情做了铺垫。

股市的或跌或涨牵动了多少人的心，虽然利率和股票收益是最基本的影响力量，但股价变动要受政策面、基本面和技术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那些突发性事件对股民脆弱的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都会造成股市意外的波动。

40. 股市中的赢家

有了股市就有了股民，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对于股民而言，股市又是五味瓶，装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它既能给股民带来收益的心跳，又不时以风险的形式敲打着股民的神经。

有收益也有风险是股市固有的特征，“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是每一个即将成为股民的人心知肚明的，但人性的自信往往把这句警告演绎为“风险是人家的，收益是自己的”，如若不然，便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疯狂入市。

大凡炒股的人，往往不愁衣食，但人性的贪婪往往使他（她）为了得到更多，而拼命地投入股市。驰骋股市的至高境界莫过于，在股市低迷时，勇敢抄底；在股市高涨时，毅然逃顶，充分施展所谓“高抛低吸”的手法。但股市间真正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可谓少之又少。

大多数的股民皆为凡夫俗子，在股市低迷时，一味地悲观逃避，甚至多有“割肉出局”的悲壮之举，然而股市中演绎的故事往往是：股民这边割肉血迹未干，那边大盘已蓄势而发，一路走高，割肉者只能扼腕而空叹；在股市高涨时，一厢情愿地盲目乐观，死心塌地地做多，高价买进的股票转眼间或一泻千里，或阴跌不止，结果由大赚变小赚，由小赚变小赔，再由小赔变大赔，最终只落得为股消得人憔悴，实在是懊悔不已。

明明是记着“高抛低吸”的法则，但人性的弱点偏偏让他（她）做成了“低抛高吸”，于是资金就越做越少。正如俗语所说，人生两大不幸莫过于“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股市中最无奈的事情就是，由入市时短线投机的股民做成了深度被套的长期投资的股东，这种因投机失败而被迫投资的股民在中国股市大概不在少数。

说股市没有赢家，也嫌武断。一个健康发育的股市不是赌场，赌场的背后是运气和诡计，而股市的背后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回报。从这个意义上，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股民炒股是一种“非零和博弈”，也就是说，股民们可以通过分享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回报而实现“双赢”或“多赢”，但这要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回报能有多大？

如果在一个远离秩序尚未规范的股市中，股民炒股完全可以变成“零和博弈”。假设上市公司没有多少回报，这种假设对我们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很适用的，股民们就是在“零和博弈”，你之所得必我之所失，虽然有时看起来几乎所有的股民都在赚钱，但也许先前的股民已经割肉在先了，或是以后的股民早晚将会为他们而割肉。这也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如此，股市将失去其积极性的一面，而成为一个纯粹赌博的场所。中国理论界近年来不是一直围绕着“中国股市是否是一个大赌场”而喋喋不休地论争着吗？

时代在变迁，观念在转变，雷锋精神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在股市中更难见这种精神。在战争年代，紧急关头，总有人站出来：“同志们快撤退，我掩护！”但在股市崩盘之际，有谁能站出来：“股民们快撤退，要套就我套吧！”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众股民一个个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唯恐跑在了后面。

令人想不到的是，反人性操作有时会在股市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据说在某地股市，几年下来，只有两个人在赚钱。一个是股市门前的卖报老人，一个是出家的和尚。股市疯狂时，股民争相购买报纸，卖报老人无暇股市，也就买不了股票；股市低迷时，股民都回家了，卖报老人这才有时间到股市买股票，因而就赚钱了。

而和尚呢？大慈大悲！当股市下跌时，股民们视股票如“烫手山芋”，争相抛弃，和尚出于行善，出于助人之心，将人人欲弃的股票买过来，结果无意中反抄了底；当股市高涨时，股票万人争购，和尚心又软了，既然你们那么喜欢，阿弥陀佛，我就卖给你们吧！结果无意中又逃了顶。因而也赚了钱。这也许是股市最辩证而又最无奈的一面吧！

41. 投资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经济学中，从宏观的意义上说到投资，是指那些使社会资本存量增加的经济活动；而如果从微观的意义上讲投资，系指经济当事人牺牲当前享受，以便使未来得到更多享受的经济行为。因而我们可以将投资理解成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做出的一种跨时期选择。

一个人筹集资金订购机器、厂房和设备是一种典型的投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从宏观上看，使社会的资本存量增加了；从微观上看，他支出了资金放弃了消费因而做出了牺牲。所以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意义上，这是一种真正的投资。

证券投资是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投资活动，以买卖股票为例，如果一个人到证券公司买了股票而成为股民，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他是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新股，他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因为公司发行新股不论是用在固定资产上还是用在流动资产上，从宏观上看，都对应着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他如果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的股票，尽管从微观的角度，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做了一项投资，但从宏观上来看，这只不过是既有股票所有权的转让，从一个股民手里转到了另一股民手里，而对应的社会资本存量并没有增加，因而不能算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由于投资的本质意义在于眼前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所得，所以投资这一用语常常被泛化地使用了。想当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以后，不惜卧薪尝胆吃尽苦头，最后麻痹了吴王夫差并一举雪耻的故事，向来为史家所称道，然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也不过是一种投资而已，虽然他吃了一些苦头，但却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卧薪尝胆不但使越王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而且也使他名垂青史。因而我们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政治投资的典范。还有，据说某地有一个小伙子每天都不辞劳苦地给一位姑娘送一朵鲜花，以表示对她的喜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欢，起初姑娘不为所动，但经不住这位小伙子长期真诚的攻势，姑娘终于喜欢上这位小伙子了，小伙子的鲜花终于没有白送。所以，小伙子给姑娘送花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感情投资，通过这种感情投资，小伙子得到的回报就是姑娘的爱情。但凡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虽然故事中的小伙子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所有拿鲜花送姑娘的人都能得到一颗芳心。所以，这里要奉劝那些打算如法炮制的朋友，一定要考虑到这种感情投资的巨大风险。

投资和消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消费是现期享受或马上得到服务，而投资则是牺牲眼前享受，延期得到更多的享受或更多的服务。考虑到这种跨时期性，现在有一种倾向，人们常把以前认为是消费的东西看成是投资了。比如，以前人们把上学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服务消费，但现在不同了，人们把钱用在学业上的行为叫人力资本投资。用在学业上的支出和普通的消费支出不同的是：把钱用在学业上是牺牲当前的利益，以换取将来更高的生产力；普通的消费支出仅仅是满足当前的需要。

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意义可以用以下例子来说明。有一对孪生兄弟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当两兄弟长大以后，家里给了兄弟俩每人一大笔钱。但哥俩在如何花费这笔钱上，却大不一样。哥哥用这笔钱购买了舒适的住房和豪华的家具，并为自己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婚礼；而弟弟则既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家具，婚礼也办得非常简单，但却省下了一笔钱到国外求学。这样，哥哥的行为是消费，而弟弟的行为却是投资。哥哥和弟弟这种消费性和投资性的支出安排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在起初哥哥比弟弟享受了高出一个台阶的生活水平，但弟弟却积累了发展的后劲，前途光明。几年过去以后，哥哥优越的生活也逐渐平淡下来了，而弟弟学业完成以后，成了有影响的年轻专家。所以，人力资本投资使弟弟比哥哥在未来人生的舞台上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弟弟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回报。

42. 借钱消费为哪般？

说起这个话题，自然想起了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同时到了天堂，但却发出了不同的感慨。中国老太太说：“忙碌了一辈子，总算攒够了房钱，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房子，但还没有来得及住上一天，就到天堂报到了。”而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快上天堂的时候，总算把钱还完了。”

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故事中，中国老太太的感慨可能是大多数中国老一代居民的共同感受。随着观念的转变，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也有了变化，汽车消费信贷、住房消费信贷也已成时下流行的新概念。借钱消费，今天花明天的钱，这种新的消费模式也开始浮出水面。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来考察一下所谓的“超前消费”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福利？

首先，将不可能的享受转变为可能的享受。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发展水平还不高，人均 GDP 还未达到 1000 美元大关。所以，对普通家庭而言，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购买住房、汽车这样的大件商品还不大可能。比如，假设一个年收入为 20000 元的家庭，要购买一套价值 40 万元的住房，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攒 20 年的钱才能买得起。这就注定了这个家庭在 20 年的大好时光中，不可能享受到拥有住房带来的福利。但在消费信贷提供的分期付款方式下，通过“首付——月供”的消费方案，就有可能使这个家庭在近几年内享受到自有住房的福利。

其次，将未来的幸福提前为眼前的幸福。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购买大件商品，需要漫长的积攒和等待，那么由消费该商品带来的幸福自然就来得晚，而人生又是有限的，因而从这种商品上得到的幸福总量就少多了。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则根据同样的道理要比前者更早地得到购买商品带给他的幸福，当然从商品上得到的幸福总量会更大。以前例来说明，该家庭按一手交钱一手交

品出经济学三味

货方式，最快也要等到 20 多年以后才能实现；但在分期付款的方式下，可能 5 年就实现了，后者要比前者提前 15 年获得自有住房带来的幸福。

最后，将双赢扩展为多赢。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任何市场交易的结果都应该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但超前消费模式却将这种双赢扩展为多赢的结局。因为在这种交易模式中，同时涉及到了房产公司、银行和消费者三大行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有了房住，房产公司卖出了产品，银行放出了贷款，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如此多赢结果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超前消费有以上诸多好处，但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提倡慎而行之，还是不能忽视这种消费模式可能遇到的困难。首先，从银行的角度来讲，我国征信系统尚不发达，制约了这种消费模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征信系统比较发达的情况下，银行可以很方便地调查申请人的信用记录，因而提供贷款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但在我国征信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不敢轻易贷款。其次，从消费者的方面来看，一旦选择了超前消费，每月就有了月供的负担，这就要求消费者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作保证，否则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在超前消费的情况下，消费者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储蓄了，他应付突发性事故的能力大大降低，这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刚起步和商业保险不发达的情况下，也是实行超前消费的一个现实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借钱消费，今天花明天的钱，这种超前消费模式最终还是走进我们平常老百姓的生活中的。

43. 跨期转移与跨代转移

如果比较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不难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人的消费呈现出明显的跨期转移特征，而中国人则突出了跨代转移的特征。这是两国在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方面的主要差异。

按照消费理论的生命周期假说，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比如，人生有青年、中年和老年之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是不同的。人在青年时，一般收入较低，但花费较大；人到中年，收入逐渐达到最高，花费也达到最大；人到老年，花费减少，收入也降了下来。为了避免不同时期消费水平的大起大落，人们势必追求一种消费平滑化的趋势。具体说来就是，人在青年时，消费大于收入，形成负债；人到中年，收入大于消费，其差额用来偿债或形成储蓄；人到老年，消费又大于收入，储蓄减少。这样，从人的一生来看，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跨期转移。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典型的跨期转移，这种方式也是与美国发达的消费信贷市场发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跨期转移，美国人将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维持在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所以说，美国的社会是一个消费主导性的社会。

与跨期转移不同，跨代转移则是一种储蓄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人们尽量压低自己的消费，形成储蓄，但居民消费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于代际之间的转移。人们终其一生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代而活着，而没有最大限度地去实现自身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因而在这种模式下，人们世代都处于一种被压低的消费状态。中国人的消费模式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跨代转移。从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来看，一对夫妇忙碌了大半辈子可能只是为了两件事情：先攒下一笔钱盖好房子；再省下一笔钱为儿子娶媳妇。等到这两件事情办下来，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享受人生了。

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经济条件虽然都比农村要好，但同样也走不出跨代转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移的阴影。很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倾向，即不惜倾全家之财力用于子女身上，希望他们将来以后能够出人头地。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实现那种愿望，但这些人没有改变的恰恰是，仍然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做着同样的事情：倾尽全力以求子女出人头地。如此代代相传，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跨期转移和跨代转移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产生了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的社会风格。跨期转移使美国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最高状态；而跨代转移则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终生压抑在低位。跨期转移造就了年轻的美国人强大的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而跨代转移则使中国的年轻人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心理和懒惰倾向，譬如：在中国一向有这样的说法“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由此足可窥其一斑。跨期转移鼓励了美国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而跨代转移则助长了中国人的保守性和中庸之道，再譬如：虽然我们的孩子很聪明，他们能够在各类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取足够多的金奖，但长大后能取得创造性成就的人却比美国的少。如此种种差别，不得不使我们承认，要想体制改革，必先观念革新，对我们来说，在消费观念上从“跨代转移”调整为“跨期转移”，应该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44. 投资买房是不是时候？

土地清理，门槛提高，消费严控，这些对业内影响重大的政策，对消费者也同样影响很大。尤其对海南，市场在回暖，开发在加快，容量在增加，本地市场有限，外地市场受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海南房价是涨是跌？现在投资买房是不是时候？如果买房买什么样的合适？等等，扯着许多人的心。2004年5月28日上午，《财富》周刊特别组织了一次“财富沙龙”，邀请业界有关人士对以上问题发表看法。看法可能不周全，抑或很粗糙，但它或许能给你一些信息，一些思路，一些参考。

嘉宾：李仁君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主持人：官蕾海南日报经济部主编

主持人：国家这次宏观调控，对企业提高了进入门槛。对个人，虽然目前海南银行方面说还没有新动作，但外地一些银行已有新的强硬的动作。海南房子60%的客户在岛外，此形势对海南购房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李仁君：对海南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首先是银行进行了商业化改革，不会再像1993年调控时那样应声而倒；其次是老百姓的需求有目共睹，是实际增长，而且旺盛。

买房怕买到泡沫，怎么看泡沫？基于三个标准：一是价格高速上涨；二是价格与价值背离；三是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幅度是否一致。

目前从这三个标准来看海南的房地产，谈泡沫尚早。原因之一是目前海南整体房价并不高；其次是从买房的动机来看，目前海南的东北购房者主要属于消费型，而江浙购房者大多属于投资型。据调查，仅有三成不到是投机。所以从目前的购房行为来看，还没有泡沫；再就是资金的来源也比较保险，据了解44.6%的资金是自筹，35.7%的资金来自预收款。

主持人：宏观调控对海南的影响不言而喻。那在这种影响下，海南房价会涨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还是会跌呢?

李仁君: 国家这次调控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房地产投资进行调控, 目标是把每年的房价升幅控制在 3% 以内, 而不是现在的 7—8%。

我对海南将来房地产总体走势的判断是稳中有升, 谈不上会有大的风险。经历了 1992—1993 年的房地产泡沫之后, 海南房地产遭受重创, 价格急速下跌。经过这些年的盘整, 价格开始上升, 但升幅不大。事实上, 海南房地产有价值重新发现的一个过程。

但在目前海南经济背景和宏观调控下, 海南房价上涨的空间不会大。有些观点把海南房价与夏威夷比, 与周围一些发达城市比, 这不太现实。上海一套房子卖到 8000 元/平方米, 而海南同样的房子大约在 2000 元/平方米左右, 是海南的 4 倍左右, 但人家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海南的 4 倍左右。

海南房价下跌也没太大可能。现在银行还是较注重个人住房消费贷款, 虽然宏观调控了, 但不会对个人住房信贷搞“一刀切”。在贷款条件、期限、成数上的更加严格, 并不会完全影响个人购房的需求, 符合条件的仍能按揭买到房。

主持人: 温州人所到之处, 都会引起“炒”声一片。怎么看他们在海南的動作?

李仁君: 海南本地人来炒房可能性不大, 因为炒房难度太大。岛外需求当中存在炒房的可能性。

对海南有没有炒房行为我个人并不担忧。因为银行已不是 10 年前的银行。现在的银行风险意识都比较强, 不会轻易支持居民炒房。而管理层在这个问题上也积累了经验, 会对炒房及时出台有关措施。

温州炒房团的出现, 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起来后, 手里有了钱, 组成团体在全国各地购买房产的一种新现象。这些团体每到一处, 购买的房子数量都比较大, 对当地房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海南占比例不是很大, 而且他们不承认是在炒房, 而是为了投资和居住。

主持人: 在目前情况下, 投资什么样的房子较合适?

李仁君: 对于消费型买房, 主要是岛内居民, 建议选择经济实惠的, 不选海景, 远离闹区, 主要目的是避免涨价造成损失, 也即要选择性价比高的房子。

但对于投资型买房, 则不能把变现放在第一位, 应该作长远打算。建议买优质的海景房。比如现在一些杭州客, 他们在海口买房, 就选择这种消费投资两相宜的房子, 他们认为自己将来的业务可能会发展到海口, 每年住上一段时间, 不排除今后某个时期卖出去的可能。

(《海南日报》日报记者: 杨春虹、程娇、彭敏 2004—05—31)

45. 假如没有货币？

有 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个小伙子向一位老头子倾诉：“哎，老爷子，我什么都不缺，唯独缺钱！”老头子说：“傻小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这里说的钱就是经济学中的货币，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所以，谁占有了货币，谁就占有了财富和支配权。

货币的确是人类的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有了货币，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换才会产生，而人类文明的大厦也正是在分工与交换的基础上缔造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货币，或者说钱，对于人类的确功不可没。然而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人们眼中的“笼中之虎”，货币出笼一旦失控，它就成了洪水猛兽，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甚至摧毁整个经济体系；货币本来是人造出来，人却往往被它奴役，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货币作为财富的天然代表，自然就被人们崇拜，茫茫人海中只有那些极少数至高境界者才能做到“视金钱如粪土”。于是，货币又受到了人们的诅咒，认为它是一切万恶之源。其实货币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不过是人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工具而已，它的功过只是有生命的人操纵的结果，但表现出来的却似乎“成也货币，败也货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价货币的功过？让我们设想一个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会带来哪些麻烦。

首先是因缺乏一个适当的计价单位所带来的麻烦。没有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在不同人、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价值比较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试想，如果没有货币，没有美元，没有人民币，也没有汇率，这样的价值尺度，我们想知道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究竟有多大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有了货币和汇率，这种比较就轻而易举了；另外，如果没有货币这样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在丰富多彩的商品世界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无法方便地表示出来，比如，当一盒火柴和一头大象进行价值比较时，用几万分之一的大象来表示一盒火柴的交换价值，是十分麻烦的。货币的出现为衡量千差万别的商

品出经济学三味

品的相对价格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标准。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通过它们各自与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反映出来的。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也是按照商品和劳务的用货币表示的相对价格来进行配置的。

其次是因没有一个方便的交易媒介所带来的麻烦。货币是一种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通过货币不同商品的生产者可以互换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果没有货币这一交易媒介，商品交换将会变得非常麻烦。设想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农民想用稻米交换铁匠的锄头，而此时这个铁匠却不要稻米，而想用锄头去交换屠夫的猪肉。可是锄头对屠夫并没什么用处，屠夫想用猪肉作为报酬请一个木匠来修好他的猪圈。不巧的是，这个木匠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从不吃猪肉，他需要的是农民的稻米。这位想得到一把新锄头的农民除非能幸运地找到想要稻米的木匠，并先说服木匠为屠夫修猪圈换取猪肉，再用自己的稻米从木匠那里换来猪肉，再拿猪肉去跟铁匠交换，才能最终获得一把新锄头。如果木匠需要的不是稻米，而是建筑学教程，那么这位可怜的农民就完全白折腾了。货币的出现，彻底免去了这样的麻烦。

最后是无法进行价值贮存而带来的麻烦。在经济生活中，大多数产品在实物形态上是无法或不便于长期贮存的，如果没有货币，对那些无法长期贮存的产品，只能是当期生产当期消费，因而不能充分发挥生产的效率。货币可以使这些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得到贮存。有了货币，生产者可以将其多余的产品卖给产品的需求者，换取货币，等到他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再用货币把该种产品买回来。通过货币的这种职能，人们可以在不同时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货币还提供了将当前的购买力转移到未来的手段，所以货币会成为人们获取收入的一般形式，工资和薪金采用货币形式，解决了物物交换下无法进行价值贮存而带来的麻烦。现实生活中，当取得工资之后，很少有人把它全部花完，大多数人都会将它贮存起来，以备今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所需。虽然未来的物价有可能上涨，但人们还是必须要持有一部分货币用来购买未来所需的商品或劳务。如果没有货币，人们的这种安排就无法实现。

看来，真是应验了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46. 为什么钱多了物价却没有上涨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结构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也带来了世界市场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世界的金融资产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实物资产，货币增加的速度远远大于实物增加的速度。但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来，世界主要产品的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譬如石油，20 世纪 70 年代一度涨到 20 多美元，到 2001 年最低已降到近 10 美元。粮食、棉花、木材、钢铁等大宗产品的物价都没有多大变动。为什么钱多了，物价却没有上涨？

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钱总是要流向那些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凡是市场稀缺的产品，其价格就高，资金流入也就越多；凡是那些已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的产品，其价格都难以上涨。在二战后的大半个世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大宗产品由于产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基本上不再具有稀缺性，所以，价格基本没变。进一步说，即使投放再多的货币，人们手里有再多的钱，也不会光顾这些不再具有稀缺性的商品。

那么，不断增多的货币都流到哪些领域去了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克尔曾问到：“为什么当前世界货币总量要超过货物总量的 60 倍？在如此巨大的货币总量中，实际上只有 3—4% 的钱就足够应付实体经济，另外 94—95% 的钱到底在干什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钱的去处无非是流向了稀缺产品和金融市场。

稀缺产品是指那些用高科技开发出的新产品，像电视机、传真机、电脑，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产品。另一类是世界上稀有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以及那些稀世文化产品。金融市场是剩余资金的另一光顾热点。全球股票市场的暴涨都是资金过剩的表现，当今的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早年股市的意义，纽约股市一板市场两年间从 4000 点跃升至 12000 点，已经具有很大的娱乐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性。二板市场纳斯达克指数在 1999 年底到 2000 年初的 4 个月内从 3000 点上升到 5000 点，也充满了虚拟和泡沫。

投机本身就有赌博性，因而也带有娱乐性。在基本生存消费已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类将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了娱乐休闲消费。精神产品或无形产品成了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足球明星的转会费用动辄就是上千万美元；一场拳王争霸赛往往涉及亿万美元的运作。因此，以各类明星为中心的娱乐业也将吸引大量的剩余货币，这就形成了极其昂贵的明星价格。由于明星永远是稀缺的，所以明星的高价也不至于引发通货膨胀。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纯粹物质含量的商品其比例在逐渐下降，高知识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重逐渐加大。例如计算机，钢铁塑料方面的物质含量并不高，但知识技术的含量却很大。像微软的视窗软件，纯物质的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可能仅仅只是一张光盘，但知识和技术的含量非常之大。因此，现在许多货币所对应的是知识产出。人类的知识财富正在日益超过物质财富，甚至变成比物质财富还要重要的生存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再多的货币量可能也不算多。由于无形的财富日益增加，资本市场的虚拟成分也在增大，股票价格翻倍增长远远脱离了实物资产的价值。但也应该看到，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剩余资金，才不至于导致传统实物产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经济学家们围绕当今中国股市发生的争论。有一部分人认为股市是个大赌场；更多的人将股市看作是一个多余资金的储水池、缓冲库。

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近年来由于成功地把握住了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实际统计资料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和物价增长的幅度，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十分充足，但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与此相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三年下降，直到去年初才在国际石油价格的拉动下有所反弹。居民消费物价也是连续几年呈下降状态。总之，在走出短缺经济之后，货币供给量增加多一点，对实际物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政府可以用发行货币的办法，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加快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47. 把钱拿在手上：货币需求

钱 在经济学中被称作货币，“把钱拿在手上”是“货币需求”的日常用语，若进一步用行话来说则是“流动偏好”。货币有三大职能：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人们把钱拿在手上即是由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职能引起的。

从货币作为计价单位来看，也就是执行价值计量的尺度，这只需观念上的货币即可，倒不必非得把钱拿在手上不可。现实中我们想表达一件物品价值多少元也只需观念地标识出来而已，从来不需要真得用多少钱放在旁边以示等价关系。但货币在执行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的职能时，货币就必须亲临现场了，这就是把钱拿在手上，即货币需求或流动偏好。早期的经济学家仅从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出发，考察人们把钱拿在手上的行为，这就是美国的费雪方程式和英国的剑桥方程式。

按照费雪方程式，实际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和实际产值，而在货币流通速度和实际产值都不变的前提下，人们对实际货币的需求就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常数。比如，假设全社会总产值是一万元，若货币流通速度是一年五次，则实际货币需求就是两千元。如果实际货币需求被确定了，名义货币需求和价格水平就成同方向变化，也就是说人们拿在手上的钱多了，价格水平就会上升；人们拿在手上的钱少了，价格水平就会下降。而这正符合了古典学派所一贯信奉的“货币中性论”，即货币的多少只影响物价。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因而是中性的。

而剑桥方程式则把实际货币需求表示为实际产值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是总产值的一个余额，因而剑桥方程式又被称为现金余额说。假设全社会总产值是一万元，现金余额比例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人们的货币需求，即把钱拿在手上的金额就是两千元。剑桥方程式形式上和费雪方程式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也还是有联系的，因为剑桥方程式中的现金余额比例就是费雪方程式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二者都把实际货币需求归结为货币交易媒介的职能。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说费雪方程式强调的是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剑桥方程式强调的则是利率的稳定，因而人们手持现金余额比例的稳定。这也说明剑桥方程式已经隐约地把货币价值储藏的职能考虑进来了。

真正把货币需求与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联系起来的是凯恩斯，这时人们把钱拿在手上，要实现的是资产组合的最佳效果。凯恩斯提出了货币需求的三大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也是古典学派同样关注的，人们为了日常交易的需要而把钱拿在手上；而预防动机是凯恩斯补充的，指人们为了应付一些意外发生的支出而把钱拿在手上。这两种货币需求的多少都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大小。而投机动机则是凯恩斯独特的分析。

凯恩斯把证券市场的存在引入货币需求理论，突出了货币价值储藏的职能。人们不仅拥有实际资产，还会持有金融资产，人们在证券市场进行投机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利率。凯恩斯论证了投机需求与利率的反向关系。当利率很高时，一方面人们的持币成本很高，另一方面证券价格也处于低位，那么大部分的人将会选择购买证券，因而不会把钱拿在手上，这就是投机需求为零。随着利率的降低，一方面持币成本降低，另一方面证券价格上涨，一部分人就会买出证券，从而把钱拿在手上，利率越低，更多的人将会认为证券价格够高了，社会选择把钱拿在手上的总量也就越多。按照凯恩斯的分析，当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利率已经不可能再低了，从而证券价格也高到不可能更高时，这时有多少货币人们都会选择拿在手上，人们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就是无限的。这被称为“凯恩斯流动偏好陷阱”。

48. 问钱天下有几多：货币供给

—— 一个社会可以提供的货币总量被称为货币供给。换言之，货币供给就是要说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少钱的事。起初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人们使用货币首先是从实物形式开始的，那时候人们的钱就是某些实实在在的商品。在历史上，牛、橄榄油、酒、铜、铁、金、银、戒指、宝石和烟草等等，都曾在不同时期被当作货币使用。

英国边际学派经济学家杰文斯在说明社会引入货币所带来的变革时，他曾引用了实物货币的情形：若干年前拉利克剧院的歌手塞利小姐曾在社会群岛举办过一次演唱会，作为报酬，她得到门票收入的 $\frac{1}{3}$ 。经清查，她的报酬包括了 3 头猪、23 只火鸡、5000 个椰子，还有很多香蕉、柠檬和桔子。

在这种情况下，若问天下共有几多钱？只需将充当货币的商品数量统计一下即可。如果这个社会是以牛作商品，全社会共有 500 万头牛，那么这个社会的总货币供给就是 500 万头牛，由于这 500 万头牛等价于社会的其他财富，现假设年货币流通速度为 1，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获知该社会的总财富等价于 1000 万头牛。

人们在使用货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变化是，金银这样的金属商品成为货币的专用形式。这些贵金属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作为货币仅仅需要政府或者民间把他们铸造出来以便使用。这样，一个社会有多少钱，就取决于这个社会的金银贵金属有多少。假设一个社会共有 1 万亿两黄金，这就是这个社会的货币供给，如果年货币流通速度为 1，那么这个社会的总财富就价值 2 万亿两黄金。使用金属货币虽然比使用其他的实物货币要方便，但也有不利之处，比如，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把贵金属开采出来并铸造加工；货币供应量易受采矿业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等等。

当纸币代替金属货币以后，问钱天下有几多将变得复杂化了。纸币一般由中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央银行发行，在现代银行制度下，公众和商业银行也都将参与到社会的货币供应量的决定中来。

现在，货币供给不仅仅是由各种纸币和铸币构成的通货（或现金），记为 M_0 （或 C ），而且还包括银行存款：各类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时，我们说货币供给，就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供给是指 M_0 （或 C ）和 M_1 ；而广义的货币供给将扩大为 M_2 等等。因为活期存款能很容易地转化为现金，所以， M_0 （或 C ）加上各类活期存款就形成了货币供给的 M_1 ；进一步地，由于各类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转化为现金，那么， M_1 加上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 M_2 。

在这种情况下，若问钱天下有几多？可能会更加复杂。由于在现代银行制度下，银行只要留下一笔准备金，其余都可以贷出去，这样，一笔存款便会转化为一笔笔存款，通过这种存款创造机制，货币供给就会被扩大。不妨做出一个极端的假设，人们手持现金为零，全部的货币供给都表现为存款，那么，一笔存款通过货币乘数最终会生成多倍的存款，通过一些简单的推导可知，这个乘数等于 1 除以法定准备率。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手持现金不可能为零，如果考虑到一部分现金从存款创造中漏出来，这个存款创造的乘数就会降低。由此看来，若说大家都是货币供给者也许并不为过。如果你把自己收入中更多的部分以现金的形式放在自己家中的话，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就会被减少；而如果你将自己收入中更多的部分以存款的形式放在银行的话，你无形中已经加大了社会的货币供给量。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天下到底有多少钱的确是由你我他大家共同决定的。通过统计公报，我们可以查到货币供给的数据，比如说，2004 年底我国的 M_0 期末余额为 216667 亿元； M_1 期末余额为 94594 亿元； M_2 期末余额为 266993 亿元。

49. 由穷变富的学问：舒尔茨及其人力资本理论

我 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在墨子的这些话中，我们看到了引导人们由穷变富的思想火花。两千多年以后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曾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自从温家宝总理在 2005 年 3 月 14 日的记者会上引用了舒尔茨这两句话以后，有关“穷人的经济学”的讨论顿时多了起来。

舒尔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由于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他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同时获得了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还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造者之一，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舒尔茨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按照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 4.5 倍，收益增加 3.5 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 3.5 倍，收益却增加了 17.5 倍。舒尔茨还指出，从 1919 年到 1957 年，美国 38 年中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 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可以通过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短期培训或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来进行。一个受过教育的穷人会通过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提高自己的生产率，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通过竞争实现脱贫致富。

由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关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论著大量出现，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频频被授予诺贝尔奖。从这一理论的发展来看，它不仅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仅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由穷变富的经济理论，而且也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贸易和增长问题，这就是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里昂惕夫之谜”，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加进人力资本要素，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从整体上已进入了小康社会，但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我国还有很多穷困的地区和人口。由于我国的穷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所以我国政府一向重视三农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对农民的扶持，发放补贴，援助财物、免去农业税等都可能有利于农民状况的改善，但却未必是治标之本。因为长期输血式的扶贫方式，虽然能一时缓解这些地区的贫困，但最终反而会损害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终究难跳出“低水平的陷阱”。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增加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基本素质。从这个意义上，“有力者疾以助人”，不如“有财者勉以分人”，更不如“有道者劝以教人”。

在舒尔茨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 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 20%；20 世纪 70 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13% 和 15%。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我国经济学家根据我国 1978—1996 年间有关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每增加 1 亿元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近 6 亿元 GDP 增加额，而每增加 1 亿元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够带来 2 亿元 GDP 的增加额。另据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詹姆斯·海克曼的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的 2.5% 用于教育投资，30% 用于物质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 5.4% 和 17%，在韩国是 3.6% 和 30%。也就是说，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的比例，中国是 12:1，韩国是 8:1，美国是 3:1。这说明“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如果中国过多投资于一种资本，而另一种资本投资不足，那么，财富增长的机会就丧失了。”

虽然问题已得到说明，然而真正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变到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将其上升到决策层次。在广大贫困地区，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特别是贫困的流动人口中适龄少年儿童失学严重，这将构成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根本障碍。由此看来，政府在条件成熟时应该担起基础教育的义务，逐渐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免费化。这是使穷人由穷变富的关键。

50. 把钱埋在地下：乘数效应

如果政府组织一批人把钱埋在地下，然后再雇人把它挖出来，以此来求得一国的经济的繁荣发展，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却是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想法：

“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而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在受到由此而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

把钱埋在地下就能刺激经济？这里的关键是能否使乘数效应发挥出来。在一个现实经济中，一笔初始的投资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会使社会的经济总量发生成倍的增加，这就是乘数效应。

在把钱埋在地下的例子中，政府没事找事，组织一批人挖地埋钱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通过这批人的折腾却会给经济带来活力。比如，那些人们挖地埋钱耗费体力，总是要喝点儿什么吧，于是，饮料公司就卖掉了饮料而挣到了收入，饮料公司的员工有了收入以后，也许会拿一部分收入去买衣服，这样服装公司就又有了生意做并取得收入，服装公司的工人就有可能拿收入的一部分去买食品，这样，食品公司的工人就得到了收入，……如此下去，尽管这种传递的效应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最终把这些效应汇集起来，经济就得到了一个加倍的增量。

在以上过程中，开始并不重要，但结果却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并不奇怪的是，生活中也还有不少类似的现象，比如说，足球运动，从世界杯到俱乐部的各类比赛，无不涉及到巨额的资金运作；从运动员、教练员到裁判员、工作人员，都从足球比赛中获得不菲的收益。这些人通过足球挣了钱再花出去，使足球经济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足球比赛现在变得如此吸引人的眼球，以至于各路商家不惜血本也要在足球赛场的广告招牌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已达天量的经济规模皆由足球而起。可是再三审视之下，足球运动本身只不过是一场无聊的过程：一群人拼抢着只为把一只球踢进球门而已！

对于足球而言，从踢球开始，结果却是一具巨大的产业，这不也和“把钱埋在地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吗？二者都是乘数效应的体现。乘数效应有时也被比为“破窗经济”，一个无赖打破了商店的一块玻璃后逃跑了，店主无奈只好自己花钱把玻璃再装上，玻璃店老板得到这笔收入以后，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买衣服，于是服装店老板又得到一笔收入，并用其中一部分用于买食物，食品店老板就得到了一笔收入，然后再花出去……。一个无赖打破玻璃这件坏事，居然释放出了乘数效应，使整个经济增大了。

也有人对“破窗经济”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没有无赖打破商店玻璃，店主就没有必要花钱买玻璃，他完全可以把这笔钱用于其他支出。现在，无赖打破了玻璃，店主要重新装上玻璃就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金，因此，无赖打破玻璃只是社会财富的净损失。这是否就推翻了乘数效应呢？

其实乘数效应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社会存在大量的闲置资源。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全球大萧条时期，那时，整个经济社会机器不能运转。工人不能就业，产品卖不出去，因此，才有了“把钱埋在地下”、“破窗经济”这些创意。当然，在社会资源已经充分利用，机器已全部运转，工人也全部就业，产品正在热销，这种充分就业的状态出现以后，不管是“把钱埋在地下”，还是“破窗经济”，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徒然损失社会财富的事情。

51. 加息时代灵活理财

主持人：2004年10月29日，央行加息尘埃落定，现在，关于央行是否再次加息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有观点认为，此次0.27个百分点仅仅是央行试探性的信息，实际上人民币利率已经进入加息周期。也就是说加息才刚刚开始，今后再度加息的可能性还很大，各位怎么看？

李仁君：从理论层面上，我想谈一谈这次加息有三个特点：一是这次加息是近10年以来我国的首次加息，而且是带有试探性的加息；二是这次加息调整的幅度很小，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只向上提了0.27个百分点，没有下限限制。三是中长期的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幅度大一些，而短期存款利率调整幅度相对小一些，这为以后是否再度调高利率提供了一定的遐想空间。

对于是否进入一个加息周期，我认为应从几个方面看：

一是从这次试探性加息来看，它的幅度不大，在空间上还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这次加息主要是为了抵消负利率的问题。但此次加息后负利率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政府要决心消除负利率，那么加息还有理论空间。二是加不加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因素，是看中国宏观经济局势在第四季度到2005年发展势头。如果CPI（物价消费指数）能够平稳下降，宏观调控任务已经完成，加息的可能性就不大；如果CPI继续增长，经济增长率居高不下，宏观调控得不到有效控制，各种隐患相继出现，那么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主持人：如果说中国已进入一个加息周期，那么在加息周期下，对老百姓生活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仁君：进入加息周期后，加息对石化、汽车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等负债率比较高的产业影响可能比较大。就目前0.27个百分点的加息幅度来看，开发商的成本将会增加2%，而贷款买房的人月供负担也会上升2%，影响很微弱。但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影响可能会比较激烈。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农业以及负债率不高的旅游等产业，加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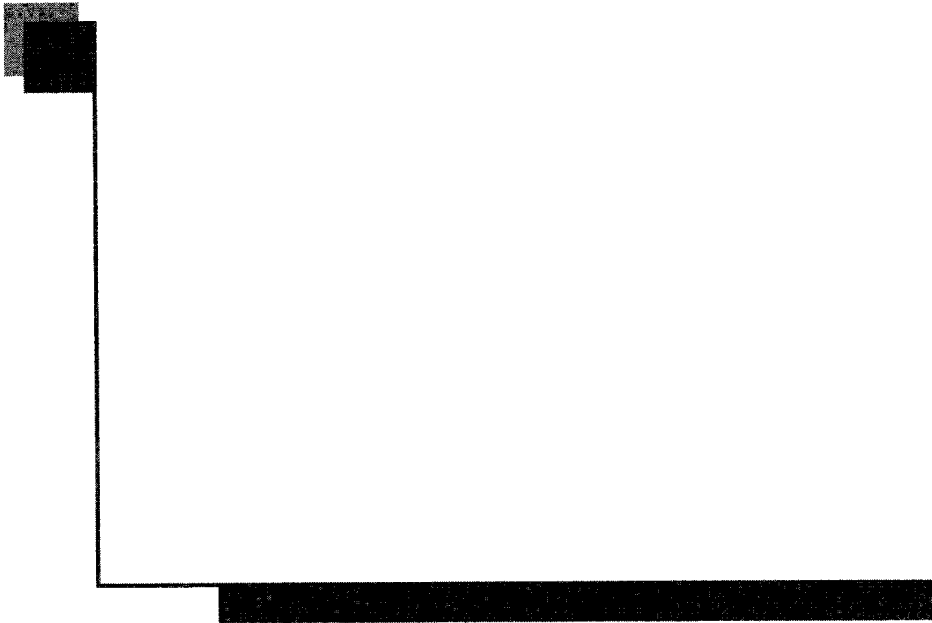
主持人：一次小幅度的加息，对房贷者的影响不大，但如果进入加息周期后，房贷者还贷的压力会不会加大？有无提前还款的必要？

李仁君：目前购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购房自己消费，这部分贷款购房者在加息后无法选择放弃投资，所以他们多会选择借钱或开源节流的方式还贷，而且国家也会考虑到此种类型的消费，可能会在政策上有一定的考虑，不必过分担心；另外一种是投机型购房者，因为以前有负利率存在，一些投资者贷款买房目的是为了赚取利差，而加息以后由于成本加大，获利空间变小，这部分人可能会改变投资方向，急于还款。

主持人：近 10 年来，老百姓已经习惯在降息下理财，如果进入加息周期后，个人投资、理财将如何应对，涉及到买房、买车等，老百姓又该如何计划？

李仁君：进入加息周期，在投资理财方面，我的建议是要有灵活性，建议选择储蓄的百姓将储蓄分段操作，以便更好地面对加息周期；建议股民谨慎应对，不要恐慌，多看少动；而车贷房贷一族要有对未来加息的预期考虑，尽量将成本最小化，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快还贷，但也不能操之过急。

（《海南日报》记者：程娇、李少荣，2004 年 11 月 08 日）



利害得失皆由经济

——政治经济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52. 中美两国粮票的比较

前 段时间在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以前留下的粮票，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不禁让人想起，曾几何时它们是那么不可或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现在它们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物静静地被人收藏了。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中国粮票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见证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而已。殊不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同样存在着令人玩味的美国粮票。为此我们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粮票。先说说我们中国的粮票。

我国的粮票就是在计划体制下居民购买粮食及其制品的凭证。从 1955 年开始，国家实行粮食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1963 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就划为“非农业户口”。至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初步形成：对“非农业户口”，国家按一定标准发放粮票，标准大概是，成年男性职工每月发 29 斤，成年女性职工每月发 26 斤，14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由出生时每月 6 斤开始逐年增加。据说在支援越南期间这个标准还被扣了 10%；对“农业户口”，国家不发放粮票，只能吃自产粮。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一纸粮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城里人每天离不开它，乡下人出个远门也少不了它。所以，长期以来，不仅粮票抢手，而且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更抢手。粮票本来只是一种凭证，它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允许流通。但在转型时期价格双轨制下，粮票也有了价格，并在黑市被交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到了 1993 年终于发生了大变化，这年 2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当年内全国大部分县市全都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粮食经营。而粮票这一计划经济的标志物也从此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说完了中国再看美国。从 1964 年食品券法颁布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对穷人购买食品提供补贴。这种食品券就是美国的粮票。食品券只能用于购买食

品出经济学三昧

品，而且不能出售。美国这种食品券计划，以 1979 年为界分两个阶段。在 1979 年以前，食品券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庭购买食品券，然后凭食品券去商店购买食品。比如，一个四口之家，经调整后的月收入为 300 美元，只需支付 83 美元就可以购买到价值 153 美元的全月的食品券。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月收入仅为 100 美元，则购买全月的食品券只需支付 25 美元。1979 年美国对食品券计划进行了修改，原先要求家庭购买，现在只要符合条件，一个家庭每月可直接得到 200 美元的食品券。

不论是中国的粮票还是美国的食物券，都是与农业或食品有关的一种凭证，本身都没有价值，也都不能流通，这是二者相通的地方；但在不同的国情下，透过中美两国的粮票，却更反映出了令我们深思的许多不同的东西。

中美两国粮票的补贴方式不同。美国的粮票所实现的补贴是明补，从 1979 年以前的食品券计划来看，如果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购买 153 美元的食品券只需支付 83 美元，其补贴额就是 70 美元；如果只需支付 25 美元，则补贴额就是 128 美元。按照 1979 年以后的食品券计划，只要符合条件，每家都可以得到 200 美元的补贴。中国的粮票所实现的补贴则是暗补。居民凭粮票买粮，享受同家计划价格，但这个价格低于国家的收购价格，其差额由同家财政来补贴。因而是一种暗补，它成了计划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

中美两国粮票的受惠群体不同。很明显，美国的粮票的受惠群体是收入最低的社会底层人民，而且根据美国食品券计划，收入越低的家庭，在购买食品券时享受的补贴就越高。这从刚才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与美国的粮票相反，中国粮票的受惠群体则是处在社会的上层，因为中国粮票供应的对象是在各方面都比农村居民享有特权的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不仅仅拥有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享受副食补贴，享受公费医疗等方面的特权，而且在子女上学、就业以及军人退伍安置方面也都享受着比农村居民更优越的待遇。

中美两国粮票的体制环境不同。美国的粮票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市场经济虽然盛行优胜劣汰，但它却能导致产品过剩，不会产生短缺。美国食品券计划其实就是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一种调控方式的体现；而中国的粮票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计划经济也被称之为命令经济，从人类实践的经验上看它与物资短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粮票政策也是在这种短缺制约下的无奈的产物。粮食太少了，只能平均分配，一个人多吃了，其他人就不够吃了，只能限量供应。其实计划体制下的中国人不独使用粮票，还使用肉票、布票、油票等等。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粮票，我们欣喜地看到短缺经济条件下体现等级关系的粮票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也殷切地希望过剩经济条件下体现平等关系的粮票能尽快出现在中国低收入者手中。

53. 美元与经济秩序

如果将当今世界全球生产的 GDP 划作三份，美国独占其一。与这种庞大的财力相适应，美国拥有全球科技优势、全球军事优势以及全球政治优势，依靠这些优势，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唯一能够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导，首先在于美国对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不必进行深入的数据研究，仅从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通用的货币，便可作为美国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发挥主导作用的外在标志。

美元中心地位的确立可追溯到二战结束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该体系中，规定了美元的含金量，其他国货币按相对固定的比率与美元挂钩，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可向美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美元代替英镑成为国际通用货币不是偶然的，经过二战的破坏，其他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唯有美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国 GDP 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家 GDP 总值的三分之二，美元中心地位是与此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这种趋势的解释甚至已经包含在了商品理论本身之内。

商品内部本身就存在着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商品交换把这种内部对立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外部对立。起初商品交换是偶然的，个别等价物也是偶然的，后来随着交换的发展，大部分的商品都喜欢和一种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再后来由于黄金自身的特点而垄断地占据了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便成为了货币。货币产生以后，商品内部对立便转化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任何一种商品只有成功地和货币交换了，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从此货币就作为商品世界的一极和其他商品组成的另一极相对立着，货币成了人类一般财富的代表和化身，由此也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宠儿。

当纸币制度普遍以后，特别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后，各国发行的货币只在本国内有效，那么在世界范围内需要一种普遍接受的货币，这就是美元。虽然随着美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减小，美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迫宣布停止自由兑换黄金，但美元仍然是国际通用的货币。那么，在当今全球范围内，一种商品只有出口创汇，即交换成美元，才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其价值。这样，商品内部对立已经转化为普通商品与美元之间的外部对立，由于美国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所以说，普通商品与美元的对立，也就决定了整个世界与世界警察的对立，也决定了山姆大叔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贯做派。

美元中心地位奠定了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越地位。从表面来看，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便可将全球物产之精华源源不断地运抵美国消费，比如，日本生产的汽车，中东出产的石油，还有中国生产的日用品等等。实际上美国开动印钞机的背后，仍然有其物质的基础，这从美国的出口产品中可窥其一斑。美国的出口产品有两大类值得一提：一是 IT 产品；二是视听产品。IT 产品在硬件生产方面有英特尔为代表，在软件生产方面有微软为代表。视听产品中美国电影大片对世界的冲击可谓家喻户晓。但仔细想来这种分工却是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英特尔代表了美国对某些高精尖技术的垄断，微软生产的软件实际上不过是制定一种信息游戏的规则在出卖，而美国大片无非是整一帮帅哥靓妹，再加上一些奇思异想的导演，进行着一些高级的娱乐，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却让世界人民为它付费。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越地位，却是商品世界发展的必然，也许这在美国人之外的人们看来多少有点无可奈何。我们从中得出的感想是，我们要想在将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谋得一席之地，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在必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然是经济的复兴。

54. 从柜台小姐拒收退款看制度的完善

在 海口某银行的柜台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先生从银行取款，发现柜台小姐多付了三百元钱，便主动要求将多付的三百块钱退还，但却遭到了柜台小姐的拒绝。经过再三争执，这位先生只好将这三百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后来，有朋友告诉这位取款的先生，这家银行有规定，银行职工出一次差错将扣发当月全部奖金。平均来看，这家银行职工每月领到的奖金超过千元。所以，柜台小姐若是收了那三百元的退款，将得不偿失。

对于这一事件，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人对取款先生做了如是评价：这位先生能够主动将多付的钱如数奉还，可谓深明大义，值得赞赏。但可惜的是，在退款遇到挫折后，这位先生没有坚持善举，而最终还是将本不属于自己的三百块钱装到了自己的腰包，可谓晚节不保，不无遗憾。

也有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柜台小姐，认为她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这种有错不改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同时，这一意见对银行制度上的漏洞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正是银行制度的不健全，才导致了柜台小姐损公肥私的不良行为。

在上述事件中，取款先生其实是不能承担过多的责任的，但他的问题在于道德上的不坚定性。柜台小姐强行“奉送”的三百块钱拒收起来如此困难，也确实难为了这位本想奉还的取款先生了。这么说，主要的责任是在柜台小姐这边了，但也要具体分析。首先，柜台小姐也是人，一个生活在红尘中的关心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要强行“奉送”三百块钱，假设她多付的不是三百块钱而是一万元钱，当事人又坚持退还的话，那她一定不会坚持“奉送”。银行制度的规定促使她必须牺牲小钱，保全大钱。从这个意义上，柜台小姐也没有什么错。

其次，银行制度是不是有问题呢？若从制度本身的严密性而言，也不存在什

■ 品出经济学三昧

么问题。因为这一制度不会使银行遭受损失。比如，柜台小姐出了差错，为了保住奖金，她可以不承认，但她必须从自己的腰包中拿出同样数目钱来弥补，否则就无法交班。这样做虽然不至于影响奖金，但她如果老是出错的话，就得老掏自己的腰包补窟窿，这样长期下来也受不了。所以，柜台小姐还是会吸取教训，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尽量少出差错。从这一点来看，银行制度是有效的。

但银行制度也还有值得改善之处，比如，给这一制度增加一点灵活性：如果出了差错能够主动及时改正的话，可免于处罚。如果有了这一条，在前述事件中，柜台小姐就不会执意不肯收回多付的资金了，而会非常感谢地收回。这样的话，不论是对银行，还是对柜台小姐个人都会更好。

上述事件说明，制度非常重要，它是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进行交易的前提。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一个能够提供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规则体系。它不能建立在对人的特殊要求之上。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把每个人都视为普通的经济人，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无私奉献者。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做坏事，但一个不好的制度却可能使好人做坏事。

有一个例子值得一提。在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中，贸易争端解决的“协商一致原则”就不是一个好制度。因为它要求每个成员国都是君子才能有效。假定甲国对乙国违反了协定，乙国想要制裁甲国，必须经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但甲国注定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制裁实际上不可能发生。因此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世贸组织成立后，将“协商一致原则”改为“反向协商一致原则”，就成了一个好的制度。现在乙国想要制裁甲国，只要不是全体反对，制裁就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甲国神通广大，能说服除乙国之外的其他成员全部反对，但只要乙国自己不反对，就仍然可以达到制裁甲国的目的。所以，“反向协商一致原则”是一个好的制度，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制度虽然重要，但制度也不能是僵化的，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经济学家已经论证了，如果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预期收益超过这一安排的成材，那么制度变迁就会发生。从制度变迁的方式来看，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是制度的供给推动模式，后者是制度的需求诱致模式。

55. 迂回生产+效率：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从经济学上理解资本主义，其关键无疑在于理解资本概念本身，为此我们借用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来说明。比如说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的鲁滨逊，赤手空拳去捉鱼，每天可捉 3 条鱼，并假设 3 条鱼是一种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就不会产生资本。现假定孤岛上又来了一个，比如说是星期五，这样就构成了人类社会。星期五手上带有 12 条干鱼和一些图纸和技术，我们姑且不管这些东西是怎么得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星期五和鲁滨逊就有可能达成一种共识：星期五每天提供给鲁滨逊 3 条干鱼，鲁滨逊就不必去捉鱼了，而是在星期五的指挥下用两天时间造一艘渔船，第三天开着渔船去捕鱼，一天可捕 30 条鱼，鲁滨逊得 10 条鱼，星期五得 20 条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个故事涉及到的资本这一概念我们还得话分两头。一种颇有权威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应当是那种秉承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它的剥削性质。马克思反复地强调，资本不是物，资本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传统的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在我们的故事中，星期五凭借手中的干鱼这种资本，每天就能剥削鲁滨逊 20 条鱼，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从理解这一解释出发，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生活和写作《资本论》的 19 世纪中叶，正是欧洲的黑暗时期，此时的资本主义正处于阶级矛盾尖锐对立、革命风暴此起彼伏阶段。马克思亲眼目睹了巴黎公社的血腥历程，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两大阶级的殊死争斗可谓领悟颇深，这些不能不影响到其理论的创建之中。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人类的历史也走进了 20 世纪中叶。此时的资本主义世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家进入了经济稳定增长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围绕剥削与反剥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那么在后一时期，合作与对话构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关系的主流。在新的背景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成员，都已经适应了以选票为武器以议会为战场而辩论的方式，代替那种以子弹为武器以流血为代价的方式。

这样看来，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非但如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同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关系的反差之大甚至超出了不同制度之间的分歧。这样看问题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观点。

如果按照真正的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其关键还在于理解资本概念本身，应从动态的角度探寻资本主义最一般的规定性。这种最一般的规定性显然不会因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否则，它就不是最一般的规定性。由此，在考察资本这一概念时就发现，资本首先是一个物，在其物的外壳下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物，不过表现为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它只是人类迂回生产的手段。迂回生产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不直接生产消费品，而首先生产生产资料，然后用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正如鲁滨逊为了抓更多的鱼，他先不直接去抓鱼，而是在星期五的指挥下先用两天时间造一艘渔船，从第三天以后再开着渔船去捕鱼，一天可捕 30 条鱼。通过迂回生产，显然提高了捕鱼的生产效率：由每天捉 3 条鱼提高每天捉 30 条鱼。从干鱼和渔船作用来看，资本既是迂回生产的前提又是它表现出来的结果。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也许过分强调了星期五剥削鲁滨逊 20 条鱼的这种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而忽视了资本与迂回生产对提高人类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到了资本主义最一般的经济解释，即资本主义就是迂回生产加经济效率。

56. 集体行动+平等：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解释

从经典作家的理论描述到实践家们的艰苦探索，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在个人消费品上实行按劳分配的三大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的形成，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反资本主义之道而行之的结果。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内，社会主义的这一模式归于失败，因为社会主义的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走向解体。

本来人们是期待着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的，但这种期待现实中渐渐被演绎成了一种巨大的“扭曲”。这种扭曲在经济关系上转化为价格的扭曲，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这种扭曲在社会关系上转化为舆论和现实的扭曲，比如，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舆论环境扭曲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利行为，“公仆”精神扭曲为以权谋私现象等等。

按照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不应该是传统的三大特征，“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地，社会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显然，邓小平理论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生产力标准，改写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由此曾一度引起了所谓的“目的与手段之争”。有些人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错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意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决不是目的；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将目的与手段割裂开来，认为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转化，并非一成不变的，意在为传统的社会主义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理论辩护。

目的与手段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已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接受了用生产力标准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问题还不那么简单。首先，从发展生产力来讲，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性质。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包括它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还会长期高于社会主义。其次，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发展生产力往往是很难兼顾的一对矛盾，有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剥削。另外贫穷和富裕有很强的相对性，共同富裕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也就是共同贫穷，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既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同时也是有效率的社会所必要的。

寻求社会主义最一般的经济解释还是要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宗旨出发，按照经典作家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消除了因分工造成的差别；人的彻底解放既包括人对自然约束的解脱也包括人对人奴役人的解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分歧其实不在这个宗旨上，资本主义通过实行民主和发展科技所走过的历程似乎表明它也是在逐步实现人对自然和自身的双重解放。

既然如此，要探寻社会主义的最一般的规定性还要在手段上去寻找。如果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那是本末倒置了，但是它们作为手段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远不能普适于一切时期，也不具有一般性。因而，社会主义贴切的经济解释只能从“社会”这一术语本身入手。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无非是个人之间的联合，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的方式下共同活动或相互交换其活动的组织或共同体。个人联合为社会就产生了集体行动的需要，社会通过集体行动而追求一种平等的人类精神。这种平等既表现为财富分配上的均等化，又表现为社会关系中个体地位的等同性。这样看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都只不过是集体行动的特殊方式而已。它们所体现出的一般性就是集体行动和个体平等。这样，我们就把社会主义最一般的规定性概括为集体行动加个体平等。

57. 恩格尔系数告诉我们什么

在统计学中把家庭用于食品支出的总额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是 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他在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时发现了一条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这个家庭用来购买食品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反过来也一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或国家越穷，其恩格尔系数就越高；反之，这个社会或国家越富，其恩格尔系数必然就越高。从动态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食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比例是越来越低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恩格尔定律”。

“恩格尔系数”也许并非人人都懂，但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却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但要真正理解“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还是要从“恩格尔系数”说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贫困，50—59% 为温饱，40—50% 为小康，30—40% 为富裕，低于 30% 为最富裕。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也是连年降低。1978 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57.5% 和 67.7%，也就是说那时我国城镇居民只属于勉强温饱，农村居民则仍属于绝对贫困。然而到了 1997 年，这个比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 46.4%，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 55.1%。更大的变化，出现在最近的四五年，到 2001 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 37.9%，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至 47.8%。综合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了 50% 以下。因此，才可以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实现小康生活水平，我们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间人士时曾指出“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

品出经济学三味

到 800 美元。”中共十三大报告里再次提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 1 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宣告：“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2000 年年底，按银行汇率折算，我国年人均 GDP 已超过 800 美元，这说明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人均 GDP 超过 800 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 50% 以下。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正在从追求吃饱穿暖的温饱型生活，向追求享受和发展的小康型生活的转变。在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用于陶冶情操、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艺术、健身保健、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用于子女非义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支出大幅度提高，用于旅游休闲的支出增多，旅游市场一片火爆。

伴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我国经济总体经济形势亦趋好转。2003 年年底，我国人均 GDP 首次超过 1000 美元，经济增长率重新超过 9%，等等。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现在实现的毕竟还是总体小康，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是有差别的。要实现全面小康，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质量、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还要提高；贫富差距还有待于改善，还必须消灭局部贫困。“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我们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决心。

58. 从“三讲”到“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三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理论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毛泽东思想是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总结；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总结；当历史进入 21 世纪人类迎来全球化时代之际，社会主义的中国迫切要求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新的结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应时代的要求，历史地承担了这一重任，江泽民同志的从“三讲”到“三个代表”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为这种新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从“三讲”到“三个代表”完成了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总结。“三讲”和“三个代表”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所内涵的思想内容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三讲”和“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中最本质的思想内涵，我认为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科学”、“民主”和“法治”。

一、“讲学习”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三讲”中的“讲学习”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着内在的联系。“讲学习”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科学”这一范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讲学习”当然搞清楚“学什么”的问题，而“学习”当然要学“科学”，只有掌握了科学（包括技术），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人民是最“讲学习”的人民，古代中国人民就有“四大发明”，从而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是最“讲学习”的政党，正是通过“讲学习”，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无

■ 品出经济学三昧

限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讲学习”掌握科学掌握技术，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在一无资料二无外援的情况下，依然是通过“讲学习”，搞起了“两弹一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就非常重视“讲学习”，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干部会议上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建国以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成为家喻户晓的标语口号；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非常重视“讲学习”，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宝钢的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将“讲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科技和教育上，通过“863计划”和“教育三个面向”等重大举措，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明确地提出了“三讲”和“三个代表”，从而将“讲学习”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二、“讲政治”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讲”中的“讲政治”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内在的联系。“讲政治”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通过“民主”这一范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什么是“政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政治”做过一个通俗的解释，他说，“政”就是“大家的事”；“治”就是“管理”，那么，合起来说，“政治”就是“管理大家的事”。当然，共产党人对“政治”内涵的理解要更丰富和深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讲政治”的一贯性。“讲政治”从党的组织原则上，体现在“民主集中制”；“讲政治”从国家政体和根本政治制度上，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而“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范畴的核心则是“民主”。实际上，“民主”不仅表现为一种制度，而且它还表现为一种文化，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所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讲政治”而弘扬了“民主”精神，“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也有一些不好的文化沉积，历史上重专制轻民主就是一例。历代农民起义所具有的一个共性就是，只反皇帝不反皇权，起义成功了造反者成了皇帝，起义失败了造反者被灭门九族，而没人愿意彻底砸破这个专制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却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幻想依靠一部分军阀去消灭另一部分军阀，最终还是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的同时，就把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作为自己的目标，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对党外民主人士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代封建王朝盛衰兴亡之“怪圈”的法宝，这就是

“民主”。现在，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讲政治”对于进一步完善民主建设意义重大，通过民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在多个层次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历史将会证明，上一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出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通过“三讲”和“三个代表”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三、“讲正气”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讲”中的“讲正气”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着内在的联系。“讲正气”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法治”这一范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讲正气”是对一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俗话说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法治”强调的是按规则办事，而不是为了个人自身的利益去违背规则。通过“法治”建设而制定的规则必然是为了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讲正气”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推进“法治”建设。胡长青、成克杰、戚火贵之流，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践踏法律，他们不可能“讲正气”，也就不可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说，“讲正气”就必须就切实做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党。同时，“讲正气”还包含了加强道德建设，做到以德治国、以德治党，德法并重。一方面“讲正气”需要“法治”来保证，但另一方面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法律所规范不到的地方，就主要取决于人的道德水准，因此，道德建设也是不可替代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更重要的方面。“讲正气”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人们按规则办事，在较高层次上又要求人们发挥道德的力量。焦裕禄、孔繁森等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道德高尚，他们才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三讲”和“三个代表”包含的思想内涵是高度一致的，它们共同反映了“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一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讲”强调了实现这一主题的途径和手段，“三个代表”则强调了实现这一主题的宗旨和意义。当然，这种区分也只是相对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学说体系，它已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的新的结合，又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既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新指南，又是面向 21 世纪“新经济”条件下的共产党人新的宣言，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计划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59.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误分

将 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马克思的创意。“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材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不变资本。”“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之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可变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5—236页）

资本被叫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就是从实物上被叫做生产资料的部分和生活资料的部分（根据马克思生存工资的假定）。但资本从价值的表现上看却没有任何区别，因为预付资本作为一定量的货币，它的每一块钱都是同质的，不管将它用于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看来差别是在实物形态上产生的。具体地说，当把作为预付资本的货币用于生产资料时，它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到产品中去；而当把作为预付资本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时，它就不仅转移自身的价值到产品中去，而且还新增加一部分价值。更具体地说，当资本家把他的预付资本用在钢铁、棉花和橡胶等物资上时，其价值只能转移到产品中去，当资本家把他的预付资本用在面包、饮料和衣服等物资上时，其价值不但能转移到产品中去，而且还能再添加一部分价值。如果实际果真如此的话，必然会形成资本家对面包、饮料和衣服等物资的偏爱，对钢铁、棉花和橡胶等物资的排斥。但现实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也许反对者会说，可变资本是用在劳动者身上的，因为只有劳动者才是生产的主体，所以才可以说剩余价值只能是可变资本带来的。此观点也不对！否定作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创造作用，其实不是否定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对另

一种人类劳动的否定，这种人类劳动被叫做物化劳动也好，被叫做过去劳动也好，被叫做死劳动也好，它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提前做出的劳动，并以生产资料的结晶形式存在而已。这种提前做出的劳动之所以会存在，必然是因为它对人类生产有实质性的作用，如果花费一定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在下一步的生产投入中不能发挥比它本身更大的价值作用，那么，为生产这种生产资料的提前劳动根本就没有必要产生，事实它也不会产生；如果它产生了，说明它在生产中一定会发生实质性的作用的。所以，否定不变资本对价值的创造就是对劳动本身的否定，对提前做出的劳动的否定。所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本身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既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那么以它为基础就必然会产生其他的混乱。比如，关于“产品价值”与“价值产品”的区分就是一例。“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可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这个过程的产品价值不同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产品价值 $C+V+M$ 中， C 是再现在产品中的，而价值产品 $V+M$ 是新创造出来的。但是一旦联系到马克思预付资本的前提，这就不对了。资本家的预付资本，一部分用在生产资料上，也就是 C 上；一部分用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 V 上。既然 C 和 V 都是资本的预付，那么通过生产过程，这两部分都可以通过工人的有用劳动再现在产品中，通过产品的出售收回来。怎么可能 C 是再现的，而 V 是新生产出来呢？如此看来，在马克思说的产品价值 $C+V+M$ 中，必然漏算了资本家预付在可变资本上的价值部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生活消费的价值不是工人重新生产出来，而是转移到产品中通过出售再回收过来。

在新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棉纱上，既有棉花、纺织机等生产资料价值的再现，也有工人面包、衣服等生活资料的再现，工人新增加的只能是 M 部分，也就是说，价值产品只能是 M ，而不是 $V+M$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假定，工人一无所有，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靠资本家预付的生活资料，工人才能活下来，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你给我干活，我给你吃饭，工人的个人消费对其自身的意义是维持生命，但对资本家却是生产消费。但只要走出生产过程，工人是怎样来的，还怎么回去，工人仍然是一无所有，工人要继续生存，还要继续受雇于资本家。所以，除了借助资本家的生活资料活了下来之外，工人什么也没得到；而资本家不但收回预付资本，还要得到剩余价值。所以，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不能说 V 部分表现为有酬劳动， M 部分表现为无酬劳动部分；价值产品只包括 M 部分，而不是 $V+M$ 。这才是按马克思生存工资前提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

如果马克思坚持认为价值产品是 $V+M$ ，实际上无意中就修改了生存工资的假设，而悄悄地引入了剩余工资，即让工人参与分享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

■ 品出经济学三昧

产要预付资本，有预付就要有收回，我们假设预付并收回的不变资本是 C ，预付并收回的可变资本是 V_1 ，预付并收回的总资本就是 $C + V_1$ ， V_1 是用在工人身上的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生产要进行就必须既给机器润滑油，同时也要给工人黄油，这些都是生产性消耗，当然工人消费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可能比生产消费生产资料更复杂一点，但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比如，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能是从超市买回来的，工人可以在家里消费生活必需品，生活费用也可以是工人自己先垫付，工资事后支付，等等，但生存工资的假设使工人在得到工资以后正好偿还他垫付的费用。剩余工资就是工人得到的超出生存工资部分的工资。

因为工人的有用劳动可以把生产资料的价值免费转移到产品中，也可以把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免费转移到产品中。马克思只承认工人的用劳动可以把生产资料的价值免费转移到产品中，而忽略了工人的有用劳动也可以把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免费转移到产品中的事实，相反，他认为工人是把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重新再创造出来了，这就错误地把资本家预付资本中用于生活资料的价值部分漏掉了。所以，工人所投入的全部劳动时间都是新创造的价值，因而是价值产品，前提是工人有用劳动的效率可以把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顺利转移到产品中去。如果价值产品真的可以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割，工人实际上就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享。比如，工人得到 V_2 ，资本家得到 M ，价值产品就是 $V_2 + M$ ，但这时的产品价值就是 $C + V_1 + V_2 + M$ ，而绝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C + V + M$ 。所以，只要承认所有资本都是预付的，工人可以在价值产品中分得一份儿，产品价值就只能是 $C + V_1 + V_2 + M$ 。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大量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出来：

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不需要生产资料。马克思在论证劳动不是商品的第三个理由时，举了一个例子：“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 6 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 12 小时劳动获得 6 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6 页）这里马克思“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的说法犯了被马克思多次批评的经常发生在李嘉图身上的同样的错误，即马克思在这里也把生产看作是不需要生产资料的过程，或者生产资料不需要任何报酬，因为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才会有“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的成立。

再如：关于商品价值与新增价值。“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须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86 页）如果马克思这里说的是社会生产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商品新增的价值”，这句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的是“商品的价值”，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连李嘉图都知道：“影响商品价值的

| 利害得失皆由经济 |

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页）马克思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马克思无非是想强调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观点，无意中把物化劳动转移价值的作用也给否定了。

60. 市场经济与雷锋精神

一、市场经济及其特征

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在如下的前提下进行的：第一，市场经济的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人格和法律地位，是这一制度下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基本的观念。第二，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行为都受追求私利最大化原则的支配，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假设。第三，通过产权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在以上前提下，市场经济还具备了如下的特征：第一，社会经济活动高度商品化和市场化。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工与交换的基础上的，高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一方面表现为分工与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从产品到劳务，从有形商品到无形商品，几乎什么都可以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人们在分工与交换中形成一种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概括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第二，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这些资源配置问题，都是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由个人分散进行的；第三，社会成员的需求通过市场来满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需求主要通过自己生产来满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需求主要通过配给制来满足，在市场经济中，社会成员的需求要通过市场来满足，而且是竞争性的，谁出的价格高，谁得到产品或劳务；第四，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市场来调节。由于市场经济中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所以市场不会亏待每一个人。谁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了有用的服务，市场就会给他以回报。比如，盖茨电脑软件做得好，市场让他成为世界首富，泰森拳击打得好，市场给他千万美元的出场费。

二、发扬雷锋精神是党风建设的要求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通行规则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同时，我国要建的市场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原则。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我们一定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新型党风建设要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又要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

关于党风建设，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呢？

党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撇开制度的因素先不说，依靠教育的手段通常就是要树立一个榜样，虽然说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但是榜样的力量至少也是相当大的。雷锋就是一个榜样。“雷锋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作为革命的传家宝，整整激励了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雷锋日记》写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而广为传颂。

“学习雷锋好榜样”曾经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口号。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高呼“学习雷锋”的口号？还要不要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作为党风建设永恒的话题，从来都是一种美德，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例外。但美德不可强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习雷锋”也要“活学活用”，做到与时俱进。否则，如果生搬硬套，雷锋也可能会处处碰壁。我们不妨假设雷锋还活在今天，他也会与时俱进，否则他将会遇到很多苦恼：

雷锋的苦恼之一：雷锋生活朴素，一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结果受到袜厂工人的强烈抗议：“要不是雷锋，我们也不会下岗。”在我国当前内需不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假如每个人都像雷锋这样，一双袜子要穿上十年，袜厂工人岂能不急？

雷锋的苦恼之二：雷锋省吃俭用，将攒下的钱寄给贫困地区，结果受到了扶贫专家的严厉批评：“雷锋这种作法严重妨害了这些地区的造血功能。”扶贫专家也是有感而发，只解决输血问题而不解决造血功能的传统扶贫方式，确实令很多贫困地区陷入了“越扶越贫”的怪圈。

雷锋的苦恼之三：雷锋在大街上看到一位大爷提着一个大包十分吃力，就去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帮大爷提包，结果吓了大爷一跳：“别碰我的包，谁动我跟谁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诚信”越来越离我们遥远的今天，好事难做几乎成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难题。

雷锋的苦恼之四：雷锋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上做义务劳动，结果因安全生产的原因被工地的指挥拒绝：“谢谢你的好意，小伙子，但是我们没有多余的安全帽。”在当今竞争的社会，安全生产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人们不仅要求施工生产安全，也要求经济情报安全。

如果说雷锋的苦恼只是一种假设的话，下面的这段题为《“不要钱没积极性”义务家教招不来学生》的报导则完全是来自生活中的真实：

体谅到下岗职工为子女聘请家教的困难，海南师范学院 40 多名充满爱心的学生愿为困难家庭提供义务家教服务。大学生们没想到，打出义务家教的招牌已有好几个月，至今没招来一名学生。

“义务家教”的口号是“海师学联教育服务中心”的邓易冬同学率先提出的。他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同样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作为现代大学生，应尽自己所能，给这部分孩子提供一些帮助。他的倡议得到全院 40 多名学生的响应。

但直到如今，并没有一名学生前来领略义务家教。不少学生家长对义务家教常常会一口拒绝，其理由多是“不要钱的家庭教师工作没有积极性。”

三、发扬雷锋精神必须做到与时俱进

雷锋的苦恼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发扬雷锋精神加强党风建设必须与时俱进的问题。

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雷锋精神依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人民服务依然是我们的宗旨，但具体的行动必须与时俱进。从十六大通过的新的《党章》来看，我们党也在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不仅可以来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可以来自中国各阶层的先进分子；判断一个人是否先进，不在于他的财富或财产的多少，而在于他的财产是怎样来的，如何用的。

所以分开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打破万恶的旧制度，“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表现为“抛头颅、洒热血，舍己为公”，在这种情况下，谁苦大仇深，谁牺牲的大，谁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标兵；在和平发展时期，党的任务变为通过火热的经济建设建立幸福的新社会，“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表现为“挣大钱、发大财，利国利民”，在这种前提下，谁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收入高，谁就是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标兵。如果说在前一个时期，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带头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领群众去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话；那么在后一个时期，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就应该率先迎着市场经济的

大潮，带领群众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所以从当今形势来看，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应该体现为合法诚信地赚大钱，发大财。而且此举绝对利国利民。因为市场经济在正常运转情况下可以做到：一个人挣钱越多，说明他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也越多，从而得到的货币选票也越多。比如，有两个公司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盈利丰厚，一个亏损严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第二个公司：“你是怎么向客户服务的？怎么把客户都给服务跑了？看看第一个公司，人家服务的多好！”

在生存和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社会，个人的财富积累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上的意义，它衡量的是一个人对别人提供服务的程度和范围。比如，比尔·盖茨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首富，就是因为他和他的微软公司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具体来说，由于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做得好，以至于全球范围内无处不见 WINDOWS 的踪影，无处没有微软公司的服务存在。可见，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为人民服务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无人能比。因此，如果是在当今全世界范围内挑选“为人民服务标兵”的话，非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莫属，他们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优秀的“学雷锋标兵”。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确实需要更多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学雷锋标兵”，好在十六大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加强新型党风建设，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

61. 服务的层次

在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总量中，服务（或劳务）的比重一直在提高，在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常常高达 80% 到 90%。在我国这个比例目前虽然还不高，只有 40% 左右，但发展的趋势很快。服务对我们是越来越重要了。

其实我们对“服务”二字并不陌生，曾几何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市场经济了，不少人可能心中在嘀咕这五个字还能管用吗？可以肯定地说，“为人民服务”永远不会过时，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必须分层次进行。

服务的第一层次是公共服务，这是一个社会服务体系的核心。公共服务是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形式上它由政府来提供，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公务员来实施的。公务员由纳税人供养，所以，他们就天经地义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由于这部分服务在性质上属于公共产品，所以才叫公共服务。鉴于这些情况，公共服务必然应该做到“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在此过程中公共服务者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

服务的第二层次是私人服务，这是一个服务体系主体。人们生活中所需要的形形色色的具体服务都是通过私人提供出来的，这个过程实行的是利益驱动原则，英国经济学先哲斯密在二百多年以前就曾说：“我们所享用的丰美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宰商、面包师、酿酒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冲动对于我们今天的私人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同样适用的，只不过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如果能够实现“货真价实为您服务”，我们就可以满意了。

服务的第三层次是志愿服务，这是一个服务体系补充。志愿服务既不是通过政府以公共服务方式提供，也不是以利益驱动的方式由私人提供，而是通过爱心提供的特殊服务。一般的，志愿服务都是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因此也可

如果说志愿服务是“真心真意为您服务”，显然这种服务是由那些志愿者们提供。志愿服务之所以是一个社会服务体系的补充，就是因为一个社会不能完全依赖志愿服务，但如果完全没有了志愿服务，社会将会显得格外悲凉和无助。志愿服务规模发展的越大，这个世界才会变得越美好。

一个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应该是三个层次的有序统一，不能相互扭曲和混淆。公共服务不可扭曲为私人服务。当交警通过引导和指挥行人和车辆遵守交通规则，他既是一个交通管理者又是一个公共服务者，在必要时对违规行为施以罚款是他的权力，也是一种维护交通规则的手段，但个别交警直接把罚款本身当作目的，以此作为创收的手段，这就把公共服务扭曲为私人服务。私人服务也不能扭曲为公共服务。黑社会通过强行收取“保护费”向某些人提供“保护”当然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在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将私人服务扭曲为公共服务。当然，志愿服务也不能扭曲为私人服务。比如，给人指路通常都是一种志愿服务，但偶尔会碰到服务之后还要收取报酬，让人始料不及，这是把志愿服务扭曲为私人服务了。

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服务体系健康有序，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大力推进廉政建设，让公共服务者如焦裕禄般尽职尽责；在私人服务领域应该转变观念，让私人服务者如盖茨般大红大紫；在志愿服务领域，应该加强思想建设，让更多的志愿服务者成长起来，如雷锋般的无怨无悔。如果这样解决了服务的层次性问题，市场经济和为人民服务照样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62. 从伊拉克战后重建说起

伊拉克战事已接近尾声，关于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已提上日程。美国主张伊拉克战后重建美国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声称那些反对战争的国家不会从伊拉克重建中得到任何好处，联合国也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美国的理由很干脆，正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赤裸裸地指出的，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鲜血和生命，理所当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这话似乎不符合美国一向标榜的“民主斗士”的身份。美国曾多次指责中国政治独裁，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是历史造就的事实，为建立新中国，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何尝不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美国却长期无视这一点，看来美国实行双重标准也太家常便饭了。

如果美国真愿讲民主的话，伊拉克战后重建交给联合国不是更民主吗？如果美国真讲民主的话，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在世界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出兵？美国出兵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寻求霸权和掠夺石油，这是记者从美军前线士兵的口中得到的真实的感受。两极对峙格局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综合国力急剧膨胀，甚至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美国的一些霸道的做法，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奈何不得，比如，英国人对美军每攻下一个伊拉克城市就插上美国国旗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做法，战后伊拉克重建英国也不主张抛开联合国完全由美国来主导。阿盟则强调，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而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公司在这方面应该享有优先权。但这些根本影响不了美国。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美国说了算的世界，这就是世界霸权。

联合国本来是主持国际事务的权威机构，但现在看起来，让人想起了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东周王朝，春秋末年，天子权威尽失，任由诸侯称霸。伊拉克战争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联合国的颜面和权威被粗暴地践踏。美国目前是有这个家

底的，从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驻军，从它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它相抗衡。美国攻克阿富汗，占领伊拉克，甚至再拿下叙利亚都没有多大问题。据说，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制订好了攻打叙利亚的计划，虽然被美国白宫否定了，但美军中央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可以不受国际法的限制，一旦确定萨达姆藏身叙利亚，随时进入叙利亚境内捕杀。

美国越来越无视国际法了，但美国这样做，却未必能保证美国可以平安地统治这个世界。中国战国时期，有七个发达国家，被称为战国七雄，其中秦国迅速崛起，空前强大，秦国南征北战，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秦王朝，但秦朝的骄横和霸道使其政权没有维持到二十年。美国占领这个世界不会太难，但要长治久安这就难了。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但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捞足了使自己强大的资本，自从连续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渐渐地习惯了以世界警察而自居的地位，而美国第43任总统布什又是一个具有牛仔作风的总统，这将使美国对外政策更加霸道。种种迹象表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昔日强大的对手消失，美国似乎患上了一种“后冷战对手缺失综合症”。它要寻求世界霸权，首先就要寻找可以打击的对手，结果找来找去找到了中东这个地方。

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征战中东，从轰炸利比亚到空袭南联盟，是在中东的外围展开的，但这些都是深受穆斯林影响的地方。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打击阿富汗再到这一次的伊拉克战争，全是在中东展开的。虽然美国无意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为敌，但美国的一些做法还是很难不导致两大文明的冲突与摩擦。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本来就有历史的恩怨，中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曾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以灾难性的打击，这本来就是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所耿耿于怀的，更何况美国长期以来在中东多有偏袒以色列而得罪于极端伊斯兰分子。据说本·拉登策划袭击美国的主要借口就是美国在中东驻军侵犯了穆斯林兄弟的利益，而对其采取的“圣战”。阿富汗因为庇护了本·拉登，而成了美国反恐战争的第一战场。当初美国发兵阿富汗时，美国总统布什曾无意间自比“十字军”，结果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抗议，布什不得不修正了说法，才使反恐联盟得以维持。

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得到了联合国和海湾地区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得到的支持很有限，相反还出现了大量伊斯兰志愿者赴伊拉克前线抵抗美军的现象。从战争所传递出来的两大文明的碰撞异常惨烈，一方有远程轰炸机，另一方有人体炸弹，同样都能致敌于血肉横飞之间，然而最大的受害者依然是中东的百姓。

美国这次出兵的理由主要是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和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萨达姆的武装是解除了，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还没有发现。如果伊拉克根本就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这场本来就有争议的战争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这场军事行动究竟是在“反恐”还是在“造恐”？

把萨达姆这个主权国家的名声不太好的元首活生生地赶入地下，是不是在铸造另一个本·拉登？在美国的挤压之下，本·拉登曾经叫嚣：“穆斯林必须拥有核武器！”现在萨达姆已不知去向，要是哪一天萨达姆若是与本·拉登同流合污，或是与其遥相呼应，针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美国的神经恐怕又要绷紧了。其实在这次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国内民意调查就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坚信美国军事上可以取得胜利，但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概率可能会增加。所以，这样的方式无助于反恐。

在萨达姆的统治之下，伊拉克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现在美国用武力将萨达姆赶下台，要重建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在萨达姆当政时期，伊拉克有众多的反对派，北方有闹独立的库尔德族，南方有长期受统治的什叶派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势力之间很难协调，弄不好伊拉克还会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样，要维持伊拉克的秩序，美国将不得不长期占领伊拉克，这将使美国再一次失信于天下。实际上，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拉克的许多城市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大街上各种抢劫行为此起彼伏，而美军则对其放任不管。据报导，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曾三度遭到严重抢劫。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伊拉克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严重混乱和大肆掠夺，居然认为是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的迹象。他说：“自由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犯错误、犯罪和做坏事。他们也能自由地生活和做好事。”拉姆斯菲尔德的话真有点让人搞不懂了，如果他不是在宣布一种谬论的话，那么美国分明是在向世人贩卖这样一种哲学：实力就是正义，强权就是天理！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本·拉登说“穆斯林必须拥有核武器！”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对于世界各国来讲，军备竞赛是头等大事。

63. 我看萨达姆的被捕

2003 年 12 月 13 日，美军逮捕萨达姆，这是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中的一件大事。萨达姆彻底玩完了，布什可以如愿了，这将为其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增添一笔不小的政治资本。在我看来，布什能够如愿主要系于如下事实。

美军凭借其绝对的科学技术优势，拥有了代表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武器进攻系统。美军不仅动用了精确制导导弹、航母战斗群，远程轰炸机，无人驾驶战机等，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了一系列用来捕杀特定目标的专门武器或技术，比如，地堡终结炸弹，破门专用枪、利用人体气味搜寻目标人物等等。如果没有这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武器系统，美国就没有把握打赢伊拉克战争，并最终逮捕萨达姆。

美国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充当了美军无形的杀手。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文化就是价值观，以美国为主导的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就是美国的价值观。从价值观到政治法律制度，全世界都在看美国、学美国，从国际互联网的域名到全球国家代码的编排，都是美国的标准；从狭义上来理解文化，文化表现为一系列文化产品，包括传媒、出版、演出、旅游等等。美国电影是美国文化影响世界的大众方式，也是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令人称奇的是，当美军攻克巴格达以后，在萨达姆及其手下的一些高官家里发现，除了大把的美元，就是大量的美国大片。我们可以形象地说，萨达姆及其手下，用着美国的电脑，装着美国的软件，看着美国的电影，花着美国的美元，在和美国人较量，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说武器系统只是美军制胜的硬件的话，这种代表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及文化产品无疑充当了美军制胜的软件支持。

美军进攻伊拉克也是代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的。美军首先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是追求全球战略的国家，伊拉克又是全球第二大产油国，如果萨达姆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绊脚石，美国就会下定决心拿下萨达姆。所以，伊拉克战

品出经济学三昧

争期间，在美国国内虽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但更多的美国人采取了默认的支持方式。美军也代表了其盟国的利益。伊拉克战争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反对，但却得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盟国支持。美国早就表示所有的支持者都可以在战后的伊拉克分得一杯羹。美军还代表了伊拉克国内萨达姆反对派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大敌当前能够同仇敌忾，这个国家就很难被真正征服。萨达姆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在伊拉克国内树立了众多的敌人，而美军正是以这些人的解放者的身份向萨达姆开战的，因而也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

现在，美军逮捕萨达姆实现了伊拉克战场的完胜。美国当初出兵的目的就是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并将其绳之以法，理由是怀疑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的武装早就被解除了，现在萨达姆本人也被逮捕了，至于萨达姆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重要了。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完胜，引出了发人深思的“三个战胜”。

民主战胜了独裁。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萨达姆统治之下的伊拉克是一个独裁国家，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独裁的国家。仅仅从形式上看，布什是民选总统，萨达姆也是民选总统，布什 2000 年仅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而萨达姆 2002 年是以破纪录的百分之百得票率连任伊拉克总统的。但是，布什的微弱优势却是民主体制下的真实，而萨达姆的百分之百的压倒优势只是独裁体制下的假象。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并最终取得胜利，既可以说是民主战胜了独裁，也可以说是真实战胜了虚假。

信息化战胜了机械化。萨达姆曾经拥有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军队，靠这支机械化军队，萨达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西奈半岛战役中重创以色列、与伊朗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以闪电战入侵科威特。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萨达姆没想到真正的对手却是信息化。美军依靠强大的信息的搜集和处理能力，形成了精确打击、快速反应以及协同作战的信息化作战方式，从而屡屡扬威于冷战后的全球战场。两次美伊战争都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两次美伊战争让世界军事评论家们惊叹：机械化完败于信息化！

武力战胜了舆论。在美伊战争前夕，世界舆论是反对的，联合国也是反对的，甚至北约内部也有成员国是反对的，譬如，法国和德国都是反对的，土耳其也始终不肯借道美军，当然也还有俄罗斯反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是一支“失道寡助”的军队，但美军又是一支军力超强的军队，所以舆论的反对并不能阻止美军在军事上的胜利。这不禁使人遐想，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武力可以战胜舆论。

美军逮捕萨达姆，实现“三个战胜”固然是终结了“一个黑暗和痛苦的时代”，但在谈论“三个战胜”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其反射出的“三个碰撞”。

单极与多极的碰撞。虽然说冷战结束，世界由两极对峙转向多级化发展，一直是一些人们的良好愿望，但在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多极难免要围

绕于一极运动。在此情况下，要完全避免“一超独大”的单边主义，决非易事。今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单级，与这个世界的多极的碰撞将还会不时地发生。

强大与弱小的碰撞。如果说当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以强欺弱的话，那么，美国入侵伊拉克也同样是以强欺弱的典范。如果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弱小的人受到了另一个强壮的人的侵犯，法律不允许另一个更强壮的人对侵犯弱小者以暴制暴，如果人人都去“替天行道”，那天下岂不乱了套；在世界范围内，国际法同样不允许第三方擅自以暴制暴，除非有联合国的授权。美国绕开联合国，擅自对伊拉克动武，实际上是开了一个以强打弱的先例。

文明与文明的碰撞。美国和伊拉克分属两大不同的文明体系之下，美国是代表了信奉《圣经》的西方文明，其宗教基础是基督教，而伊拉克则是信奉《古兰经》的阿拉伯文明的成员，阿拉伯文明的宗教基础上伊斯兰教。美国一再声称无意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稍有不慎，便会伤害伊斯兰信徒的感情，比如，布什就曾在阿富汗战争前因自比十字军而不得不反复安抚阿拉伯世界。现在美国抓到萨达姆之后，如何审判萨达姆，也要考虑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和反应。也可以说，美国如要继续推进反恐事业，势必会将文明的碰撞降至最低程度。

萨达姆被逮捕了，并且必将受到审判，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有着双重面孔的人物，即作为英雄的萨达姆和作为魔鬼的萨达姆。

所谓英雄，即能为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做出轰轰烈烈事业的大人物。萨达姆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英雄，是因为他心中曾有过复兴阿拉伯帝国之梦，为此他也博得了“巴比伦雄狮”的绰号。萨达姆出身贫寒，经过一系列艰苦斗争，才到达了伊拉克权力的最高峰。作萨达姆的“阿拉伯民族情结”的表现，也为他争得了一些英雄的门面，透过这种情结，人们不难理解，即使在伊拉克遭受国际制裁，国内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萨达姆仍然拿出大批粮食和物资去援助同以色列对抗的巴勒斯坦，甚至给每位对以色列实施自杀性炸弹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发放奖金。作为英雄的萨达姆，还表现在他敢于向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叫板，萨达姆是这个世界上不多的反美硬汉，这是萨达姆被捕以前人们所公认的。

萨达姆的另一面是作为魔鬼的萨达姆。本来英雄总是属于一定社会集团的英雄，这个世界本不存在为全人类而战的英雄。萨达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处不用其极，尽显魔鬼之狰狞本色。在伊拉克国内，萨达姆实行了长达二十四年的高压血腥独裁统治，使其统治基础极不牢靠。在美伊战争刚一打响，就有萨达姆的高官变节，使战事急转直下；最后关头，萨达姆被自己最亲密的人出卖，而被美军抓获。对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萨达姆悍然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镇压，与库尔德人结下深仇大恨，这就使得其内部不能稳定，一旦与外国交战，就失去了安全的后方。与同为阿拉伯兄弟的伊朗交战，入侵邻国科威特，使萨达姆的周边环境十分恶劣。难怪在萨达姆被美军逮捕以后，伊朗竟也要求将萨达姆引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渡到伊朗，以审判其在八年两伊战争中对伊朗人民犯下的罪行。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作为魔鬼的萨达姆，四面出击的行动必然落得了一个四面楚歌的结局。

萨达姆的最后命运已不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了，不管萨达姆最终命运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萨达姆已经一文不值，他已经彻底走下权力的神坛；精神意义上的萨达姆还是一个焦点人物，他对伊拉克境内的抵抗力量还有精神上的作用，美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彻底瓦解这种作用。肉体意义上的萨达姆还存在着杀与不杀的争论，国际社会似乎不愿看到从肉体上终结萨达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已经呼吁，不要处决萨达姆。对美国而言，不杀萨达姆显然是上策，因为杀了萨达姆，反倒成就了他对伊拉克抵抗力量的精神激励，而让萨达姆活着，并让他与美军做交易，让萨达姆为美国的利益而服务，对伊拉克抵抗力量无疑是一种最大的精神瓦解，精明的美国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而伊拉克国内饱受萨达姆暴政统治的人们，恨不得立即杀了萨达姆，伊拉克临管会的官员称有可能在2004年7月处决萨达姆。如果美国真要将萨达姆交给伊拉克未来新政府审判的话，肉体意义上的萨达姆的命运可能凶多吉少。愿真主能保萨达姆一条老命吧！

64. 美国应从反恐中实现五大转变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受到恐怖袭击之后，经过一个月的厉兵秣马，美国终于向阿富汗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基地发起了攻击。美国通过两个月来的猛烈空袭，已将塔利班和本·拉登压缩在阿富汗南部的狭小地带。最近，美国又派遣了海军陆战队，战争很有可能进入地面搜捕阶段。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即使美国能在阿富汗取得军事上的完胜，并不意味着恐怖威胁彻底消除。全球反恐怖依然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美国要想在这一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至少要面临五种转变。

第一，人权外交转向和平外交。人们注意到，911 恐怖袭击之后，一向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美国不再安全了，而中国成了全球最安全的地方。比如，911 之后美国航空公司开往世界各地的航班大都做了调整，唯独开往中国的航班没有变化。但是中国的这种安全并不是得益于别的，而是得益于和平外交的政策。中国周边比较复杂，事态多变，比如，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战机被撞、渔船被扣等事件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了。而美国长期以来，以人权外交为幌子，四处插手别国事务，且常常有失公允。本来作为美国人权标准的基础的基督教文明和其他文明是有体系上的差别的，如果过分地以一种文明去挤压另一种文明的存在空间，必然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911 事件中的劫机者们，不为劫财劫物，他们都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不惜以牺牲生命来对抗美国。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是如此，美国的人权外交转变为和平外交势在必行。

第二，双重标准转向一致标准。美国向来奉行双重标准，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一方面，美国每年要对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另一方面，对自己国内某些糟糕的人权记录充耳不闻。在反恐怖问题上，一方面，美国深受恐怖主义之害，有十二分的理由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美国也扶植了一些恐怖主

品出经济学三昧

义,甚至也制造了一些恐怖主义。比如,本·拉登本身就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另外,向台军售、炸毁中国驻南使馆,撞击中国战机,这些事件无不隐含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嫌疑。因此,美国是到将其双重标准转变为一致标准的时候了。

第三,国际强权政治转向国际民主政治。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事实优势,对弱小国家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这些弱者身上,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比如,美国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出兵巴拿马,封锁古巴等等,根本无视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911恐怖袭击以后,人们发现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网络组织遍布全球各地,要想彻底打击恐怖主义,没有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是难以奏效的,美国进攻阿富汗塔利班也需要阿富汗的众多邻国支持才行。所以,美国势必要从国际强权政治转向国际民主政治。

第四,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冷战以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据200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GDP之比为50:5:1,由此看来,中俄两国综合国力加在一起也比美国差得很远。美国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这种优势地位导致了美国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倾向: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对别国盛气凌人的同时,甚至也不买盟国的帐。在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连续发生了拒绝履行“京都协议书”,被踢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驻外美军频频施暴,不顾全球包括盟国反对强行发展NMD等事件,使得美国单边主义日益膨胀。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单边主义有向多边主义转变的迹象,事发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频频向盟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通话,多边磋商全球反恐行动。

第五,谋求绝对优势转向保持相对优势。在冷战期间,全球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两极的格局,这两个国家既谈判又竞争,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均势。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略占优势;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两国势均力敌;在综合国力方面,美国占优。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已不能和美国相抗衡,美国已处于相对优势。但是美国显然还不满意这种相对优势,还要修改美苏“反导条约”。即使遭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仍然坚持要发展NMD,以谋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即使美国如愿以偿取得了这种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为了保持和利用这种优势,美国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垄断性地进行高压威慑。在这种环境下,类似911恐怖袭击的各种灾难事件将难以避免,且很难防范。因此,基于全球稳定和美国安全的原因,美国谋求绝对优势应该理智地让位于保持相对优势。

65. 非典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即使在海湾战争、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国内政治风波等诸多干扰因素发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在世界经济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往往还能保持一枝独秀。但这次突入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对人类经济的冲击却不容小觑，由于中国是疫情的重灾区，那么“非典”的发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是我们必须思考和关注的重要问题。

由于存在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分两种情况来分析。一种情况是，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技术上取得进展，比如研制出“非典”疫苗或特效药，从而“非典”的蔓延能够得到控制，这个较短的时间被一部分人理解为应该是在今年的六月底之前；另一种情况是，人们不太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非典”疫苗或特效药，从而“非典”的流行也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第一种情况下，“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表现为一种“需求震荡”，也就是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因突发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短期波动。比如，当中国“非典”疫情比较严重以后，很多外国公司取消了原来的订单，很多外国人避免来中国执行公务或旅游，国内的老百姓也不愿出门而尽量呆在家里，这自然也就大量减少了内需和外需。但按照我们的假设，由于“非典”的流行的时间不长，那么这种“需求震荡”也仅仅表现为一种经济的短期波动而已，按照有关专家的估计，“需求震荡”可能会使当年 GDP 增长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非典”本身，同人的生命和健康相比，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渺小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的：“假如能够换取中国没有‘非典’，哪怕是经济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都是值得的。”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非典”对人类经济的影响将是长远而严重的，它不仅是一种“需求震荡”，而且可能导致“供给畸变”的严重后果。具体可能会有如下表现：

第一，扼杀了人际交往中的温情。人类的发展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文明的进化使人际关系向着温情化的方向发展，它表现为一些交往的礼仪和相互沟通的规范。比如，向客户服务时要面带微笑礼节周到，人们见面时要握手甚至拥抱，等等。但“非典”的流行打破了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温情的一面，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见面不用握手方式而用拱手方式，戴上口罩与人交流，恐怕不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会有几分无奈。但在“非典”流行的情况下，人人自危，彼此提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限制了人流和物流。由于技术的进步，人类世界已日益变为一个网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地球村，这个网络实际上是用三种线联系起来的：信息流、人流和物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流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人流和物流，但它毕竟不能完全代替人流和物流。“非典”的流行必然限制人的流动，由于“非典”，除非无法回避，为了安全原故人们尽量避免出行。现在各种会议取消，旅游计划搁浅，甚至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女足世界杯比赛也要易地举行。“非典”对物流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人们排斥来自疫区的物资，以及加大对来往物资的检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方面。

第三，扭曲了资源配置结构。在正常情况下，市场经济将使一个社会的资源按照消费者的偏好合理配置。但在“非典”的流行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出现了扭曲，许多资源可能并不是按照消费者本来的意愿配置的，而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比如，“非典”导致口罩的大量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而戴口罩并不是给消费者本来的要求；“非典”还导致了一些预防性药品的生产也有同样的性质。

根据以上两种情况的分析，“非典”对我们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几乎是必然的，但正所谓：“非典”之下，几家欢喜几家忧。虽然“非典”给旅游业、服务业等行业以沉重打击，但医药行业却可能因之获益，像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店因“非典”将重新焕发生机。汽车行业也无意中受益，以往的车市，据说是看车的人多，买车的人少，“非典”发生后，人们不敢乘坐出租和公交车，车市就变成了看车的人少，买车的人多了。“非典”带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收获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警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突发性事件？在处理这一空突发性事件的过程中，我们既付出了教训，也积累了经验。为粉饰太平而隐瞒真相，加速了疫情的传播，有关责任人被撤换是中央正确的决策。

66. 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十六大报告分配专题解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胜利召开，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十六大精神。十六大报告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创新。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表明在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的理论 and 政策方面，十六大报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和重大进展。

从上面这句话来看，十六大报告不仅明确承认了按贡献分配的原则，而且明确地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视为并列关系的生产要素，这是革命性的突破。因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不仅不是生产要素，而且特别强调劳动根本就不是商品。马克思论证劳动不是商品的时候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如果劳动是商品，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第二，如果劳动是商品，按照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资本和劳动交换，资本家就不可能得到剩余价值，而实际上资本家能获取剩余价值，那么劳动就不可能是商品；第三，如果劳动是商品，它在交换时必须存在，但实际上工人和资本家交换时，劳动还不存在，所以，劳动不是商品。基于这三个理由，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并且认为劳动力才是商品，但劳动力又不是一般的商品，劳动力这种商品作为生产的投入，特别不同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这种商品之所以和资本、土地不同，是因为后者在生产过程中只能将自身价值不多不少地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市场经济的使用中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那就是能创造新价值，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增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的。现在十六大报告明确地把劳动和资本、技术和管理并列视为生产要素，这就不仅承认了劳

■ 品出经济学三昧

动是商品，而且还承认了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同等重要性，这一承认的意义是重大的。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对传统分配理论突破的另一亮点。因为在分配问题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是按要素分配，但这恰恰是需要我们去打破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决不是分配的结果，而是交换的结果，是和资本家等价交换的结果，工人得到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动力价格。而工资或劳动力价格只不过是工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费用而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工人其实并没有参与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分配，只不过是围绕剩余价值，各资本家集团进行的瓜分竞赛而已；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是对按要素分配的革命，但这是有前提的。实行按劳分配的两个大前提是：第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已不再是商品，劳动者是社会生活的主人；第二，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任何个人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不劳而获。在这种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就是个人根据自己向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社会领回个人消费品。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我们还不能直接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实现按劳分配。虽然按劳分配是个很好的设想，但在实际实行过程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评价、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等等。结果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行中往往搞成了“工分制”和“八级工资”之类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模式。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究竟是不是商品？改革开放以后，这一论题在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提高，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依然是商品这一论断，已经很少有人反对了。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肯定劳动是和资本、技术、管理并列的生产要素，这就不仅肯定了劳动力是商品，而且也肯定了劳动也是商品。肯定了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一切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十几年前，我国理论界已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合理性，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两百多年前在西方，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就提出了“三要素分配论”，即“劳动——工资、土地——地区、资本——利息”，这个公式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并被马克思称之为是专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合理性，这在我国特定的体制背景下，的确应该承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新。

十六大报告还提出了“确定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需要我们认真领会的。按照前面的分析，传统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中的“劳”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提供

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其他“多种分配形式”是以生产要素的商品化为前提的，因此简单地将二者结合，显然存在着逻辑上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劳动也是生产要素，那么“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确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过这时“按劳分配”中的“劳”指的是劳动这种要素的贡献。如果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也不难发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共同趋势。统计资料显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份额中大都超过了60%以上，发达国家且如此，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就更有必要坚定地贯彻十六大提出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确立科学合理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政策。

67. 和谐社会古今释义

一、和谐文化的历史解读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为：“和，相应也”，而“谐”的意思是“配合得当”。《中庸》里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致中和这一境界，则天地和谐，万物包融。按孔子的解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周礼》中也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等论述。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其意为：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和谐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谐，也是不可行的。可见，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这说明，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主张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孔子在《论语·颜渊》中阐述了著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孟子说：“仁者，爱人也。”（《孟子·离娄下》），可见，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要友爱相处。此外还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这是说“正人先正己”的道理。

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性学说。一是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三是《易传》的天人调谐

(诸天)说。当然还要考虑西方“戡天”(战胜自然)说对中国的影响。

庄子的观点是消极的思想,荀子的观点是积极的思想。西方“戡天”说和荀子的学说有相似地方。但是,如果一味讲“戡天”,也可能陷于破坏自然。事实上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西方在近现代以来,也开始强调保持生态平衡。

我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春秋战国,《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到西汉这一思想已形成,董仲舒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张载、二程和朱熹等人的完善,在宋明理学中被系统总结出来。

“天人合一”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既要改革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应该肯定,这种学说在今天看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二、和谐文化的深层理解

1. 和谐是多种关系的总合

和谐体现的关系可概括为“四相合拍”: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天合——与天合拍,不逆天时,也就是不逆背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凡事只有适时而动,讲究时机,才能水到渠成,才会有和谐结果。现在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恰逢其时。从外部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已是世界主流,从内部环境来看,新中国虽屡经曲折,但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初见成效,成就与碰撞同在,和谐社会的构建呼之欲出。如果时间倒退80年,构建和谐社会,无从谈起,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都笼罩大战的阴影,人类和平已可望而不可及,从内部环境来看,政治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当时环境下,谁言构建和谐社会,只恐是“痴人说梦”了,因为彼时和谐社会已无任何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率领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唯一正道。斗转星移,事过境迁,现今,中央与时俱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说也是顺应了天时。

地合——与地合拍,不违地利,也就是不能与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相抵触。

这要求我们做事必须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才会有和谐结果。试想,如在海南种小麦,在东北发展热带农业,都不会有和谐的结果,因为它们有违地利。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可能人尽地利。如果不能占居地利,是否就永不可企及和谐之结果?非也,且看,以色列,国土狭小且多沙漠,但以色列却通过高新技术在沙漠上开发出来了高效农业。日本也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但日本却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这说明,地利对于和谐固然重要,但还有比地利更重要的关系存在。

人合——与人合拍,不失人和,也就是不能违背民心所向。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人合，也就是“人和”，“人和”是事物和谐与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人和”的重要性。“人和”对于团队的意义在于，人和就是凝聚力，它可以提供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也就是大家都有积极性，“人心齐，泰山移”。

从竞争的意义讲，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事业成功的关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解放战争，国共相争，以共产党全胜，国民党惨败而终。但开战之初，国民党占居了“天时”和“地利”：国民党携抗战胜利之威，加上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不无“天时”之利；而且在当时，国民党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城市，军队人员和武器装备皆优于共产党，可谓占据了“地利”之便。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却占据了重要的“人和”：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让人感觉到始终是在为他个人而战，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却始终在为人民而战。淮海战役，60万共产党军队打败了80万国民党军队，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关键在于“人和”。可以说，如果没有无数支前民工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便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

人和，还表现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以“仁”为核心，“礼”为外观表现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人学，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等。儒家学说强调亲情仁爱，提出“血浓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在此文化教育的影响下，中国人重团圆、以享受天伦之乐为人生之大喜。而西方人更讲求自我，有独立和冒险精神。

己合——与己合拍，不离己合，也就是不能违背自身条件。

社会的和谐是一种有序的关系，首先达到个体自身的和谐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个体自身的和谐就是不要强己所难，养成恰当的心态，才能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这里心态的定位非常重要，是定位为索取，还是定位为奉献？如果定位为过多的索取，自己就会经常陷入痛苦；如果定位为奉献，就能从善如流，而经常达于己合。所以，只有达于己合，个体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宋代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然这种境界需要一种好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一旦达于己合，就自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不能达到己合，也就做不出和谐的选择。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都是不达己合，而酿成害国害己之悲剧的例证。这三位作为政治家是非常失败的，李煜和赵佶都是亡国之君，朱由校虽没有直接亡国（明朝是亡在他弟弟朱由检手上的），但他也的确是误国之君，但这三人都不是一般人：李煜是卓越的文学家、赵佶是卓越的书画家，朱由校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并且乐此不疲。如果这三人能达于己合，不要去做什么皇帝，世界上也许会分别多一个文学家、书画家、家私设计大师。

2. 和谐文化不同于斗争文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和谐文化不同于斗争文化。和谐强调四合，和谐文化是“和为贵”。而斗争强调对立，斗争文化是“斗为纲”。崇尚三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么说，和谐文化是否意味着完全放弃斗争？也不是！和谐文化也不能排除斗争，人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矛盾、冲突和纷争，因此，和谐中也有斗争。但不同的是，和谐中的斗争始终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这是为实现和谐而进行的斗争。而且，在和谐文化中，斗争也是讲原则的。

《论语·宪问》中记：“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有人说：“以德行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啊？”孔子说：“那用什么来回报德行呢？不如以正直回报怨恨，以恩德来回报因德。”在这里，“以直报怨”不同于老子的“以德报怨”、佛家的“以身饲虎”，而接近法家的赏罚分明。

斗争文化就不一样，斗争本身就是目的，是为斗争而斗争，因为在这种文化中，斗争本身就充满了乐趣，斗争本身就是第一需要。在这种斗争文化下，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制造敌人，也要斗。

过去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与天斗，违背了自然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结果，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灾难性破坏；与地斗，损害了生态环境，过度耕牧，植被破坏。结果，土地沙化，沙尘暴肆虐；与人斗，阶级斗争扩大化，右派遍地，冤案连连，结果：百业俱废，九州迷茫。

3. 和谐是一种均衡（制衡）

我们对和谐的理解不可静止化，而要从其背后把握其中各种参与力量的均衡性质。和谐是各种力量交互的结果和状态。均衡这一概念源自物理学，原指物体受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种作用力之下保持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来，均衡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指经济现象在多种经济力量作用下保持稳定的状态及其条件。现在，我们也可用这一概念解释社会和谐。

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都会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只要是社会是和谐的，这些力量的交互就会达成均衡。但这里的均衡也可以理解为制衡，和谐社会的均衡是还需要一定的制衡机制的。在这个制衡机制中，社会各种势力是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赖的。其中的关键是，在这个制衡机制中，是不能出现凌驾于一切力量之上的超级力量存在，否则，社会的和谐便不能稳定。我们注意到，在儒学形成的封建社会里，和谐理论常在，和谐社会不常在。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存在至高无上的皇权。明君圣主可遇不可求，和谐社会便不常有。在这种体制中，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够以民为本。

品出经济学三味

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意为：“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尚书》也说：“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其意为：“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也就安宁。”

由此，我们也不难悟出，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68. 新技术、新制度、新保障与 农村建设

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农村向何处去，曾有过种种不现实的想法。以为农村发展的未来就是要消灭农村。或是农村人来到城里成为市民；或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农村人就地变成城里人。现实证明这些做法效果并不好，或者说并没有改变我国广大农村的根本生活面貌。

现在，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我国广大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地把农村当作农村来建设，农村虽然还是农村，但穿旧鞋完全可以走新路，新农村将不同于旧农村。

那么，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何处呢？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旧农村相比，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笔者的理解主要是：要因地制宜地引入新的技术，要创立行之有效的新制度，还要建起一整套新的保障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有新的技术支撑，否则将难以体现新农村之新。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旧农村生产方式十分原始：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不少农村的生存环境亦十分恶劣：人畜混居，污水横流，危房处处，道路难走。

不引入新技术，旧农村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就难以改变。新技术的引入，不怕“踏破铁鞋无觅处”，只要做到因地制宜，反倒会“得来全不费工夫”。一项沼气技术的推广现在已极大地造福了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地方和农户共同出资建一个沼气池，花费只有几千元，但却巧妙地取得了循环经济：沼气池以牲畜粪便和其他生活垃圾为原料，治理了农村的污染，产出的沼气除了照明和烧饭之外，大量的多余沼气还可以用来发电。看来，由沼气池技术托起的循环经济使农村旧貌换新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将难以体现新农村之新。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都已普遍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制度相对于计划体制下的生产队体制,是一种制度创新,也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这种制度也会产生一些弊端,特别是对一些特定地区和特定农产品,就更是这样,必须探索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比如,为了避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胶工强割、超割等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海南农垦的某农场实行了就推出了新的制度。对于已经开割的胶园实行长期承包制,把承包期定为橡胶树的一个生产周期,承包收入按比例分成,一年一次定产,完不成计划产量的胶工按差额向农场赔偿。对于未开割的中小苗橡胶,则建立股份合作胶园,并区分不同情况,形成产权出让型和合作开发型两种模式。通过这些制度创新,农场既保证了胶工的生产积极性,又避免了橡胶生产的短期行为,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农场结合橡胶生产的特殊性,积极探索橡胶生产的制度创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建起一整套新的保障体系,否则将难以体现新农村之新。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侵扰,是各国政府重点补贴的产业。我国农业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政府补贴不到位,使得农业生产,特别是贫困地区,长期形成了靠天吃饭、朝不保夕的原始状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加强农村抵抗灾害和风险的能力,实现稳定农业生产的稳定和保障。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已经拨出专项资金进行了两期农村电网改造,广修农田水利工程,以及农村地区公路交通建设。通过这些措施,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已大为改善,但是,根据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仅有农田基础设施,还不足以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因为农业生产还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严重自然灾害或市场风险的冲击,因此还需要通过农业保险来进一步提供保障。

农业保险虽然在国外已很普遍,但在国内发展的还很不充分,一方面农业生产者限于财力,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不够,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因商业原因对农业保险积极性也不高。因此,造成了我国农业保险的缺失。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在艰难中也取得一定的发展,有三种模式引人注目:一是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模式,这是由政府补贴的公司运作模式,也是经济发达的上海适用的;二是吉林安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这是完全的公司化运作模式,也为政府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三是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模式,这是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由投保人联合而成,相互提供保险。在这些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中,主要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不足和有关保险法规立法不到位。因此,为了建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应想尽一切办法把农业生产的保障体系建立起来。



一方水土养成一方经济

—— 区域经济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69. 比较优势与海南发展

—— 部经济发展的历史似乎能够说明，分工与交换是财富增长的基本源泉。最初的分工是所谓的自然分工，也就是发生在家庭或部落内部的分工，比如，男耕女织的分工。后来这种内部分工发展到外部，形成一个国家之内的分工体系。当这种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为国际分工的时候，就产生了国际贸易。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探讨了，在什么情况下两个国家之间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绝对优势学说。

按照绝对优势学说，如果两个国家分别在两种产品的生产方面处于绝对有利地位，那么两个国家就应该分别生产自己处于绝对有利地位的产品，然后进行自由贸易，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举例来说，假如葡萄牙和英国相比，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而在毛呢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不利地位，那么葡萄牙就应该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对英国而言，其在毛呢的生产上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而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不利地位，因此应该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生产毛呢。这样葡萄牙用葡萄酒交换英国的毛呢，两国都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和毛呢。

绝对优势学说虽然初步论证了交换发生的条件，但它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而另一个国家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方面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分工与交换会不会发生？英国的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论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处于绝对有利地位的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有利的程度有所差别，那么两个国家仍然存在相比较而言的优势，因而可以实行分工与交换，并共同从中获取比较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学说。仍以葡萄牙和英国为例，假设葡萄牙和英国相比，不论是在葡萄酒的生产上，还是在毛呢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有利地位，但相比较而言，在葡萄酒的生产上更加有利。那么，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就应

品出经济学三味

该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葡萄酒；对英国而言，虽然在葡萄酒和毛呢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但在毛呢的生产上还是相对有利一些，那么，英国在毛呢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就应该在国际分工中专业化生产毛呢。这样，两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交换同样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和毛呢。

比较优势学说不仅能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且也能说明不同地区 and 不同个人之间的贸易发生。虽然围绕着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始终存在着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但建立在比较优势学说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毕竟是大势所趋。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都是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一背景下，海南作为我国最小的省最大的特区，必须找到自身发展的正确定位。

海南建省十多年来，几经周折终于确定了将海南发展为“高科技生态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旅游观光胜地”和“智能信息岛”的战略定位。结合比较优势学说，我们就更能体会到这一方向的正确性。海南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自然风光方面的特点，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就构成了海南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热带旅游观光胜地”这“两地”的绝对优势。但一个地方的发展光靠绝对优势是不行的，还必须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海南发展“高科技生态省”和“智能信息岛”的战略定位。也许有人会觉得，海南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其他各方面和大陆先进地区相比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提什么“高科技生态省”和“智能信息岛”岂不是太可笑了？但我认为若从比较优势的原理出发，还是可以理解这一战略定位的。虽然海南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和发展传统产业相比，建设“高科技生态省”和“智能信息岛”可能更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因为生态和信息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的，知识在于人才，而海南优越的自然环境可以吸引一流的人才加入；海南可以容忍传统产业的落后，惟独不能容忍生态和信息产业的落后，况且生态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两地”的发展必然形成良性推动，二者相得益彰；传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恶化是有目共睹的，海南比其他地方更赔不起环境恶化的损失，而生态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环境恶化的影响最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海南“一省两地”的发展战略定位，正是海南的比较优势所在。

70. 海南产业发展如何避免“荷兰病”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荷兰是一个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也就是说，荷兰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后来，荷兰在北海开发出了新的天然气资源。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都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但情况似乎对荷兰不利，因为荷兰越是增加天然气的生产，其生产出口产品制造业就越是萧条。这就是所谓的“荷兰病”。同样，英国迅速开发北海油田也引起了该国制造业出口的困境，也称为“英国病”。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天然气部门的迅速发展，工资和利润大幅攀升，挤压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和资本，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上升，而出口商品由于出口竞争，无法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传统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就逐渐丧失了。

“荷兰病”说明了，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绝对优势学说虽然初步论证了交换发生的条件，但它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而另一个国家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方面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分工与交换会不会发生？英国的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论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处于绝对有利地位的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有利的程度有所差别，那么两个国家仍然存在相比较而言的优势，因而可以实行分工与交换，并共同从中获取比较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学说。

但建立在固定分工学说基础上的静态比较优势不能说明分工中的角色转换，不能说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分工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可变分工的学说出发，来考察动态视角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随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分工中的角色是可以转换的。这也是上述“荷兰病”的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结合海南的产业发展实际来看，不仅要着眼于海南的绝对优势，还要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找到海南真正拥有的比较优势,尤其是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比较优势。什么是海南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呢?

海南在建省之初,曾经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但海南建省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单纯地实现工业化并非海南的比较优势所在。海南地处热带,其气候条件和自然景观方面的特点,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这一特点,现在海南提出了发展“新型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和“智能信息岛”等战略定位。从比较优势的学说来看,这一定位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海南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热带海岛旅游胜地”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说,“两地”正是海南产业发展的绝对优势所在。

但正如“荷兰病”所表明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所以海南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还不能仅限于此。

海南产业发展要想在动态中保持比较优势,并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还应该考虑几大产业间的相互转换和相互结合。比如,将海南渔业和海南旅游业相结合,有人提出了“休闲渔业”的观点。休闲渔业,涵盖垂钓渔业、养殖观光业(包括水族馆养殖)、设施旅游业等方面。国内外发展休闲渔业的实践证明,发展休闲渔业是渔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渔业资源衰退,部分渔船淘汰后渔民转产,增加渔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出路。根据海南作为海洋大省和旅游大省的实际,发展休闲渔业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笔者还认为,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和海南旅游业的结合。将高科技运用于热带农业,不断培育出新的生物品种,本身就是旅游开发的一个看点。而“新型工业省”和“智能信息岛”的建设,正是给海南产业间的这种相互转换和相互结合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

在动态中保持比较优势的另一个例子是,海南反季节瓜菜的发展和出路。海南岛一年四季阳光明媚,雨水充沛。因此,海南开发反季节瓜菜具有毋庸置疑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海南反季节瓜菜的生产和供应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报载,2001年海南的“冬交会”盛况空前,经过三天的洽谈交易,合计成交农产品183.54万吨,其中境外订单大大超过往年,另外还签订了49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为3.66亿元。“冬交会”盛况说明了海南反季节瓜菜生产和供应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我国北方冬季,唯一能和海南反季节瓜菜构成竞争的是塑料大棚蔬菜。只要塑料大棚的成本还远高于海南反季节瓜菜的出岛运输成本,那么,海南反季节瓜菜就依然拥有比较优势。但我们知道随着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说不定哪一天塑料大棚的成本就会大幅降低,到那时,海南反季节瓜菜仅靠自然的恩赐是很难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今年冬天海南蔬菜价格比往年已有所下调,这与我国

北方经历了一个暖冬，塑料大棚蔬菜的供给增加，从而影响了海南反季节蔬菜的出岛有关。所以，海南反季节瓜菜生产和供应还应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了在将来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海南反季节瓜菜的整体发展规划应该具有前瞻性。

首先，海南反季节瓜菜应该突出发展自己的特色产品。这就需要加大农业投入的科技含量，推出创新产品，将海南独特的阳光和水源优势体现到产品中去，形成自己的垄断优势；其次，海南反季节瓜菜应该向无公害蔬菜方向发展。无公害蔬菜是未来蔬菜发展的方向，我国已于2001年10月1日起实施无公害蔬菜国家标准。在此背景下，海南应该把无公害蔬菜作为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升级以及促进生态省建设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无公害蔬菜检测认证工作，使广大消费者能方便地吃上“放心菜”。最后，海南反季节瓜菜要有可靠的流通渠道和中介环节。海南反季节瓜菜的出岛运输是其竞争中的关键，除了继续保证“绿色通道”畅通无阻之外，有关部门还要完善海南反季节瓜菜中介环节，协调好菜农、菜商和消费者的关系和利益，为海南反季节瓜菜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71. 订单农业做大做好的方向： 农产品期货交易的作用

来自临高和万宁的两封农民来信反映的尖椒价格低迷，订单执行不利的情况，在《海南日报》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农民生产的尖椒有一半都烂在了地里，农业公司也赔了不少钱。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订单农业到底怎么了？

农业生产向来就有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等特点。而中国的农业除此之外还存在有农业投入低，农民负担重等多重困难。所以，对我们的农业生产而言，让农民们在辛勤劳动的同时，还需要他们自己去把握变化莫测的市场，确实也难为他们了。而订单农业的发展，稳定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因为有一纸订单在手，农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专心于生产，有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从两封农民来信反映的情况来看，问题出在订单上，而不是出在订单农业本身。因为在订单合同上，某农业公司并没有盖章，因而是无效的“合同”。农业公司在此耍了一个花招。即如果尖椒行情看好的话，农业公司肯定会履行合同，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如果一旦尖椒行情不好的话，农业公司必然会投机取巧，中止合同，这样农民损失惨痛。

订单问题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假如农民懂点法或是请教一下法律专家，他们就不会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农民这样做了，碰上今年尖椒价格低迷，赔大本的就是农业公司了。农业公司赔本并不太可怕。农业公司吃的就是这碗饭，有可能赚就有可能赔。农业公司和农民签的订单实际上是一种远期交易合同，这种交易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需要有人承担，但重要的是要让承担者承担得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订单农业做大做强。

将订单农业做大做强方式可以考虑期货农业的方向，也就是农产品交易引入

期货交易方式。订单农业本质上属于现货交易的远期交易方式。期货交易是为了分散风险在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指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的标准化合约的转让。实际上，现在我国已有不少农产品已经在实行期货交易，比如天津的红小豆交易市场、郑州的小麦交易市场等。

海南热带高效农业是海南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之一。各种热带农产品产量丰富，发展潜力较大。在目前订单农业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考虑，通过期货农业进一步促进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发展。假如海南有了农产品期货市场，上述尖椒生产的订单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在期货市场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大量的投机者，他们就是为了博取价差，同时也承担风险；另一类是套期保值者，他们是为了避开价格波动，从而回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公司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将风险转嫁给众多的投机者，这样风险也就分散了。具体做法是：农业公司在与农民订下购买尖椒的远期合同的同时，向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卖出同样数量和同样价格的一笔期货合约。这样总能保证现货市场上赔多少钱，期货市场上就补偿多少，或是相反。农业公司可以确保在尖椒生意的批零差价中赚钱。这种结果，农民和农业公司都可以满意。

72. 学者扶贫与计生宣传

通过三下乡等各种形式，改变我国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活动。学者扶贫使理论下乡，一方面锻炼了学者，另一方面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

我说的这位学者是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室友，应该是从事人口经济研究的学者了。在一次扶贫活动中，这位学者被分在了计划生育工作组，帮助计生办主任做一些计划生育宣传方面的事情。学者到全乡各个村子里看了看，发现计划生育的标语虽然贴得到处都是，但几乎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所以学者决定就从整顿计划生育宣传的标语入手开展工作。

从各村墙壁上设计或张贴的形形色色的各类计划生育宣传标语中，学者找出了问题所在。比如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宣传壁画，画面上是一对年轻夫妇举着一个小孩，画面的下面是一行大字“只生一个好”，并且所有的壁画上的小孩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学者说这种壁画虽然用心良苦，但其效果并不好，因为这种空洞的宣传很难使人们真心信服，最需要让人们知道的是为什么只生一个好？壁画上的小孩全部画成女孩也不妥当，虽然农村盛行重男轻女的观念，然而运用反向强调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会产生逆反心理，认为这是欺骗宣传。所以，不如承认现有重男轻女观念的既成事实，然后采用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不能因为现在农村盛行重男轻女的观念，我们就拼命地宣传其实是女孩比男孩好，来个重女轻男，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学者发现有一些标语就是赤裸裸地这样做的，比如“生时想男儿，老时想女儿”。还有一种标语，如“女儿也是传后人”等，尽管比较温和，但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计划生育宣传必须和广大农村脱贫致富的动员结合起来，才是行之有效的作法。这是学者非常坚定的观点。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标语都不能令人满意。在进一步的发现中，有一条标语得到了学者的认同，那就是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在基本肯定的同时，学者认为仅仅这样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向乡亲们讲清楚为什么是这样。为此，学者对这个基本不错的标语又进行了改造。这样，“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的下面就多出了一个副标题：“栽树与生孩子的成本收益分析”。当写出这个副标题后，学者觉得还必须增加篇幅才能进行分析。但这样一来，标语就办成专栏了。好在有计生办主任的大力支持，这个计划生育宣传专栏计划很快就在各村开展了起来。

通过别具一格的专栏形式，学者向村民们讲解了少生孩子多栽树的道理。先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看生孩子的问题。生孩子要付出很多成本，包括衣食住行教等方面的大量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和生养孩子的数量是有关联的，孩子生得越多，花费的费用也越大。同时还要考虑到生孩子所支付的机会成本，也就是因生孩子而耽误了父母很多挣钱的机会。然而另一方面，孩子带来的收益却不取决于孩子的数量，而取决于孩子的质量。如果孩子不成才，父母要费很大的力气给他找工作，甚至白养着他。这样，多生孩子不但没有带来收益，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在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的情况下，多生孩子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并且使每个孩子分到的培养费用进一步降低，这样孩子的质量也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孩子带给家庭的收益也会进一步减少。所以说，多生孩子使成本增加而使收益减少，肯定不合算。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看栽树的问题就是另一种情况了。由于学者所下的这个乡适合经济林木生长，所以，对村民们来说，多栽树的成本不过是买树苗、施肥和浇水而已，而这些对村民们来讲简直不算什么，因而多栽树成本极其低廉。而多栽树得到的收益却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大的方面讲，植树造林，绿化环境，防沙固土，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其次，多栽树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果树花开时节，引来无数蜜蜂，可以发展养蜂业；有当地特色的几大果类产品，市场潜力不小，通过大力发展果园种植业，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可以提高村民收入。所以，多栽树是一本万利的长期投资行为。这样看来，“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还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快十年过去了，听说当学者又一次来到这个乡的时候，发现那些计划生育宣传专栏已经不见了，原来办专栏的墙已变成了一幢幢新盖的大楼。最令学者兴奋的是，这个乡的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山头都被开发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在已经卸了任的老计生办主任那儿，学者了解到，现在村民们忙着管理果园和参加定货会，再没有多生孩子的念头了，就是想多生，恐怕也没有时间和条件了。

73. 生意人的生意经

在 我每天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有一家小吃店，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干净利索，小店虽然不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卫生条件也不错，供应的各类小吃还挺有风味。我六岁的儿子在那吃了几次早点后，就喜欢上这个小店了。

在儿子的要求下，我们每天的早点就在这儿定点消费了。小店的老板在平时没事的时候，总是拿着一份都市报看彩票版以消磨时间，而老板娘则总是闲不住，不是忙着进货，就是不停地收拾着不大的屋子。小店的两口子待人很热情，没多长时间，我们和这两口子的关系也熟了。才知道这两口子都是四川人，以前还开重庆火锅店。

就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这吃早餐的一段时间里，忽然有一天小店关门了，而且一直关了五天。这五天我们吃早点可成了问题，因为我儿子就相中了这家小店，其他地方哪都吃不好。直到第六天，小店终于又开门了，这可高兴坏了我的儿子，儿子早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要去吃早点。

小店依然和从前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个雇工。我就问老板：“为什么关了五天门？”老板有点不太好意思地说：“前几天买彩票中了五千块钱奖，太兴奋了，想调整一下心态，就关了五天门。”

“还请了一个伙计。”我接着他的话，并开玩笑地对他说，“幸亏您只中了五千元，您要是中了五万元，我们恐怕要五十天都吃不好早点了！”结果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随着谈话的深入，老板渐渐地给我讲起了他的经历。

“我以前也曾红火过，最发达的时候要雇用十几个伙计呢。”老板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过去，语气中带着一丝留恋，“我也挣过不少钱，但后来都赔了。那年上海浦东开发，我带着在海南攒下的钱到浦东去开店，结果不到一年，血本无归。我又回到了海南，就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手工劳动者了。”

当老板讲到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我忽然联想起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于是，我就问他：“现在国家正在你的老家搞西部大开发，你有没有考虑杀回老家去呢？”

老板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有点狡黠地反问我：“你觉得呢？”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回去也没戏！”老板十分肯定地回答。这倒引起了我的一点好奇。于是，我进一步追问：“此话怎讲？”没想到的是老板居然非常娴熟地给我来了一番经济分析。他说：“西部大开发虽然声势很大，但目前也只是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开发，这不会给我们这样的带来太大商机，因为从人流上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少数高级的工程技术人员，这部分可以算是白领中之白领，他们是不会来我这样的店中消费的；另一类是大量的民工，这部分可以算是蓝领中之蓝领了，他们是那种围在工地吃大锅饭的一类，也不会来我这儿吃饭。只有到了大量公司企业入驻之后，我们才会有机会，因为这时就有了大量的上班族，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服务对象。”

我接着他的话问道：“如果时机成熟，你就要回去吗？”“那也未必！像我这两下子，在我们老家遍地都是，我回去也没有什么优势。再说了，我也挺喜欢现在这个地方和环境。”老板最后给了一个让我放心的答复。

听了老板的话以后，我在想，不仅每个生意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生意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每个老百姓都是一个经济学家啊！

74. 生态保持与经济发展孰优先

当前海南人民正在致力于构建和谐海南。海南的和谐首先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天给了海南一个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在这方面海南处于一个较高的起点。但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在加入了人的活动以后，如果海南的生态环境一步步地由和谐走向了不和谐，那么，我们就上愧于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所以，在海南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质就在于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不要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活动而破坏了海南美好的生态环境。

实际上，经济要发展，生态更要保护。海南要在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工业，这样的共识让人颇感欣慰。在海南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发展长期滞后，人称“工业短腿”，这是海南富不起来的一大障碍。如果海南能够做到一方面发展了工业，另一方面又保护了环境，这诚然是上上之策。但最理想的也往往是最困难的，如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当如何取舍？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想，正确的选择是必须把海南生态环境的保护置于优先地位。蓝天白云和椰风海韵虽然来自上天对海南人民的恩赐，但海南又是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这决定了海南不仅仅是海南人民的海南，她还是全国人民的海南。海南保护生态环境责任重大。这又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海南在其经济发展中，如果付出了较大的生态代价，那将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环境如果被彻底破坏了，海南挣多少钱都弥补不过来。过去在我国很多不适合农作的地方，强行广种薄收，现在看来，微薄的农业收获远远补偿不了其对环境的破坏，后来国家不得不拿出钱来进行“退耕还林”。同样，如果现在海南为了挣一点钱而破坏了环境，将来有一天也许会花费更大的代价，不得不退“经济”还“生态”。

其二，海南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海南，那么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就不仅是海南

的责任，也是国家的义务。这就是说，需要由国家投入，解决海南生态保护中出现的贫困问题，因为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是需要当地人民付出经济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对海南的投入，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视之，是对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的合理投资。

从人与自然的和谐来看，应该说海南目前整体上是和谐的，但不和谐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方还不时地出现毁林盗林、排放污水废气，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例如，有个中部山区的村庄过去曾是一个文明生态村，可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毗邻该村的水泥厂的兴建，使周围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由于水泥厂的废气、粉尘污染，村里常常是烟雾弥漫，使村民常感呼吸困难，村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类事情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海南生态环境的保护应优先考虑，并不意味着海南可以不发展经济。海南完全可以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积极谋求发展。目前，海南各界围绕桉树浆纸林种植业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本身正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海南的生态和谐。

75. 粤海铁路通道对海南发展的影响

粤海铁路作为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已于 2003 年 1 月 7 日正式开通，这不仅标志着海南与大陆被海隔绝的历史从此结束，不仅填补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空白，而且结束了海南与外省不通火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将在多个方面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加速发展提供巨大的契机。

一、粤海铁路通道对海南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何选择主导产业是决定海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建省之初，省委、省政府确定了以经贸为龙头的产业发展战略，并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如，1988 年 8 月，省政府颁布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1988）26 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简称“三十条”）规定：“凡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均享有进出口经营权”，按照这一规定以及海南政府办公厅的解释，凡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包括持有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的个体经营户，都可自动取得进出口经营权，这等于是允许贸易自由，这种规定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三十条”还规定：“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及省政府的条例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均可放开经营，大胆试验”，“允许企业以一业为主，交叉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及其他业务”。这实际上是实行更加开放的自由企业制度，取消对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合理限制。“三十条”的颁布，极大地刺激了海南经贸的发展。尽管受到全国经济低潮的影响，但海南在建省初的三年实际利用外资将近 4.8 亿美元，是建省前 8 年总和的两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10 亿元，比建省前 37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还要多。

但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持续下去，现在看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仅仅有政

策还不够，还必须有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撑，从交通方面来看，当时海南和大陆的物流联结只有海运和空运，而在作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还没有开通的情况下，海南商贸业的过热发展只能走向歧途。从实际上看，大约从1992年起，房地产业不知不觉地成为海南产业中名副其实的“老大”。虽然房地产业的发展给海南带来了数百亿元的投资，但却没能带动海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反倒使海南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了无数“烂尾楼”和“半拉子工程”。

海南建省办特区前几乎没有房地产业，建省初期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也没有重点发展房地产业的计划。只是因为建省后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以及海南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使众多商家看到了海南房地产业的发展机遇。从1991年下半年起，海南房地产开始升温，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后，房地产热潮骤然形成，房地产开发公司急剧增加。从1992年到1993年10月，由房地产业吸引的国内外投资有87.5亿元，分别占1992年、1993年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4.7%和33.8%，房地产业成为海南省这两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房地产热潮带来的虚假的繁荣景象下，当时海南把房地产业作为海南的龙头产业，又犯了一次错误。由于海南本地房地产需求有限，而海南岛作为一个封闭的海岛在当时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岛外居民上岛买房。所以当时火热的房地产交易中隐含了大量的投机和炒作因素，致使房地产泡沫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随着中央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海南房地产的“过热”势头终于得到控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对于拆借资金、信贷资金炒房地产的，要坚决收回；未经批准集资搞房地产或挪用资金参与乱集资、炒房地产的企业，要停止贷款；对银行把信贷资金注入自办的公司搞房地产的，要坚决收回。这一严厉措施切断了房地产投机活动的资金来源，使“火爆”了两年的房地产业骤然冷落下来，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市场一片萧条。以房地产为龙头产业的发展，给海南留下的是200亿资金被套牢，500多万平方米商品房闲置，大批房地产项目停工停建，“半拉子工程”成了海南的一道无奈的风景区，整个海南经济的健康发展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现在粤海铁路通道开通却可望给海南沉寂已久的房地产业带来新的机遇。随着铁路的开通，来海南旅游人数的迅速增长会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海南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来海南居住，进而会直接扩大对海南住宅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房地产业将在粤海铁路的带动下有望逐渐走向复苏。

继房地产为龙头产业之后，海南又提出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的发展战略。1993年7月，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优化产业结构。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业。1994年2月，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了关于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路。但是一个新兴省份的发展光靠旅游业和第三产业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于是，“一省两地”的海南产业发展战略应运而生。所谓“一省两地”，即把海南建设成为中国沿海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的新兴工业省和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中国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海南要建设成为新兴的工业省，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结合海南省情，工业化是加快海南发展的必然选择，海南的新型工业化应是以信息化带动的、生态主导型的、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和充分吸纳人力资源的工业化。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对海南实现新型工业化意义重大。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和火车开始的，铁路成为工业化国家国民经济流量循环的大动脉。铁路所到之处聚集物流人气，促进城市兴盛发展，铁路文明为沿线带去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新发展。粤海铁路的开通为海南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已建成的海口南站是粤海公司最大的综合性货运站，依托火车站将建设一批综合性的货仓、专业市场和批发中心，逐步形成辐射周边地区的集批发、加工、包装、仓储、运转五大中心为一体的现代物流集散地，建成海南农副产品、工业品通向全国各地的物流中心，同时进岛的货物也由此以低成本的方式流向海南各地。充分利用粤海铁路通道这条海南发展的生命线，是海南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是海南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但由于海南与大陆有海峡相隔，大宗货物和农产品反季节瓜菜的运输受到制约。仅2001年，海南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岛总量约497万吨，其中新鲜瓜果菜为340万吨。大约40%的瓜果菜没能及时出岛而被迫低价销售，或白白烂在地里。海南瓜果菜出岛运输百分之90%以上靠汽运，海运、空运不足10%。另据一项统计显示，2000年海南瓜果菜卖了53亿元人民币，而运输行业靠运瓜果菜收入了17.5亿元，相当于瓜果菜收入的三分之一。海南建省十五年来，由于缺少横跨海峡的铁路交通，使海南的热带农业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粤海铁路通道开通最大受益者是海南，而海南的最大受益者，则是热带农产品。据南国都市报报道，每年进出海南岛的瓜菜，统计达300多万吨。粤海铁路未开通前，运到北京每公斤瓜菜的成本平均1元钱左右。而粤海铁路开通后，包括短途的辅助运输，每公斤的成本在3毛元左右，仅此一项就可降低成本10亿元。这样，利用粤海铁路通道，海南丰富的热带物产将通过全国铁路大动脉，直接而又经济地运往内地。这一切都为海南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

按照“一省两地”的发展战略，“以旅游业为龙头”调整为把海南建设成为“中国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是一个科学而又务实的选择。旅游业毕竟是海南的优势产业，旅游业必须要搞好，但旅游业又必须要和海南整体发展相协调。海南旅游资源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它的优势所在。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优美的自然风光使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01年来海南的人数突破1100万

人次；2002年突破了1200万人次。这些人上岛的方式只有两种：飞机或者轮船。而海南目前已经具备年接待2000万人次的能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的旅游客源调查显示，75%的人希望到海南旅游，海南已成为公认的中国内地冬季首选度假旅游目的地；但是在全国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上，却不见海南踪影。原因很明显：由于海南地处偏远，对于普通大陆居民来琼旅游，乘轮船费时，乘飞机费钱。在正常情况下，乘飞机上岛的游客占了总旅客数量的一半左右。在旅游费用中，飞机票等交通费用占旅游开支的70%至80%。如果乘坐汽车再转坐轮船渡过琼州海峡来海南旅游，需要的时间又很长，这无形中就把一些观光型的游客挡在海南的门外。粤海铁路开通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铁路部门将在2003年年底前开通粤海铁路跨海轮渡客运。到那时，游客可以乘坐火车直达海南。粤海铁路为进出海南的人流提供了一个比乘飞机省钱、比乘轮船省时的空间巨大的新通道，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普通消费者来海南旅游的费用，促进海南旅游市场的开发。据预测，到2010年来海南旅游的人次将超过1800万，铁路因其安全、快速、价廉等优势将成为人们外出旅游的首选。粤海铁路通道跨海轮渡开通客运后，对收入不高的游客来说，是更具吸引力的旅行方式。游客坐着火车，还能饱览广东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秀美风光。

二、粤海铁路通道对海南文化交流和 发展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国际上跨海火车轮渡已经拥有130多年历史，目前国际上仍有71条航线在运行。古往今来，跨越海峡，将海南连通全国，是多少仁人志士的向往。清末大臣张之洞就曾提出筑铁路至海南腹地的设想；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更在中国西南铁路的规划中，设计了火车于海安再以渡船与琼州岛联络的方案。现如今粤海铁路通道开通使先贤们的梦想成为现实。

粤海火车轮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跨海铁路通道，北起广东雷州半岛的北港，南至海南岛北部的南港，跨海宽度约12.5海里，两港之间的琼州海峡火车轮渡航程约需50分钟，是整个粤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海铁路海口车站及配套工程主要包括海口车站客运站房、站台、调度指挥楼和通讯楼等。海口车站总面积12590平方米，主站房上下两层共设有大小八个候车室，可同时容纳2000名旅客。车站的两个站台可同时停靠三趟旅客列车。海口车站的建筑风格为庭院式对称布局，带有浓郁的亚热带滨海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既体现现代文明又展示了黎族风情。海口车站是粤海铁路通道的标志性建筑物，也是海南省的标志性建筑。在当今形象代表价值，注意力经济引导眼球竞争的时代，粤海铁路和海口车站这些标志性建筑既是海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海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粤海铁路通道开通，使历史沉积在海南一带的流放文化有了开发的价值。海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南岛历史上被视为荒蛮之地。历朝历代的流放之人，在这块孤岛上留下了许多艰难的足迹。特别是在唐、宋两代，贬于雷州或贬于徐闻、海南的朝廷命官共达 22 人，其中宰相就有 7 人，苏轼、苏辙、寇准、李纲、汤显祖在雷州半岛与海南之间的贬谪之行、诗文唱和、办学建馆，为两地积淀下共有的文化渊源。把这些文人墨客在粤海铁路通道之间留下的胜迹连起来，踏访“流放”之路，可谓别具一格。起点从湛江近郊的东坡岭、湖光岩到雷州的西湖、苏公亭、寇公祠、十贤祠，再到徐闻的登云塔、贵生书院，再到海南的五公祠、东坡书院，简直就是一条绝无仅有的“流放”历史文化长廊。

粤海铁路通道开通，有利于上述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必将促进海南文化产业的大发展。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文化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也日益独立化，这就带来了文化产品产业化发展趋势。按照我国文化名人余秋雨的看法，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传媒；第二是出版；第三是演出；第四是旅游。这四个领域都有可能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形成文化产业的热点或者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被视为 21 世纪的“朝阳工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天航空的第二大出口产品；现在，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也已超过其汽车工业的产值。

我国的文化产业伴随改革开放产生，发展壮大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在看到我国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必须要清醒意识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不够充分，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化、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1998 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26%，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0.8%。而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7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部分项目合计）仅占其经常性消费支出的 2.35%，这种状况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文化产业在我国还有大力发展的潜力存在。

从海南所具有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来看，是非常适合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在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为海南文化产业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条件。比如，海南风景优美，十分有利于文化传媒业的发展，来海南拍摄电影、电视剧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今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加强了这一优势。通过在海南设立电影电视学院，建立影视基地、吸引影视大腕儿来海南创业，完全有可能将海南建成东方好莱坞。海南是天然“大氧吧”、是否没有冬天的海岛，这里适合进行各种演出和体育活动，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明星来海南演出，也有不少体育俱乐部来海南建立了冬训基地。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必然会加强这一趋势。对于旅游方面，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粤海铁路通道开通的影响，但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

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充分利用粤海铁路通道把海南旅游业做出文化内涵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粤海铁路通道对海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把握了机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达、交易活跃的地区，现在广东和其近邻的香港和澳门组成了颇具活力的“华南经济圈”。虽然海南开发已经十多年了，但由于海南经济是一个海岛型经济，对于近在咫尺的粤港澳“华南经济圈”却长期难以融入。粤港澳不仅位置相互邻近，而且三地之间都有铁路或公路相联。而海南却不仅与三地距离较远，更是由于海峡阻隔，无法通过铁路或公路参与“华南经济圈”的繁荣。

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一个地方经济起飞的翅膀，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就像一条丝带，把海南与整个华南地区绑在了一块，两地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共享。同时借助内地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海南的产品将进一步深入到祖国的广大腹地。海南丰富的热带物产将通过粤海铁路直接运往内地，大量游客和工业原料也将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海南岛，免除了以往经过岛上公路运输、再转海运，再到大陆市场的多重运输，既节约了运输成本，又方便快捷。所以，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对海南融入“华南经济圈”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

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不仅将海南经济与华南经济圈联结起来，而且我国整个西南部也因为粤海铁路的诞生而联成一片，海南岛最终也与大陆联成了一片。由于湛江地处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交汇处，背靠华南、西南，因此粤海铁路湛江段正处在将西南几省铁路网联在一起的端口上。粤海铁路经北上达到湛江，从湛江往东，经三茂铁路可与京九、广梅汕铁路相连。另外，粤海铁路在湛江市遂溪县的塘口与黎湛线相接，沿黎湛线北上可与湘桂、焦柳、京广等铁路相通；往广西方向，经湘桂线可与南昆线相接，达到西南地区；沿湛江至洛阳铁路北上，还可直达内陆腹地。此外，广东的湛江港、广西的钦州港和防城港等沿海港口，都是能停泊通达世界各地大吨位货轮的深水良港，每天源源不断地吐纳大量进出口物资。粤海铁路开通后，不仅海南省的进出口物资可通过粤海铁路自由选择进出口的港口，西南各省的物资进出也更为便捷。粤海铁路也同时将广西、贵州、四川与广东和海南地区联结得更紧密。

粤海铁路通道开通前，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市每年经湛江港进出口的物资已占全港进出口货物总额的近50%。目前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加速实施，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为海南分享西部大开发的溢出效应，西南与海南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和便捷，西南各省将有更多的物资借海南而通往世界各地。所以，粤海铁路开通，一方面可使海南借助“华南经济圈”依然存在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可使海南沾染因西部大开发而可能出现的“西南经济圈”的好处。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使得海南铁路运输网络给海南西部工业走廊带来新的希望。经过几年的培育,从北边的澄迈老城开发区,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往南就是东方化工城,海南“西部工业走廊”已经成型。“走廊”给铁路提供了运输基础,铁路也将以自己的服务,为“西部制造”降低流通成本、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所以,现在可以说,汽笛一声,天涯不再遥远,海南经济腾飞也不再遥远。

四、粤海铁路通道对提高海南物流效率的影响

海南与大陆的联系通过民航航线而日益紧密,但作为大宗货物和农产品反季节瓜菜的运输仍然受到制约:轮船受时间限制,飞机受成本限制。建省 10 年内海南 GDP 年均增长 12.6%。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巨大的运输需求,岛内运量年均增长 33.4%,陆岛之间的运量年均增长 6.7%。随着海南“一省两地”战略的实施,陆岛之间的运输能力已不能满足海南与大陆经济交流的需要。海南岛内铁矿石、反季节瓜菜、饮料食品和尿素等物资和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大陆。随着热带高效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一批年产 60 万吨木浆、45 万吨合成氨、80 万吨尿素的工业项目陆续建成投产,陆岛间客货运输量进一步增长。另外,预计 2005 年岛内运输量将达到 7500 万吨,2010 年将达到 1 亿吨。如此大的运量仅依靠岛内既有的公路网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加强陆岛之间交通设施建设、提高琼州海峡综合运输能力,通过粤海铁路将岛内铁路与全国铁路网连成一体显得十分紧迫。

据了解海南境内的老铁路,还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海南琼崖支队,掠夺海南石碌铁矿,修建了 250 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标准非常低,线路条件很差,到 1945 年就停运了。解放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逐步改造这段铁路。但毕竟基础太差,只能改造成三级铁路,运营状况一直很差。同时,这条铁路与大陆并不相连,改造后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

粤海铁路通道从 1998 年 8 月 30 日开工,到 2001 年 12 月 28 日湛江段正式通车,再到 2003 年 1 月 7 日跨海铁路轮渡开通,“一线一渡”全线贯通,2003 年底南线铁路有望通车,届时,粤海铁路通道全线贯通。粤海铁路的运营模式采用了“一部两省”合资的建设方式。由铁道部占股 66.7%、海南参股 22%、广东省参股 11.3%的粤海铁路有限公司,将采取“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方式运营,计划在 2010 年进入投资回收期。

据铁路部门测算,粤海线火车轮渡最大载重量为 13600 吨,每艘渡轮单航次载重负荷约为 3200 吨(不计乘客重量),每艘渡轮每天可航行 12 个往返,这样两艘渡轮每年的饱和运输能力应不低于单向 1650 万吨和 2000 万人次、双向 3300 万吨和 4000 万人次。据海南省交通厅统计,以上数据意味着,粤海铁路修通后将使海南水上货运能力提高近 190%,所提高的年度客运能力相当于“九五”5 年水上客运累计吞吐量的 1.66 倍。

根据以往新线运营的经验判断，粤海铁路在投入运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会盈利。国家投资四十五亿元建设粤海铁路通道，最主要的目的是国土开发的需要。将祖国最南端的海南与全国的铁路网线连接，是国家投资战略的需要，因此即使前期亏损运营，也一定要投资建设。在渡轮运行初期，渡轮的列车载量不会太多，而可能以装载汽车为主，因为海南还不是工业省。如果以后火车和汽车的运载任务加重了，或出现火车和汽车等渡轮现象，那就可能会建造“粤海铁3号”甚至更多的跨海火车渡轮。

粤海铁路在大大提升进出海南物流量的同时，也优化了海南的物流结构，大大提升海南的物流质量和效益。飞机航班有限，船渡载客量少，还要受天气的影响，遇有大风大雨渡船就停运、飞机就停飞，而火车就不怕这些，而且也更安全，跨海火车渡轮可抗8级台风，从而保证物流的畅通性。粤海铁路的修通将从运力、运价、运输时间和物流环节四个方面同时明显改善商品流出、流入海南的硬件条件。

粤海铁路的修通意味着海南出岛运输能力一下子发生了由短缺到相对过剩的质的变化，海南运输业的主要矛盾也将由想办法把东西运出去而变为如何提高运输手段的利用率。

有关专家认为，粤海铁路的建成对广东往来海南的物流影响不大，因为运距在500公里左右、数量不是特别大的货物选择汽车运输最为合算，这也是目前粤琼两地物流的主要形式。此外，海南与我国其他沿海城市及国家之间的货物运输仍以传统的海运方式为主，而高附加值、鲜活货物的远距离运输则选择空运。

粤海铁路主要是为陆岛之间大宗、笨重、低值、到发地相对固定的货物提供了最佳运输方式，特别是海南与西南、西北、华北、华中等地区之间的货物交流，更能充分发挥铁路运输的优势。以出岛的铁矿石为例，海南铁矿工业储量为12377万吨，年设计能力为400万吨，尚可开采30年。其中近百万吨运往上海、天津、鞍山等地，还有140多万吨要运往其他地区。

如果时机成熟，海南还是要考虑修通环岛铁路，台湾和海南大小差不多，台湾就有一个环岛铁路。我们应当看到，如果海南修通了环岛铁路，它将比台湾环岛铁路更具有物流效率，因为海南的环岛铁路将与大陆铁路网相联的，而台湾环岛铁路只是岛内一个小系统，不能与大陆铁路网相联，它的物流效率就差远了。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第一，粤海铁路通道的开通，对于海南“一省两地”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海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基地以及热带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都离不开粤海铁路通道的作用。第二，粤海铁路通道所形成的海南标志性建筑既是海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海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第三，粤海铁路通道可以使海南融入“华南经济圈”，海南也可以利用粤海

■ 品出经济学三味

铁路通道分享“西部大开发”的成果，同时粤海铁路通道加强了海南“西部工业走廊”的成型。“走廊”给铁路提供了运输基础，铁路也将以自己的服务，为“西部制造”降低流通成本、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第四，粤海铁路在大大提升进出海南物流量的同时，也优化了海南的物流结构，大大提升海南的物流质量和效益。

第一，通过体制创新，用好铁路通道。海南是个大特区，体制创新曾经走在全国前头，粤海铁路通道在物流上已把海南纳入全国大循环中，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新的对策去研究新的形势和解决新的问题。第二，通过加强法制，维护通道安全。粤海铁路通道被称为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说明了它对海南的重要性。但是，粤海铁路通道还未开通道，已有不法分子对其侵扰有加。一是出现了少数黑社会对粤海铁路通道搞破坏的案件；二是粤海铁路尚未建成，一副指挥长已涉嫌贪污而落马。所以，通过加强法制，维护通道安全，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是非常必要的。第三，通过强化管理，提高通道效率。粤海铁路通道现处于试运阶段，将来稳定以后，还要启动客运，由于它对我们还是新生事物，有关人员一定要强化管理，提高决策水平，合理分配运力，提高粤海铁路通道的运营效率，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6. 构建儋州先进文化的几点思考

儋州位于海南西北部的中心位置，在海南省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南北带动，两翼推进，发展周边，扶持中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儋州就是“两翼”中的“西翼”，为了发挥好“西翼”的作用，儋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中等城市步伐，把儋州建成琼西文化中心的战略目标。为此，弘扬儋州先进文化，不仅是满足儋州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的需要，也是海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

一、儋州文化中的独特优势

儋州文化在海南文化中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其独特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氛围浓厚是儋州文化发展的基础

深受东坡遗风熏陶，儋州老百姓多喜欢舞文弄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的文化区域，被称之为诗乡歌海。“儋州自古歌如海，民歌胜似百花开，村村都有民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从这首广为流传的儋州民歌，足以说明歌海之盛况。儋州诗联词赋源远流长，不仅普及之广，遍及各乡镇，而且是日新月异，饱含哲理，多有警句。

赋诗作词堪称儋州人的一绝。据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介绍，该会已拥有 300 多名会员，而且活动频繁，不断推出佳作。近年来，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先后出版了《歌海浪花——儋州民歌选集》、《诗文选集》、《诗乡绿韵——儋州市生态文化颂》等专辑。

儋州独特的调声艺术是一项宝贵的文化资源，被誉为“南国乐坛奇葩”。2000 年儋州市成功地举办了万人调声赛歌盛会。儋州调声不仅是儋州民间文化的品牌，也是海南省民间文化的品牌，它担负着海南民间文化“冲出海南，走向

■ 品出经济学三昧

全国”的重任。

鉴于儋州独特而深厚的民间文化氛围，继 1997 年获得“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之后，2002 年又获得“全国诗词之乡”和“全国楹联之乡”称号。这些称号的获得是对儋州深厚的文化氛围的充分肯定。

（二）贫而好学的学风成为儋州文化的特色

贫而好学是儋州人自古以来养成的学风。谢有造先生在《儋州文化渊源与特色》一文中，引述了清代两例贫而好学的例子：

清代举人陈京本从峨蔓福花村自进王五岭垦荒边耕边读，自学成才，以书童身份陪人上京考举，考中第五名；清末琼台书院考试，佼佼者多为儋州子弟，中师讲了一名话：“儋州人陋才不陋”，评价颇为中肯。

儋州部分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干旱少雨，造成了不少家庭贫困，但子弟上学读书颇为用功。2002 年儋州义务教育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每年的中考和高考，儋州也常有不俗表现。

（三）人力资源潜力深厚是儋州文化的希望

在儋州文化熏陶下的儋州城乡人民，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的村民更加聪慧敏捷的才思特征。和儋州村民们交谈时，你会发现他们一个个思路清晰，声情并茂，颇有文化素养。

从儋州人唱山歌来看，儋州山歌的押韵相当严谨，深奥无比，好像没有高深的学问是不能掌握运用的，但在儋州人中间，无论是忙于耕渔的农夫、渔民，还是闲于家中的老妪、稚子，均可出口成歌，应对自如，歌手自古以来多如繁星。有一些老歌手虽然目不识丁，但以歌当言，其歌风如刀，多有警句，并且句句山歌都符合平仄音韵，不能不让人感慨儋州之地灵人杰。

深厚的人力资源潜力，为儋州培育了众多名家，且不说远的，当代就有专栏作家阮次山、军旅画家陈理之、版画家张地茂、评论家霍雨佳、数学家刘璋温、植物学家钟义、物业管理专家李卓章等人。今后儋州文化的健康发展将依赖于进一步培养和引进各种人力资源。

二、儋州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儋州文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缩影，凡事有利则有弊，儋州文化在其沉积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在形成了一些消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上的宗派械斗至今仍有消极影响

谢有造先生在其《封建宗派思想对儋州的危害》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封建宗派思想在儋州的产生与蔓延，影响与危害，以及历代儋州有识之士与封建宗派作斗争的积极意义。

受历史上的封建宗派思想和宗派械斗的影响，儋州某些地方居然传出这样的事件：农村基层组织收钱买枪买弹，设地下兵工厂，基层组织换届要交接枪支弹

药等等。这说明宗派思想已与暴力联系在了一起，这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

宗派思想有其历史的根源，究其根源，乃是一种封建残余文化，对于儋州的宗派思想的深层原因，儋州市委书记赵中社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儋州是中原文化到海南的第一站，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对他本人来说是惨事，对海南来讲是幸事，因为他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海南，所以我们儋州在海南历史上出了第一位进士符确，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儋州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但是，苏东坡带来的中原文化，是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它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文化，是和人治封建伦理联系在一起的。理学中有许多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但也有很多糟粕。比如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存天理，灭人欲’；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一套‘人治’的东西。宗族和宗派的东西，虽然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冲击，但仍然没有烟消云散，仍然有不小的市场。我们儋州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械斗，都是和宗族、宗派联系在一起的。”

宗派械斗是宗派势力的对抗，它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加封建残余思想的产物。小农经济条件下为什么易产生宗派势力的对抗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由于小农经济的活动范围狭小，人员流动性不大，生产和生活主要以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的，这就容易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疏关系；第二，在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个人生产能力有限，个人对家庭有较大的依附，而家庭对家族较大的依附，这就在客观上很容易形成，一个家族的成员受到外族的威胁，整个家族就会群起而攻敌，这就形成了宗派势力的冲突。

马克思在《19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讨论法国农民及其生产方式时指出，法国小块地生产是法国农民生产成本高和纠纷不断的根源。马克思这里说的情况不禁适用于法国，也适合我国以及儋州的农村情况。

（二）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风存在问题

在当今农村我国实行的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那就是村民自治。通过村民自己选举农村基层组织领导人，使广大村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儋州的农村干部整体是好的，其中还有不少长期深入群众中间，整天废寝忘食忙于工作之中的好干部，但在儋州的某些农村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村民和干部之间产生了矛盾，村委会的新老班子势不两立，甚至出现了改选两年多了还不能交班的情况，新班子指控老班子侵占公款、以权谋私、以权欺民等不法行为。这说明以权谋私的不良作风还在儋州一些农村存在。

（三）语言种类繁多不利于文化交流

儋州流行多种语言，据统计有儋州话、客家话、军话、临高话、白话、黎语、苗话、海南话，还有普通话。儋州80多万人口中，就有8种以上的语言，而且各种语言发音的差异很大，必然影响了儋州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正是由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于这个原因,和海南其他地区相比,儋州普通话还较为普及,在学校教师授课都用普通话,而在其他地方,教师授课多用海南话。进一步规范和推广普通话将使儋州在语言方面变劣势为优势。

三、兴利除弊构建儋州先进文化的几点建议

在正确看待儋州现存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必须做到兴利除弊,才能做到弘扬儋州先进文化。要构建儋州先进文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铲除宗派势力,肃清宗派思想残余

宗族和宗派的东西,既有思想上的根源,这就是封建伦理思想,也有经济上基础,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要从根本上铲除宗派势力,从思想上和经济上同时入手,双管齐下铲除宗派势力肃清宗派思想。

从思想上入手,首先,要让广大群众明白宗派思想和宗派势力破坏性,以及宗族械斗的危害性,比如,这样的观点就很生动:“家里有枪,家破人亡;村中有枪,全村遭殃。”其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去代替封建落后文化,去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这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将新思想、新风尚用山歌、调声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送给广大群众。

从经济上入手,首先,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农业的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小农经济生产成本低收益低并容易产生纠纷。而现代化农业讲究规模效益,讲究科技含量,它要求生产者有更多的知识、技能和市场适应力,现代化农业就其技术特征来说,是开放性的,它要求生产者不能只将视野限于狭隘地域,它也不需要家族的保护。因此,小农经济容易产生家族冲突的经济基础在现代化农业中就不复存在了。其次,在农业生产不断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同时,还要加快农业要素流动。农业要素流动主要是劳动要素的流动,在传统农业中,劳动要素流动性很低,大量农业过剩人口无事可作,又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这也是容易产生宗派冲突的主要经济基础。在现代农业模式下,农业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大多数的农业生产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迎进来,随着劳动要素流动加强,农业生产的效益不断提高,宗派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弱化。

(二) 完善农村基层组织,保障村民利益

在儋州的某些农村暴露的问题,表明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还需要加强监督才能更加完善,以权谋私的不良作风才能从根本上被遏制。这就要求:第一,要加强监督就必须提倡民主反对特权。现在农村干部选举时,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了,这是民主的最大的体现。村干部选出以后,民主还要继续贯彻下去,村委会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通过村务公开栏实现村务透明化,这样,如果村干部不搞特权,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就会受到群众拥戴。

第二,要坚决地推行法治反对人治。法是人们制定出来的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一个法制完备的法治社会必须是一个按规则办事的社会。长期以来,我国法

制不完备，形成了人治频频而法治松懈的社会环境，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可能更严重。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样的怪现象：在人治的社会里，老百姓只能盼清官，只有碰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才可以为民做主，但这又是多么的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法治的社会里，老百姓只管抓贪官，因为贪官伸手必被捉，按规则办事是最简单不过的了。所以，如果不按规则办事，就容易形成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在儋州的某些村，村委会当初刚选上时表现还不错，但干了一段时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有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考虑个人利益，就和群众对立了起来。所以，只有完善了法制环境，法治才能提上日程来，广大村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三）儋州文化建设可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将文化发展推向市场，通过供求的调节与经济效益挂起钩来，使儋州文化走向产业化发展之路，即可以把儋州文化当作产业来办，参与到经济体的交换活动中。

随着信息产业和社会化的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十几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

在这种背景下，儋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若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则不失为憾事一件。儋州文化的产业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儋州文化与儋州旅游相结合，既提升儋州旅游的文化含量，又赋予儋州文化以经济活力。相对于海南的旅游资源来说，儋州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儋州在海南的西部，与东部的大量开发相比，儋州旅游资源相对处于人未识的阶段，有进一步开发的價值；二是儋州与海南主体自然景观相比，人文景观物特点较为明显。不论是东坡书院，还是冼太夫人庙，人文景观价值极高。儋州可以将这些旅游资源的文化含量做足做够，促进儋州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二，儋州文化与影视业相结合，促进儋州文化产业开发。儋州文化中有众多的题材可拍摄成电影电视，从而创造效益。大家都知道，一部电视剧《刘老根》，带起了一阵东北农村旅游热。儋州也有这个条件，比如，谪臣文化是儋州文化的精华，据谢有造先生考察，早期迁儋的二十三个姓氏始祖，或受职，或被贬谪，或充军流放，他们来儋州传播文化，形成独特的谪臣文化。其中，北宋大文豪东坡贬儋三年，设馆办学，影响最大，近千年来，东坡遗风在儋州长盛不衰。这些都可构成影视题材大加挖掘。再如，关于儋州山歌、调声的民间传说也可构成影视题材，通过电影电视作品来反映古代儋州人民生产、生活的情景。电影《刘三姐》的成功，将广西壮族山歌和桂林山水的旅游价值呈现给了世人。这

品出经济学三昧

些都可以给儋州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第三,通过产业链条将儋州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儋州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某一产业为基础,稳扎稳打,不断做大规模,待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可以通过向前或向后一体化的方式,或将产业细化或将相关产业纳入其中,形成产业链条。比如,利用儋州多文人墨客的条件,撰写儋州文化作品,通过扩大对外交流,随着文化出版业的发展,一批优秀的影视题材作品便会产生,当其中的某些作品被搬上屏幕时,又会产生对儋州旅游的需求。如果这样,儋州文化发展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再如,松涛水库是一个水利工程,它既担负着发电、防洪、淡水养殖等多项生产功能,同时又是一个旅游景点。虽然松涛水库直属省里管辖,但它毕竟在儋州境内,儋州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松涛水库形成的产业链为儋州文化产业的发展服务,多功能开发松涛水库的各项资源。松涛水库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集雨面积达1496平方公里,水库库面辽阔,山峦翠叠,奇山异洞,景色颇为壮观,可以成为海南省西部旅游中心。儋州可以借助地利,进入松涛水库旅游产业链,围绕松涛水库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产业。

(四) 通过不断创新,促进儋州先进文化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指企业家为了得到超额利润而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的行为。他把创新分为五种情况:第一,引入一种新产品;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第三,开辟一个新的市场;第四,获得一种原料的新来源;第五,采用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成为经典,现在创新的概念不仅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广泛用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已成为两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我国土地制度创新过程。1979年我国实行了一项土地制度创新,那就是土地大包干制度。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土地大包干制度实际上是退步了,因为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还可以使用拖拉机、播种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而在大包干制度下,农民们放下机器又用上了沿用几千年的牲畜。大包干制度在牺牲了技术的同时却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经济环境下无疑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土地制度创新,农业收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我国农村改革由于在包干制度而获得了成功。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现在情况又有不同了,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入世与世界经济接轨。大包干制度的土地制度创新效应也已基本释放完毕,如果再不改革,我国农业生产将不可避免地受其制约。在国内外竞争更加激烈和产业化要求更加严格的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告别小农经济,走向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土地制度创新又开始了。2002年我国通

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的同时，肯定了在农村自愿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地流转，可以转包、转让、出租、入股和交换等。这一土地制度创新又适应了新形势的要求。

根据土地制度创新的启示，在儋州先进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快儋州文化的发展。

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文化发展，实际上在儋州已经初步取得成效。比如，通过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周”，在丰富儋州广大群众的文体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通过多形式、多层面的文化活动，向更多的人展示儋州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再如，由“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构成的“三下乡”，在儋州被发展为“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卫生下乡”、“理论下乡”和“法制下乡”构成的“五下乡”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制度创新。

77. 在逛街中体味集聚效应

在海口逛街不能不去钟楼、解放西和明珠广场。低档一点的“淘宝”，钟楼和解放西均有大型卖场，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帽等，上百家的店铺任你挑选；若是去高档一点的地方，海秀路的明珠广场和解放西入口的东方广场都有上下五层的商厦，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碰到搞活动购物券可以全场通用，整个商厦似乎都变成了同一家店子了。想一想全国购物都莫不如此，北京有西单、王府井，西安有东单，武汉有江汉路、汉正街，上海有徐家汇、南京路……全国各个大中城市都有自己的购物集聚地，市民们买东西都爱往那里挤。买电子产品也是一样，在海口不是去 DC 城就是去国贸路。零散的店子也有，但是谁都嫌麻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商家把店铺都集中到一块是有目的的。其中的好处店主们自然心里明白，否则这些地方的铺子的租金就不会比别处贵。除了学校、医院等多人聚集的场所门口被称作旺铺之外，这种商铺也是炙手可热的。其中原因不能不提商业街的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比如经济、文化、交通、人才、甚至政治领域。在经济生活中，它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由于某一区域内同一行业的产业链相对密集与完整，多企业，多环节相互融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区域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就会产生可观的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那里被称为外部经济。马歇尔把企业内分工而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内部经济，而把企业间分工而导致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的效率性能要来源于知识的外溢、中间品的投入和熟练劳工市场三个方面的因素。美国经济学家波特用集聚效应解释产业集群时，将产业集群的优势阐述为六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集群增强公司的生产力和创新力；第二，集群降低了交易费用；第三，集群方便企业获取专业化信息；第四，集群产生互

补性效益；第五，集群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第六，集群使当地的竞争更具动力。

商业街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老百姓最容易体会。首先，一个地区的商家聚集到一起提供有差别的产品，一个稳定的市场为商品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去解放西逛街商品又齐全又集中，而去零散的商铺跑来跑去就麻烦多了。顾客看中了商品，在隔壁的店子还可以比较，能讨价还价，何乐而不为呢？其次，由于同行商家在地域上的集中，有关市场的、技术的、价格的（这是最主要的）以及其他与竞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这一区域内迅速传播，减小了信息不对称，这不仅对商家的竞争十分重要，而且对消费者也是有利的。一般说来，在商铺集中的地方，人们砍价往往更容易，成交量也比单个商铺要大得多。再者，因为地理位置的集中，投资成本下降，政府也乐意为集中的商埠提供基础设施。同样的商铺，政府较少的投资可以获得税收、管理、品牌等多方面的回报。

推而广之，产业集群也是这样。产业集群即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内相互联系、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比如，浙江温州的中国鞋都、广东中山古镇的中国灯饰第一镇、东莞清溪镇的计算机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等。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也是产业集聚效应。

78. 海南产业政策的演变

海南从建省以来产业政策几经曲折，多次反复，龙头产业先由经贸业再到房地产业，又到旅游业，在经历了种种教训之后，形成了“一省两地，三足鼎立”的产业政策，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为“三不双大”的产业政策。

海南建省前后曾出现以经贸为龙头的产业政策。这要从海南建省前的一次事件说起。1984年中央为了开发海南出台了一个《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由于当时的海南地区滥用了这一政策，发生了著名的“汽车事件”，而使海南的发展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海南在建省之初还有两个方案：一个是1988年5月，由中日专家合作编制的《海南岛综合开发规划》；一个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调研组制订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两个方案对海南当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1989年学潮风波的影响，海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没能继续贯彻下去。

从1992年起，房地产业不知不觉地成为海南产业中名副其实的“老大”。以房地产业为龙头成为当时的海南产业发展的主导政策。房地产业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2年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房地产而来，而在海口市则更是高达60%以上。1993年下半年，随着国家加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过度投机给海南的地产和金融业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

1993年7月，海南省第二次党代会提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优化产业结构。海南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以旅游业为龙头，超前发展第三产业。这

时又形成了以旅游业为龙头的产业政策。1994年2月，海南省委二届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肯定了关于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业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思路。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依靠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良的设施服务，要靠全社会其他行业的支持，在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旅游业很难发挥出龙头作用。

1996年2月10日，在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将海南产业政策表述为：“努力把海南建设成为中国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新兴工业、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将成为我省三足鼎立的产业基石，实现兴岛富民”。这就是著名的“一省两地，三足鼎立”的产业政策。

在实施“一省两地”的过程中，海南产业政策不断被细化和深入。2003年12月，“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并明确了重点任务。2004年8月，《关于加快海南省新型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意见》正式提出，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同时提出实施大公司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加快工业重点项目建设。2006年12月，卫留成书记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始终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三不’原则，全面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集中布局，严格控制污染，决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由此，“三不双大”被称之为不同于“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海南模式”。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让经济学三味净化生活

——经济时评篇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79. 购物券利弊谈

在我国不少单位经常给职工发放购物券，特别是一遇到重大节假日，购物券更是满天飞。虽说消费者拿着购物券去买东西和拿着钱去买东西都是一样的消费，但不论在宏观方面还是在微观方面购物券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最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签发了《关于严禁发放使用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为什么要取消购物券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国内需求萎缩不振。如何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国内需求，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方面的热门话题。人们为什么不愿消费？一种说法是有效需求不足；一种说法是有效供给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说强调了人们不是不想消费，而是老百姓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消费；有效供给不足说则强调了人们不是没有支付能力去消费，而是因为适合消费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实际上，消费的实现既离不开有效需求，也离不开有效供给。因此，要真正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既不能没有有效需求，也不能没有有效供给。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要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而这两方面都不是短期内可以立马解决的。

为了解决内需不足，很多地区和单位采用了发放购物券的办法。购物券一般具有不流通、不兑换而且过期作废的特点。因此，发放多少购物券，就会产生多少消费量。不妨做一假设，如果每个单位都把职工工资之外的收入发成购物券，那么，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许就再也不会出现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假设，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执行起来也会遇到不少困难。比如，购物券发放多少为好呢？如果发放太少，比方说不超过职工的正常消费额，那么，这部分购物券只是代替了职工的部分货币支出，因而不会使总消费增加；如果发放太多，职工未必会没有意见。即使发放购物券真有一定程度的促进消费的作用，我们还应该看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到它所隐含的极大的弊端。首先，购物券的发放，极易发生经办人员从中谋取私利的行为，从而损害职工的利益；其次，购物券形式的行贿受贿要比货币和实物形式隐蔽得多，所以，购物券发放得越多，越容易滋生腐败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微观经济层面来看，购物券首先影响到作为消费者的职工的福利水平。具体怎样影响，这就要看购物券发放的具体情况了。如果是在收入之外发放的，也就是说，不发购物券也不会有相应的货币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发放购物券显然总比不发放对职工福利要好，这正符合“多多益善”的道理；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购物券并不是在收入之外发放的，也就是说，不发购物券就会有相应的货币收入，这时，职工的福利水平反而下降了。因为购物券通常要求消费者在指定场所和规定期限内购物，而这个指定场所和规定期限对拿到购物券的职工来讲，也许不是最合适的。而相同价值的货币发到职工手中，职工进行消费选择的余地更大，福利水平当然就更高。购物券对商品经营者方面也会产生影响。购物券所产生的定点购物效应，似乎有碍公平竞争之嫌。因为本来消费者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商家，这种机会对竞争中的各商家是均等的，如果大量发放购物券，就会使营业额大量集中在少数与购物券经办人员有关系的商家那里，从而助长了行业不正之风。

看来购物券的滥发确实应该被有效地制止，而由政府签发的购物券却可以成为救济贫民的有效调控手段。这也许是购物券唯一的积极意义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贫民，政府一般都予以一定的救济。有两种具体的救济方式：一种是货币方式；一种是购物券方式。虽然对个人福利而言，货币补贴方式总比购物券补贴方式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政府往往采用购物券补贴方式来救济贫民。这是因为，在需要救济的贫民中，诸如酗酒、赌博甚至吸毒之类的个人偏好往往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偏好的满足的确能给当事人带来个人福利的提高，但却使社会福利受到损害。政府不希望被救济贫民将货币用于这些消费之中，所以更乐意采用购物券的救济方式。比如，美国政府就有一项方案，向穷人提供食品券，使他们能以优惠的价格购买食品，另外还有学费减免，住房补贴等等也带有这方面的性质。在我们国家今后救济困难职工和扶贫过程中，也应该多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80. 机票打折中的悖论

衣食住行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要，乘坐飞机出行，舒适而快捷，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交通方式，但在我国它还并不是一种大众化的交通方式。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我国人民收入水平还较低，飞机票的相对价格水平居高不下有直接的关系。以中美两国比较为例，根据有关资料，按实际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人均 GDP 之比为 1 比 8，中美单位里程的机票价格之比大约是 4 比 1。这样，中美两国单位里程机票的相对价格之比则高达 32 比 1，这就决定了这样的事实，老百姓纵然想乘坐飞机，但却苦于实际支付能力不够而难以成行。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民航旅客的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因公务、商务和会议而出行的旅客；第二类是因私人旅游、探亲而出行的旅客。据有关资料，第一类约占民航旅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类还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我国民航业在私人消费方面还颇有潜力可挖。

为了促进我国民航业的发展，1997 年 9 月，民航总局曾推出了“一种票价，多种折扣”的政策，于是我国民航业内的竞争加剧了。1998 年中国民航业内的价格大战使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亏损，在此情况下，民航总局坐不住了。1999 年 2 月，民航总局出台了深受社会各界指责的“禁折令”，禁止国内航线机票打折，团体票最低允许打九折，散客不允许享受打折。

尽管民航总局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航空公司的利益，制止恶性竞争，但奇怪的是各航空公司似乎并不领情。“禁折令”出台以后，各航空公司暗中打折的现象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在各主要旅游热点城市，机票代售点的打折广告宣传令人眼花缭乱。机票暗中打折也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航空公司本身是商业机构，它是为盈利而存在的。在目前相对于我国民航运力过剩，从而客源较少的情况下，航空公司本身都有降低机票价格的内在要求。

■ 品出经济学三昧

因为航空产业的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这种成本在经济学上又被称为“沉没成本”，这部分成本不管你营运不营运，不管你运量大还是运量小，它都一样地要支出。对航空公司而言，“沉没成本”主要包括飞机购置费、维护费以及机组人员的工资等。“沉没成本”之外的另一种成本是“增量成本”，它是与运量大小相关的支出费用。就航空产业来讲，“增量成本”主要是汽油费以及提供给旅客的餐饮费。根据经济学原理，企业运营的理想状况是不仅能收回“沉没成本”和“增量成本”，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有所盈余。但在有些情况下，只要能收回“增量成本”，公司就有继续营运的价值。所以，航空公司只要打折以后的机票价格仍不低于分摊的汽油费和餐饮费，那么，通过打折增加的这个业务就仍然是有利可图的。由此看来，各航空公司本身就有机票打折的价格空间存在。

从对民航需求的角度来看，机票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价高量减、价低量增的需求法则是永远会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种产品的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大不相同，也就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各不相同。比如，前文我们谈到的第一类民航旅客，他们因业务的原因，不太在乎机票价格的高低，属于对民航需求缺乏价格弹性；而第二类民航旅客对机票价格变动是非常敏感的，属于对民航需求富有价格弹性。显然，航空公司实行一定的价格歧视的策略，即对两类旅客收取不同的机票价格，可获取更大的收益。通过对头等舱制定较高的价格，对经济舱制定较低的价格，可吸引大量的中低收入者乘坐飞机。从这个意义上，各航空公司在“禁折令”出台以后，仍然暗中打折的行为，并非只是相互争夺旅客的恶性竞争，其实它们本身就在创造自己的旅客，因为通过打折，各航空公司的上座率都提高了。

机票价格本身也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因此根本就不应该一刀切。拿同样的航线来说，航班机型有新有旧，起飞的机场有好有坏，服务的质量有优有劣，定票的时间有早有晚，人为地将机票定死，注定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虽然据民航总局声称，实行“禁折令”以后，民航业已经实现了扭亏，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禁折令”就是行之有效的。实际上，1998年民航业全行业亏损，也并非全是价格大战的后果，还要考虑到当时石油价格上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企业下岗职工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即使在1998年不也是还有海南航空公司等三家公司在盈利么？

航空公司有机票打折的动力，“禁折令”却不允许机票打折，因此就产生了暗折暗扣的不正常现象，并引发其他方面的混乱，比如，1000元的机票只收500元，旅客回去却可以按1000元报销。虽然民航总局先后曾公布了两批可以公开打折的航线，但其中打折航线少、限制条件多等特点决定了它还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所以暗折暗扣仍然是主流。针对愈演愈烈的暗折暗扣之风，民航总局不是从自身管制的弊端内省，反而采取了更激烈的管制。

2000年4月，民航总局又开始实行被媒体称作“怪招”的新政策——航线

联营。这种方案使各航空公司分配收入的依据不是各自的实际运量，而是民航总局核定的投放运力指标。据说这一将各航空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举措是为了遏制各航空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从根本上取缔暗中打折行为。也许民航总局真是用心良苦，但实际上，这种方案并不利于各航空公司的成长。这种制度让各航空公司劳心费力的不再是如何更好地经营市场，而是如何向民航总局申请运力指标，这是一种对过去计划体制的回归。

民航总局也许太害怕全行业亏损了，其实全行业亏损也并非全是坏事。市场经济条件下，全行业亏损也是常有的事，它逼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行业亏损引发的优胜劣汰、资产重组，造成该进入的进入，该退出的退出，有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比人为的“拉郎配”式的资产重组要好得多。所以，民航总局要真想为航空公司的成长着想的话，解除“禁折令”和“航线联营”，给企业提供一个理想的市场环境是唯一的出路。中国民航只有先经过内部市场的竞争与整合，才能经得起入世以后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冲击。

81. 谁决定了茶馆的暴利？

记者对海口的茶艺馆进行了暗访，记者花 39 元喝的“冻顶乌龙茶”，在茶叶公司明确标价仅有 3.4 元，利润高达 1047%。记者算了一下，其他茶叶的利润都在 1000% 左右。

记者的暗访曝光以后，就像平地一声雷，引起了极大关注。一方面是消费者大吃一惊，认为茶艺馆如此暴利是对自己的一种欺诈；另一方面茶艺馆也愤愤不平，认为自己没有赚到这么多钱。应该承认，海口的茶艺馆本身是良莠不齐的，但是只要在经营中做到货真价实、明码标价，那就不是欺诈行为，即使它赚了 1000% 的利润，也应该让它拿。因为茶叶买回来在自己家里喝，与到茶艺馆去喝茶毕竟是两个概念，这里边有服务的价值。一张纸加上一些笔墨，不值几个成本，但在有些人手里舞弄几下，便价值连城，这与其说是暴利，倒不如说是艺术的价值，也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茶艺馆的利润没有记者说得那么高，计算茶艺馆的成本时不应该只计算其主要原料茶叶的费用，还要考虑到租金、设备损耗、人工费、水电费、工商管理费、税金等等费用。这样来看的话，茶艺馆的利润远远达不到 1000% 的水平。但是，也应当承认，即使达不到 1000% 的利润，茶艺消费的价格，从而茶艺馆得到的利润也是偏高的。那么，为什么茶艺消费的价格居高不下呢？

在自愿交易的前提下，任何居高不下的价格差不多都是需求维持的结果，因为高价格或是高成本所致，或是高利润所致，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没有需求维持的情况下，如果是高成本，厂商要想生存就必须想办法降低成本，从而价格下降；如果是高利润，那么厂商要想生存就必须让利，从而价格也下降。所以，在海口茶艺消费高，主要在于在外喝茶的人多，虽然茶艺馆已经很多了，但出外喝茶的人更多。

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需求给出了买方愿意出的价格，供给给出

了卖方可接受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价格的形成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卖方得到了利润，买方得到了消费者剩余。在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买方的消费者剩余有可能被卖方攫取或部分攫取。

茶艺馆虽然并没有形成垄断，但是在海口由于对茶艺的需求比较旺盛，所以茶艺馆可以采取高额茶艺消费价格的方法攫取消费者剩余，这和垄断卖方通过价格歧视攫取消费者剩余方面如出一辙。

需求过分旺盛会使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到卖方那里，如果相反，供给过剩了，买方得到的消费者剩余也可能会扩大。比如，在一些清仓或换季甩卖中，买方支付的价格可能远远低于他实际愿意付出的价格，这是因为卖方的一部分利润甚至成本转移成为买方的消费者剩余。卖方和买方围绕消费者剩余而进行的较量，经常体现在讨价还价前的一幕：双方总是让对方先出价。

82. 农民毁田烧砖的背后

最近我国南方某镇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农村的村民把大片的农田卖给砖厂烧砖，砖厂挖土烧砖把农田基础设施也毁掉了，原来整齐完好的农田变得坑坑洼洼，令人惨不忍睹。有关人士对此痛心疾首，强烈呼吁：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耕地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任何毁坏农田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也有人说，受巨额利润的驱使，砖厂拼命扩大生产是农田被毁的罪恶根源，所以，要从源头上制止这一现象，就应该对砖厂进行管制，实现退砖还耕。还有人说，村民们将自己祖祖辈辈养家糊口的耕地卖给砖厂挖土烧砖，无疑于“杀鸡取卵”，实不可取。

诚然，以上这些批评和建议都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毁田烧砖的背后做些进一步的思考，可能更有意义。从表面上看，毁田烧砖起源于砖厂受巨额利润的驱使，扩大生产所致。但是否据此就可以简单地认定砖厂是罪恶之源呢？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砖厂扩大生产并非自生行为，而不过是整个经济运行的一个环节而已，它最直接的来源可能是建筑业的繁荣所导致的砖价的提高，建筑业的繁荣又取决于房租房价的高涨，而房租房价的高涨又是经济活动高涨和社会用房需求增加的一个结果。所以，简单地制止砖厂的生产，不仅会导致砖厂的破产，而且还必然会影响到与其相关联的其他产业。比如，砖厂停产，建筑业可能会停工待料，建筑业不能如期完工，各类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的短缺就会发生。看来，事情还得全面系统地考虑。其次，企业受巨额利润的驱使所做出的市场反应也不能一概都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来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也正是在这种方式下，社会资源自动达到最优的配置，即资源都被安排到了最具经济效率的使用方式上了。所以，在毁田烧砖这一事件中，砖厂和村民之间显然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这些耕地不是用来耕作而是用来烧砖更有利可图。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批评者认为他们是在“杀鸡取卵”。但重要的是，他们什么会“杀鸡取卵”？从宏观和长远的意义上，毁田烧砖的确是“杀鸡取卵”。但宏观和长远的问题是政府要考虑的，村民们更多的是考虑当前的利益。按此推理的话，房租房价偏高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无疑是毁田烧砖背后的根源。当调查人员询问村民们为什么要把耕地卖给砖厂时，不少村民的回答居然是：“种地没利，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卖了。”一亩地能卖多少呢？回答是5000元左右。由此可见，毁田烧砖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试想，为了5000元钱，村民就把耕地卖了。这一价格意味着什么呢？以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98%计算，这一价格也只相当耕地年亩产净利99元。也就是说，如果年亩产净利只要大于99元，村民卖地就是不合算的。但在农村目前农业投入低，成本高，农产品价格低的情况下，家民的农业生产净利是很薄的。这样，农民生产积极性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激励。

按照我国法律，土地是不能私自买卖的。在毁田烧砖的事件中，村民们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手段。将耕地卖给砖厂挖土烧砖显然是违法的，但将耕地挖成鱼塘养鱼却是合法的。因此，在我国南方某镇的农村便出现了大片的所谓“鱼塘”，这些都是挖土烧砖后留下来的。据调查人员了解，这些“鱼塘”在100个当中，有一个能养好鱼就很不错了。而今，这些“鱼塘”大都成了掩盖毁田烧砖这一事实的道具了。

由此看来，加大农业投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民收益，才是解决毁田烧砖此类事件的根本措施。假设耕地年亩产净利能超过99元以上，甚至超过5000元，村民们自然就不会去做毁田烧砖的傻事了。

83. 从杀猪示信说起

我国古代思想家曾子“杀猪示信”的故事多少年来一直被传为美谈：曾子的妻子要出门买东西，曾子的儿子哭闹着要跟着去，曾子的妻子就对儿子说：“你在家好好玩，等我回来给你杀猪吃。”曾子的儿子很高兴地去玩了。过了一会儿曾子的妻子回来了，曾子果然动手准备杀猪，曾子的妻子急忙拦住曾子说：“我与小孩子说着玩的，你干吗当真？”曾子很严肃地说：“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我们大人言而无信，又怎么能教育孩子成才呢？”曾子还是把猪杀了给儿子吃。

无独有偶，古书《庄子》也曾记载了一个“尾生之约”的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女子约好在桥下见面，那女子没有来，河水却涨起来了。尾生一直坚持等在那里，最后他抱着桥桩被淹死了。这则故事后来演变成两个成语：“尾生之信”和“抱柱之信”，都是正面赞扬尾生讲信用的。不过，这故事反过来看，就有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是那位女子。因为她的不讲信用而导致了尾生的死，那女子实在可恶！

从曾子杀猪示信到尾生舍生取信的故事，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诚信的孜孜追求，古之圣贤明君莫不重视诚信建设，唐太宗李世民力主以诚信治天下，他实行举贤不避仇，惩恶不避亲，开创了被后人赞为“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但反观今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诚信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之后，一方面我们刚刚告别了物资短缺的阵痛，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面临诚信短缺的冲击。

我们目前正面临哪些诚信危机的冲击呢？

首先是政府公信力危机。政府是社会的管理机构，如果政府不讲信用，则诚信危机的社会影响极大。举例来说，国际上对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数据的存有任何疑问，这一点我们自己是比较清楚的，统计数据多是有水分的，只不过是国外

的人没有注意到。2002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经济增长研究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罗就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一个质疑，他说中国宣布的GDP每年增长是7—8%，但农村经济这几年几乎是没有增长，那么城市部分需要负担40%多，增长率才能达到总和增长率。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史，没有任何城市能达到年增长40%的。可见，首先从政府讲信用势在必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按照我国的政治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都必须做出的一项政治承诺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有多少官员真正去践诺了？有些地方给农民打白条，或搞地方保护，都有悖于诚信原则。甚至有些官员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假公济私的工具，就更应该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审判。

其次是社会信用危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是非常重要的信用代表者，但是我国的行业协会本身却不具备社会信用。我国的行业协会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大部分的行业协会的会长都是由政府各级人事局任命的干部，都享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他是代表政府去管理这个行业的；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同时又代表企业与政府讨价还价，这样，行业协会本身就有了两面性格，它要在两者间不断地转换角色，两个角色说的话它都要说，这本身就是角色发生严重的混乱，它就不可能有信用。另外就是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为代表的中介机构没有社会信用。近年的所有股市丑闻及做假账案件，几乎都有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一个会计师要是造了假账，他就终身被禁止再进入这个行业。目前我国的会计惩罚成本不高，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关门停业以后，会计师马上又进入另外一家事务所，换个工作或者是换个名头，重新成立一个合伙人组织，照样营业。看来，要使我国社会信用有所改观，必须提高惩罚成本。

第三是个人信用危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诚信，说话不算数，已见怪不怪。至于耍心眼儿，玩手腕儿，到处下套，相互算计，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都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企业生产经营中不讲诚信，也已成了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病。虚假广告满天飞，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合同不能得到有效履行等等现象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人与人不一定讲信用，但还讲人情，正如我国有句老话所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大家对于同学、同乡、邻里亲戚是非常信任的。但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开始，“杀熟”这一现象产生了，并有越演越烈之势。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市场拐卖人口的案件，竟有90%以上是发生在同乡之间的。很多女孩子出来打工，骗她的人都说我们是老乡，你跟着我们回去，我们给你找工作。甚至还有叔叔拐卖侄女，邻居拐卖邻居等等。这些无不说明个人信用的危机到了非重建不可的地步了。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诚信建设就成了我国当代社会软环境重构中的重要内容。

■ 品出经济学三味

首先，诚信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让讲诚信者得到收益。简言之就是“让守信者获利”。个人信用一旦记录下来，我们要让个人信用记录好的公民在就业、消费以及社会地位方面得到优待。信用良好的企业在获得贷款、税收稽查、工商年检、海关验货方面给予方便或实质性奖励。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也要看其诚信表现，如果表现优秀，就要优先录用、提升或给予实质性表彰。总之，就是要让守信者获利。

其次，诚信建设更要让不诚信者付出成本。简言之就是“让失信者受损”。个人信用记录不好的人，一定要被排斥在当今主流的生活方式之外。在美国，人们都很在意自己的信用记录，因为一旦失去诚信记录，他就会被拒绝消费信贷，从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企业信用记录不好，一定让其在商业社会中无法立足。一个企业如果恶意偷税漏税或借款不还，就应该及时被社会清算，就像远华和安然之类！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如果不讲诚信，就应该马上被处理或免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作伪证而遭弹劾，差一点被赶下总统宝座。我国各级官员也应加强监督，让失德者无法容身。

最后，要使诚信被交易起来。前边所说“让守信者获利”和“让失信者受损”真正落实起来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都关心诚信问题，诚信被充分地交易起来。也就是说，要有充分的诚信的供给和需求。我们需要别人讲诚信，这是对诚信的需求；我们自己也乐于讲诚信，这是对诚信的供给。要使诚信的供给和需求结合并被交易，信用中介机构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在我国的某些发达地区，比如上海，个人征信服务已经相当发达。2000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社区信用档案正式启用，开我国社区信用体系建设的先河。2003年年初，海南省企业信用评价中心已正式成立，启动了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这一系统工程的第一步。

我们相信，只要社会各界人士都能行动起来，给社会诚信以肥沃的热土，那么，社会诚信之花开满我们的家园就一定能实现。

84. 经济学视角中的剥削

剥削一词本来是中性的概念，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剥削一词所作的释义来看，剥削（EXPLOITATION）乃开发一物之意，是指为某种目的而加以利用，可为社会福利或私人收益而开发自然资源。如果用于取利于他人，则开发一词也含有不道德之意。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使用该词时，赋予了剥削一词以革命性的含义，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的垄断而榨取别人的剩余劳动。如此，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几乎是剥削的同义词了。因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劳动者已不可能得到其全部的劳动产品，这时剥削已成为必然。受马克思这一剥削观念的影响，我国《辞海》（1989年版）将剥削释义为“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

这种将剥削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无偿榨取他人劳动之说，难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对剥削的这种深含贬义的定义往往并不能阻挡人们从剥削本身看到的积极意义。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实质上不过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这种合作毕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它在经济上的高效率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非要说工人是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与资本家合作的话，如下事实将使这一说法不攻自破：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打工一族”放着主人公的地位不做，挤着头皮跑到“三资企业”那里去找挨资本家的剥削？即使共产党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很早就看到了这种剥削的积极意义。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讲到：“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今天工人受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苦；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

品出经济学三味

透过剥削定义而看到了这种剥削产生的积极意义，说明了正确认识剥削的重要性。正确认识剥削并不是要粉饰太平，而是要正确定义剥削。剥削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对他人劳动的无偿攫取，这本身并不错，但界限的划分是关键。雇佣劳动并不天然地产生剥削，也不能保证不产生剥削。按照经济学中的欧拉定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按照各自的边际产品取得报酬，正好分配完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额。因此，工人和资本家都按边际产品取得报酬，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就能顺利进行下去。

劳动往往会受到资本的剥削。如果工人所得低于他的边际产品，那么工人就受到了剥削，因为别人无偿地攫取了他应得的劳动成果。实际经济生活中，资本和劳动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劳动可能处于弱势，就可能受到资本的剥削。比如，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或降低工作条件等都可能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品而受到资本的剥削。

资本也同样会受到劳动的剥削。虽然从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起点看，劳动处于弱势，因而容易受到资本的剥削，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剥削资本也早已从理论变为了现实。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兴起，所有权和控制权不断分离，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成了出资者以后，劳动强势资本弱势的时代就到来了。“内部人控制”现象成了劳动剥削资本的一种普遍表现。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天然地适合“内部人控制”的滋生，所以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劳动剥削资本已是多年的老问题了，不光资本得不到边际产品，就是资本本身也在不断地流失。只是资本是国家的，比私人资本有较大的抗剥削性。

剥削和腐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有相似的一面，即都是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但腐败和剥削有本质的不同，剥削其实是一种合法的行为，而腐败本质上都是犯罪行为。最后我们还得承认一点，依目前我们的社会情况来看，反腐败是比消灭剥削更为紧迫的事情。

85. “终身雇佣制”的启示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们的企业冗员过多，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即总是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而五个人反而不如三个人干得好。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职工处于当家作主的地位，拥有天然的就业权，年轻人即使一时安排不了工作，那也是“待业青年”。也就是说，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们手上捧得都是铁饭碗。

改革开放把效率放在了更优先的位置，它必然对这种天然的就业权提出严峻的挑战，从而，铁饭碗就必然被打破。减员增效成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也使我们累积了两千多万的下岗职工队伍。对许多人而言，“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渡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刘欢的这句歌词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无奈。

然而，当我们为提高企业活力而努力打破铁饭碗时，却不无惊奇地发现，我们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这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的企业也曾流行过“终身雇佣制度”。长期以来，“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内工会”一起，被称作日本企业管理制度中的“三大法宝”，成为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特点。

按照“终身雇佣制”，走出校门的日本的年轻人一旦就职于某一公司或企业，可以一直在那个企业工作到退休，中途一般不会被解雇。“年功序列制度”主要表现在工资和晋升这两个方面。根据这种制度，新职工进入企业后，其工资待遇按照资历逐年平均上升，没有明显的差别。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职工的工资待遇也是随着工龄的增加而持续上升，这是一种资历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则是以企业为单位组织的工会，它使企业和员工结成紧密的共同体。

我国计划体制下的“全民就业制”和日本经济腾飞时期的“终身雇佣制”从表面看来似乎都是一种“铁饭碗”，但深入分析起来，实际上两种制度还是存在

■ 品出经济学三味

着不小的差异呢!

首先,从基本经济制度上来看:我国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依法享有天然的就业权,只要他没有违法违纪,任何人无权剥夺一个公民的就业权;而日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其实并不是法律或成文规定意义上的制度。在日本的法律和企业制度中,也没有关于雇主必须实行终身雇佣制的规定,终身雇佣制不过是对二战后特定时期日本企业雇工惯例的归纳和概括。

其次,从微观基础上看:我国当时还不存在独立地位的企业主体,每个国有企业都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企业只需生产无需经营,生产资料无偿调拨,产出产品统购包销,所以,那时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日本企业基本上都是作为市场主体的独立的私营企业,它是真正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作的,它是讲求经济效益的。

第三,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我国的“全民就业制”推行几十年,终因陷入“大锅饭”和“物资短缺”的困境而改革,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使日本二战后成就了“经济奇迹”和“日本质量”的神话。

由于以上的差异,我们就不难求解日本“终身雇佣制”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取得成功的原因。其一,由于员工薪水取决于在一个企业的工龄,因此在日本员工很少更换雇主,而日本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很少裁员。这一方面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压力,一旦经济复苏,企业由于人员保持完整,能以最快的速度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控制了员工流动率,企业可以放心地对员工进行培训与开发,不用担心企业的核心技术资料在员工流动中流失,日本的员工因为不用担心企业在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与体制后会失去工作,他们以一种配合的态度来迎接新技术、新思想与新体制,这是日本企业屡屡在新技术与体制的采用上占尽先机的根本因素。其二,员工们知道自己的未来和企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未来的保障,便时刻把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未来真正联系到了一起。正因为如此,日本员工可以不可思议地加班工作,可以在下班后把未完成的工作带回家,可以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苛刻的加薪要求,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一旦企业垮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我国市场体制建立以后,我们的企业减员增效是正常的,但企业是不是简单地将员工推向市场?日本“终身雇佣制”应该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虽然在长期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的许多企业开始放弃这种模式,但是像丰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大公司还在坚持“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不是一种正规的制度,而是一种企业文化,通过这种文化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使员工对企业产生高度的认同感,是这种文化相对于其他管理方式的绝妙之处。

86. 赢家通吃的悲哀

说 中国的传统社会盛行的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规则，实不为过。古往今来，最大的通吃赢家莫过于弄权有方者。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中国森严的等级观念，既然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苦衷，所以就形成了“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世俗心理。为实现拥有权力的梦想，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动用了多少资源而为之博取！从“学而优则仕”起，中国已进入了官本位的怪圈。一个人只要解决了位置和权力的问题，一切就都不成为问题，这就是赢家通吃。如果一个人官做大了，很多规则对他就构不成多少约束了，很多事情自然会有下边人为他办好。他不用担心排队买票，不用忧心子女上学，也不用操心车子房子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还都要受制于一套套规则的束缚。当然，权力催生下的这样的赢家，也不是没有风险，比如，胡长清和戚火贵之流，虽然赢过吃过，但最终还是玩火自焚了。

第二类通吃的赢家当数弄钱有方者。中国的传统是重农抑商，但对钱的重视并不逊于世上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一个社会虽然有钱却买不到东西，人们固然会对其商业化和市场发育程度之低而抱憾；但倘若一个社会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的话，那么这种赢家通吃的秩序着实让人感到悲哀。古有卖官鬻爵，其中尤以清朝的捐纳制度为最，现有花钱买文凭，花钱买假球等等，这是用钱通吃了教育规则和体育竞技规则。

第三类通吃的赢家莫过于弄名有方者。本来名气是实力的一种体现。但一个人一旦成了名人，他也就成了可以通吃的赢家。对于他来讲，一路绿灯伺候的感觉真好！于是人们都盼出名，甚至为此而不择手段，归根结底都是赢家通吃给惹的祸！

最近人气颇高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刘翔，因雅典奥运会夺得了110米栏冠军，特被其母校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专业任选，且硕博连读，同时获得20万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元奖励。这又是靠名气实现赢家通吃的活生生的例证。刘翔为亚洲人争了脸，他是个极具天分的运动员。他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环。用这光环，如果刘翔涉足文娱、商业活动，人们也许不会有太多的非议，但若用来硕博连读，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怀疑。但刘翔自己却认为：“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如果他们（质疑者）能拿到奥运冠军，他们也可以硕博连读。我在体育上付出的太多了，没有时间读书，如果有时间读书，我肯定会读得很好。”（刘翔接受凤凰卫视时语）

此话就差矣！刘翔是个善跑之人，或许他也善读，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但你既然没有时间读，干脆就不要去图这个虚名，毕竟科学研究和体育竞技是两回事。这是其一。其二，就刘翔个人的资源禀赋而论，配置到跨栏运动中去是最好的选择，若论硕博连读，不知多少人比你刘翔强；但若论跨栏，惟有你刘翔。其三，刘翔的确在体育上付出了太多，但不要忘了，刘翔又是幸运者，因为金牌只有一个，多少人在为之付出，但并没有得到，只有刘翔得到了。其四，认为自己特殊就可以破例的想法行不通，虽然在跨栏运动上无人能和刘翔比，但天下也不是只有跨栏这一件事，天下也还有许多有绝活的人。如果每个这样的人都借口破例，这个社会也足以乱套了，规则就不成为规则了。所以，靠名气玩赢家通吃也是要不得的。

一个健康有效的社会是由一整套规则体系来维持运转的。赢家通吃则不时地将这些规则打倒，于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冒了出来。这样，社会就要花费资源进行重新磨合。在这种磨合中，可能有一些人得利了，但整个社会的效率却降低了，人类公平的标准也被践踏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定要打破赢家通吃的。从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来看，赢家通吃的这一套在很多地方都已行不通了。据说里根任美国总统时，哈佛大学就有拒绝将荣誉博士学位颁发给总统的先例；商界巨头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竟无法进入哈佛大学的同学会，因为他没有完成全部学业；飞人乔丹一代 NBA 巨星，其名气无人能比，也没有听说哪家大学送他博士头衔，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87. 我们为什么还不是节约型社会

当前全国在处于上下齐呼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形势下，而这最能说明的不争事实却是：我们还不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原本是一个以勤俭为美德，并将贪污和浪费视为极大的犯罪的国家，怎么到头来却连一个节约型社会都没整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思考之一：生活消费节约了，但生产消费却没有节约。

尽管我们在生活消费中可以做到省吃俭用，这也是我们在多少年的贫困中养成的习惯，但粗放经营和粗制滥造的生产习惯却使得我们的能耗居高不下。过去在我国很多苦贫地区，尽管农耕条件极其恶劣，但农民们仍然凭着力气广种薄收，收获着与其投入的力气和对环境的透支极不相称的产出，破坏了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想起来退耕还林。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数据，我国创造的 GDP 不足全球的 4%，但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 7.4%、31%、30%、27%、25% 和 40%。（2003 年）还有日本一家公司最近估计，目前中国每生产 1 美元产值需使用 800 克原油，日本为 130 克，两者相差 6.15 倍。而按标准煤的算法，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0.36 美元，而日本为 5.58 美元，世界平均值为 1.86 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 15.5 倍。在钢铁方面，中国目前在钢产量同日本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比日本多耗能源 4000 万吨标准煤。其差距可想而知。

思考之二：私人开支节约了，公费开支却没有节约。

在我们国家，钱到了私人腰包里，一般是很节约的，大多数的人都会精打细算，不会轻易浪费钱，但公费开支就大不一样了，据估计我国每年仅公款吃喝就浪费 2000 多个亿。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公共部门内下班后各类电器不关电源开关的现象非常普遍，仅此一项每年浪费的电能最高可达 12 亿度以上。全国每年浪费的电能价值可能高达 800 亿元人民币左右。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

■ 品出经济学三味

国约有 350 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 3000 亿元。政府不仅要为数量巨大的公车支付购买费用、司机工资奖金，还要交维修保养费、保险费等各种税费。由于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行等方面都存在着比私车高得多的成本，所以同样数量车辆，政府实际支付了额外的高昂费用。据调查，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 8215 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 5 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 14%。公费开支的膨胀导致财政严重浪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思考之三：个别行动上节约了，总体观念上还没有节约。

在我们的社会中，个别人在个别时候做到节约，这并不难，但难的是要形成一个事事都要讲节约的节约型社会，这可能和我们的观念和意识有关。在总体观念上，我们与节约型社会相差太远。一个节约型社会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是一个讲究规则的社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我们总是不把规则当规则。我们也能定很多规则，但规则不总是起作用，有时候人情比规则还重要，先来后到是最简单的一个规则，但我们经常是不排队的，碰到熟人就可以特别关照；还有的时候是权力代替了规则，就形成了特权与腐败。这是由我们的观念和意识决定的对规则的浪费，没有比此更不节约的事情了。

为了我们的节约型社会，我们真的需要唤醒民众对资源不足（包括制度的稀缺性）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节约意识和效率意识。

88. 当创新成为一种意识

当 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身份走进 21 世纪时，这诚然是“中国制造”盛行全球所带来的一种荣耀，但事实上我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的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又不免使我们汗颜。因缺乏自己的技术，我们不得不向外方每年支付巨额的专利使用费，我们还有很多企业因为非法使用别人的专利而受到起诉和索赔。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了创新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时下关于自主创新的话题在国内正被热烈地讨论却使人感到欣慰。

自主创新强调完全的知识产权，只有拥有了一种技术的完全知识产权，我们才能不受制于人。鉴于我们所面临的特定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的技术，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我们靠自主创新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核武器和发射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力量；我们靠自主创新实现了人造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飞行，从而进入航天大国的行列……这些都是我们的骄傲。

自主创新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宜成为唯一的强调，只要创新意识成竹于胸，通过合作或参与的方式实现创新可能是更为现实的选择。由于现代重大科学技术突破往往是多方人员共同参与协同攻关的结果，这样大家得到是相互可以分享的知识产权。几年前绘制人类基因图谱这一重大科技创新就是由多国科学家联合攻关的结果，我国科学家也承担了其中 1% 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创新意识是最重要的。

我们强调创新意识，不管是自主创新还是合作创新，都应该是一种自觉行动，其实创新就在我们身边。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可以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制造一种新产品。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圆了人类千百年来上天的梦想，就是这样一种创新。第二，引入一种新技术。英国科学家在绵羊身上所进行的细胞繁殖试验导致了“克隆”技术，这一创新引发了生物工程上的革命。第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三，采用一种新材料。当年电灯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灯丝用的是非常昂贵的白金制成的，电灯只能为富豪们使用，后来爱迪生选了一种竹子做灯丝，使电灯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一创新使电灯最终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庭。第四，发现一个新的市场。传说有两个鞋业的推销员先后来到一个岛上，第一个推销员发现岛上居民没有穿鞋子的习惯，就遗憾地回去了，而第二个推销员则惊喜地住了下来，给岛上的居民宣传穿鞋子的好处，最后在岛上卖了很多鞋子。这第二个推销员就是这个创新而获得了成功。第五，设计一种新的制度。汽车流水作业的“福特制”和科学管理的“泰罗制”，都是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对劳动加强管理而取得效率的创新，而股份公司制的设计则是一种以加强对分散的资本的管理而取得效率的创新。

创新的过程往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需要创新意识的不断推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反复探索过程，创新才能可能最终完成。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过程最能说明这一点。当年袁隆平偶然发现一处野生水稻稻穗饱满十分显眼，尽管当时理论界流行说法是水稻属于自花授粉，不存在杂交优势，但袁隆平凭直觉断定这是不多见的自然杂交水稻。袁隆平把那处十分显眼的水稻种子拿回去重新栽培，长成以后优势不见了。对此别人都很气馁，而袁隆平心理却有数，因为杂交优势是逐代衰减的，这正说明水稻杂交优势可能是存在的。

经过反反复复的实验以后，袁隆平将一种水稻花的雄蕊掐掉，再用另一种水稻花来授粉，就培育出了第一代杂交水稻，结果让人大失所望，这种杂交水稻的稻秧长得很旺盛，但稻穗却很平常。袁隆平反而从中得到了启发，这证明了水稻杂交优势是存在的，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是想办法要让水稻杂交优势发挥在稻穗上而不是稻秧上。

不知多少次实验以后，袁隆平他们终于培育出了体现在稻穗上的杂交水稻了。面对大家的狂喜，袁隆平却在发愁，虽然在实验水平上成功了，但在大量种植的情况下，水稻花授粉时，把每一个水稻花上的雄蕊掐掉要费多少人工啊！实验水平的成功并不等于实用意义的成功。

创新还得继续进行，又经过一番周折，袁隆平培育出了一种“雄性不育系”，这种水稻天生不长雄蕊，大量种植时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隔行间种，到授粉时节只需要两个人拿两根竹竿把“雄性不育系”与正常水稻夹在一起就完成了授粉。至此，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才算告一段落。

89. 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在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现代性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社会其实有一点反现代性。“现代性”在此有一种话语权，其最本源的意思是指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取向，但是我们恰恰在这方面存在文化上的误区。例如，我们一般来讲，长达几千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保守的社会，凡改革者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生产方式也是这样，从农村文化看，在西汉时期就基本确立了一套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农耕方式和农耕文化，但是从西汉到解放前，到改革开放前，这种方式沿用了两千多年，没有重大的改革。这又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我国不太具有对现代性的探求意识。

比较明显的一个制度即科举制度，从隋朝隋炀帝时开始，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到现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那么怎么来评价科举制度？应该承认从总体上来讲，通过这种途径提拔上来的官员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当然不是说各个朝代的状元做出了多大的成就。问题出在学科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把一批优秀人才等社会资源配置在完全不恰当的位置上，他们整天的活动主要就是吟诗作画，脱离了社会生产力。所以，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时候是不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是当世界范围内的开放格局一旦形成，物竞天择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思。在这样一种压迫之下，中国人现在不得不学会了面对现代性。学科结构已经改变了，有了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但在某些方面发展速度还很缓慢。这说明中国做学生是好的，但是做老师、做先生还不太合格的，这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从对文化现代性的掌控来看的。当我们的文化强势的时候我们不大善于做先生，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而且文化强势也是稍纵即逝。

可见，我们的文化很难做到“以我为主”。在物竞天择这种大的开放体系当中，要把握好什么是现代性，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竞争，必须“以我为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主”。由此，再反思西方殖民过程，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同样是先进文明的传播，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凡是西方文明开发之前未被开发过的地带的欧洲人民在殖民过程中做到了“以我为主”，以推行现代文明。但在现代性当中，我们民族的有特色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成果，得不到自己的尊重和承认，反而被一种较为野蛮的方式所湮没。这是在反思中国现代学科发展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的一点。例如当今汉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外国人都在参加汉语等级考试，很多国家兴起了汉语热，将来汉语文献在世界上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再度复兴的希望，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国民性和现代性的问题，有可能会再蹈覆辙。在物竞天择的社会环境中，越是开放，一体化问题越明显。现在，韩国对我们文化的干扰、影响很大，如韩国申请端午节等，就反映了在现代性的争夺当中的一些“以谁为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看着由祖宗创造的灿烂文化被别人拿走。当然，文化是需要发扬光大的，但必须说明“以谁为主”，这也是文化之谜。

90. 如此省钱为何没能奏效？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则案例。由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中，石油价格猛涨，当时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来分化对石油的依赖。到了 80 年代，美国东海岸的不少大学推出了一种能源节支方案。他们投入一大笔资金，购进了许多昂贵的设备，准备迅速地用天然气代替石油作为主要能源，以节约能源费用的开支。

到了 1990 年的夏天，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大学非常得意启动了能源节支方案，他们使用了以天然气而不是石油作为能源的新设备，并指望这一举措为学校节省大量经费。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令人们震惊的是，这些大学并没有省到什么钱。当这些大学收到能源公司的账单时发现，像石油价格一样，天然气价格也涨了不少，这些大学的行政官员们对能源公司非常气愤，并指控他们搞“价格欺诈”。其理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天然气没有影响，因此天然气没有理由涨价。

实际上，这些大学的行政官员们如果能够全面地掌握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和需求影响因素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正确地预测到这种结果的。按照供求定理，在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均衡价格的前提下，其他条件不变，需求变动会对均衡价格产生同方向变动，即需求增加，均衡价格上升，需求减少，均衡价格下降；其他条件不变，供给变动会对均衡价格产生反方向变动，即供给增加，均衡价格下降，供给减少，均衡价格上升。而需求本身的变动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商品自身的价格，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的偏好等等。

在“相关商品的价格”这一因素中，还要区分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种商品的需求与其替代品的价格变动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互为替代品的两种商品是各自独立地来满足人们的同一种需要，所以，一种商品

■ 品出经济学三昧

的需求与其替代品价格变动一定是成同方向变动的。替代品的价格上升，一种商品的需求就要增加；替代品的价格下降，一种商品的需求就要减少。而互为互补品的两种商品是结合在一起共同地来满足人们的同一种需要的，所以，一种商品的需求与其互补品价格变动一定是成反方向变动的。

在明确了供求定理和需求影响因素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对上面的案例做些分析了。是那些能源公司利用国际性的石油危机进行价格欺诈从而牟取暴利呢？还是那些大学官员们没有看清事实的真相？由于伊拉克入侵并继续占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科威特，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禁运。这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石油的供给的大大减少，根据供求定理，供给减少价格上涨。这一点没有人会感到惊奇，包括那些大学官员们。

还有一点，大学官员们也是对的，那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没有影响天然气的供给，但据此认为天然气价格不会上涨就不对了。因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虽然没有影响天然气的供给，但却影响了天然气的需求。由于天然气是石油的替代品，根据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当石油价格上涨以后，对天然气的需求必然同步增加。根据供求定理，即使天然气的供给没有什么变化，对天然气的需求增加了，天然气的价格必然会增加。现在可以断定，能源公司不必进行价格欺诈，价格机制本身就可以让他们牟取暴利。而那些大学官员们由于没有做出正确的预测，使得他们耗费巨资购置的转化设备，转向使用天然气所节省的能源费用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样大。

美国东海岸的那些大学的能源节支方案宣告失败，他们要想实现能源节支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更好地使用稀缺的资金，去开发研制或购买引进那些节约能源耗用量的设备，才是正确的能源节支方案。因为根据经济理论，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导致全面的能源危机，所以，用天然气去代替石油的思路是不正确的。作为成功的例子，在能源危机中日本汽车制造商首先做出了迅速和灵敏的反应，开发出了低耗油量的节能型汽车，这种车马上打入了美国市场，并保持了较大的市场份额，援引一份报告指出的：“从日本进口的汽车迅速增长，日本汽车制造商获得了直到今天仍然引以为荣的强有力的市场地位。”

91. 由吕布之死说起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还记得勇武过人而谋略不足的吕布与狡诈多谋的曹操。吕布白门楼兵败，为曹操所擒。吕布为了求生，悄悄地向当时曹操身边的刘备求救：“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点头答应了，然后吕布就对曹操说：“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曹操征求刘备的意见，没想到刘备却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刘备一句话提醒了曹操，结果曹操果断下令处死了吕布。

曹操向来爱才，那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说来也算个人才，曹操怎不想将吕布收归己用？但纵观吕布之履历，此人反复无常，曾两弑其主，显然曹操留用吕布风险极大，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为了避免风险，曹操才下定决心处死吕布。在经济学中风险是指决策人在各种不确定条件下面临的各种决策环境。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不确定性与风险是有区别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人知道各种可能性结果，但却不知道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而风险指的是决策人不仅知道各种可能性结果，而且还知道各种可能结果的概率。人们对风险的态度称为风险偏好，根据风险偏好不同，决策人被划分为风险爱好者、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

假定对于决策人有两种可选方案 A 和 B，A 方案可能得到 1000 元收益，也可能得到 5000 元收益，两种可能性的概率各为二分之一；B 方案可以确定地得到 3000 元收益。如果决策人是风险爱好者，他将偏好 A 方案；如果决策人是风险厌恶者，他将偏好 B 方案；如果决策人是风险中性者，他将对两种方案同等看待。从曹操杀吕布来看，曹操显然属于风险厌恶者。因为留着吕布，是福是祸还要以概率来确定，而处死吕布，却得到了无福也无祸的确定结果。曹操生性多疑决定了其风险厌恶的取向，其实曹操对于风险的厌恶从《三国演义》中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反映。曹操曾经行刺董卓不成，随机献刀，后被董卓

■ 品出经济学三味

识破以后被通缉，与陈宫一起逃难到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里，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错杀伯奢全家，面对陈宫的指责，曹操道出了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著名人生哲学。由此可见曹操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愿冒一点点风险。

在生活中像曹操这样的风险厌恶者应该是占大多数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来保险就是反映了风险厌恶的这一偏好。但是这个社会总是要有人去承担风险，通常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举例来说，你有资金，我有技术，我们两人决定合作成立一个公司，但涉及到公司股份安排时，就产生了一点麻烦。公司的股份是出资人对公司发展决策以及对公司盈利进行分配的依据。资金虽然是你的，但股份全部由你占有，我又不甘心仅仅做一个为你打工的角色；但要共同投资，我又没有资金，那我身上的知识和技术能不能入股呢？

通过咨询专家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知识和技术也可以折价入股，但通常情况下和资金的入股相比有两个困难：一是技术入股，对技术作价是很困难的，双方很难达成共识，二是即使能达成共识，技术入股和资金入股仍然处于不同的地位。对于资金入股来说，它有双重意义：一是资金作为资本金可以购买各种生产要素，组织生产；二是资金承担了风险，一旦经营失败，投入的资金可能会血本无归，而技术入股仅仅是投入了一种能力，虽然说知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金钱，但它毕竟不是生产力本身，不是金钱本身，而且要实现转化还需要多种条件才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承担风险，即使公司最后倒闭了，也丝毫不会损害我的技术和知识，长在我身上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完好无损，大不了我可以再另谋高就就是了。因此，我是不承担风险的。

如此看来，我想不仅仅以一个打工者，而且还以一个投资者身份与你合作，就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了。我们可以约定双方共出资，我的股份由我在公司运作以后，得到的酬金来购买，直到买完规定的股份为止。这样既保证了风险的对等性，也实现了我做投资人的愿望。

92. 从经济学看和珅的媚上欺下

近 来一系列清宫戏在荧屏上的播出，使人们对和珅这样的封建官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珅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虽然在于贪，但他却是建立在两大手段上的：对上奴颜媚骨，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对下飞扬跋扈，无所不用其极。从和珅特定的人生追求而言，媚上与欺下这两种手段其实是紧密联系的，若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破解，先要从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说起。

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都是一种对应关系。生产函数反映的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品的产量与投入的各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效用函数则反映的是消费者在一定偏好下，消费者消费不同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与从中得到的满足程度的关系。可以用公式来表示生产函数： $Y=f(X_1, X_2, \dots, X_n)$ ，其中 Y 表示产出， $X_1, X_2, \dots, X_n$ 则分别表示用以生产 Y 的各种要素投入；当然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效用函数： $U=g(Z_1, Z_2, \dots, Z_n)$ U 表示消费者得到的满足程度， $Z_1, Z_2, \dots, Z_n$ 分别表示各种用以消费的商品或劳务。

和珅将其大量的聪明才智用在了揣摩皇帝主子的心思上，他做到了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几十年如一日，以至于媚上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此处心积虑、劳思伤神能不辛苦吗？非也！因为和珅毕竟不是忠贤之臣，媚上对和珅来讲本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投入罢了。在和珅的生产函数中，假如 X_1 代表媚上的投入量，当然还有其他投入，用 $X_2, \dots, X_n$ 来表示。投入是为了产出，在和珅的生产函数中，产出的 Y 是一种势力，也就是说，和珅投入“媚上”，是为了得到产出“势力”，实际上和珅投入了并且也得到了，这就进入到了和珅的效用函数。

在和珅的效用函数 $U=g(Z_1, Z_2, \dots, Z_n)$ 中，假设 Z_1 表示和珅对下的飞扬跋扈， $Z_2, \dots, Z_n$ 表示和珅消费的其他商品或劳务，但我们这里主要分析 Z_1 ，由于和珅越能对下飞扬跋扈，他就越感到满足，这说明 U 对 Z_1 的一阶偏导数大

■ 品出经济学三味

于零。由于和珅势力越大，他越能做到飞扬跋扈，所以， Z_1 显然又是 Y 的函数，即 $Z_1 = h(Y)$ ，这样，和珅的效用函数就可写为 $U = g[h(Y), Z_2, \dots, Z_n]$ ，进一步还可以写为 $U = g\{h[f(X_1, X_2, \dots, X_n)], Z_2, \dots, Z_n\}$ 。

由此可以发现，和珅媚上欺下的行为有很强的关联性，他为了实现欺下，才不遗余力地去媚上，他在媚上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苦甚至屈辱，将会在对下的欺压中加倍补偿回来，所以，这就是和珅之流在极力讨好主子的同时，对老百姓则百般敲诈勒索，他们是先投入后索取，对上媚得越狠，对下就敲得越凶，以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福威。所以，像和珅这样的官僚就是典型的官场商人。

像和珅这样的官场商人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春秋时期齐桓公手下有一个厨师叫易牙，易牙为讨好齐桓公的口味，使出浑身解数，练就一手高超的烹调技术，渐渐取得了齐桓公的欢心，但日子长了，齐桓公也难免会有吃腻的时候，为使齐桓公尝鲜，易牙居然杀子烹调而进献。这种媚上的手段可谓无以复加了，但这种投入的背后不会没有回报的要求，果然，管仲死后，易牙与竖刁等拥立公子无亏，迫使太子昭奔宋，齐国因此发生内战，但算起来齐国还是坏在了易牙手里。还有越王勾践为了讨好吴王夫差，不惜为其尝便疗疾，最终感动了夫差，将其放虎归山，但勾践的这种媚上的投入最终还是获得了灭掉吴国的丰厚回报。

由此可见，媚上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像和珅那样，是为了在别处捞回更多；二是像勾践那样，媚上是为了麻痹对方，并最终干掉对方。和这两情况相反的是，对上级的忠心不为了一己私利所左右，但在形式上往往敢于得罪上级，像唐时的魏征和三国时的诸葛亮等，他们既无意于欺压百姓，自然对于其上级便无所畏惧。这些对于我们当今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和干部考察应该具有参考意义。

93. 己所不欲施于人

毛 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曾经有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蒋介石对毛泽东说：“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你来做总统，做总统累，我抓抓党务就行了。”毛泽东听了大手一摆说：“我也不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老夫子的教导，乃儒家思想中“仁学”的延伸：别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若反其道而行之，便是“不仁”。我国古代一则笑话讲到，有一个长工犯了错，财主要惩罚他，怎么惩罚呢？财主忽然想到自己最恶心吃肥肉，就罚那个长工吃肥肉，谁想到此长工天天吃糠咽菜少见油水，吃肥肉对他可是美差。财主对肥肉是“己所不欲”，可他偏偏要“施于人”，本是“不仁”，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偏好具有不对称性，财主无意间对长工“变罚为赏”，做了一件善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论其出发点是多么的好，但和现代经济理念却是格格不入的。按照经济学的观点，通过交换互通有无是增进人类福利的必然途径，然而交换的前提必需是双方的边际替代率不等，通俗地说就是双方对交换的对象评价不等，或者如刚才所说，人们的偏好不对等，套用老夫子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而人之所欲”。

正是因为人们对同一个东西的评价有所不同，通过交换才会改善当事人及整个社会的福利：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重要，通过交换别人得到了他很想要的东西，而我也得到了更好的东西，通过交换大家皆大欢喜。

通过交换这个机制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就是，一个东西一定要放在对他评价最高的人手里才是最佳配置。人们才说“宝马送英雄，鲜花赠美人”；生活中也常会碰到数个年轻人都对着同一个心上人争相表白：“天底下最爱你的人是我，你一定要和我在一起！”，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都来源于同一个道理。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按照以上道理推断，自己评价不高的东西与别人交换，也就是一定要将“己所不欲”的东西想办法“施于人”，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么又怎么解释人有时又要交换掉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呢？譬如，“杨志买刀”和“秦琼买马”的事又如何解释？他们不可谓不喜欢他们的东西，但当他们穷困潦倒时或紧要关头，生存和事业成了第一需要，“忍痛割爱”已成必然，对任何东西的喜爱都要让位到次要的位置。在这里道理依然有效。

有人曾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文，大批特批等价交换之说，认为交换其实是不等价交换，如果说交换是等价交换，人们何故做此无效之劳？其实此观点失之偏颇，等价交换乃马克思所强调的原则，其“价”乃指劳动价值，马克思也承认，“对于使用价值，交换能使双方得益”。即使不以马克思定义的价值为限，在自愿并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下，交换也是等价交换，这要从社会而不是个人的角度来看。比如，张三把某件东西以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李四，张三如果很满意，他一定认为那件东西至多值一块钱；李四如果很满意，他也一定认为那东西至少值一块钱。尽管他俩满意的程度可能不一样，但从社会的角度，同时考虑他们时，问题已经决定，他们的交换价值是一块钱（至多值一块钱和至少值一块钱同时成立就等于一块钱）。

如果不从经济角度，而是从道德思想的角度来看老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义，那也要具体而论。现代社会讲求自由和多样性，绝对地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事，则有可能好心办错事。比如，我不喜欢独身，就不断敦促别人娶媳妇，就未必行得通，因为也许对方是个铁杆独身主义者。儒家思想对东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我国尤为为甚，传统上“重农抑商”便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其实商人是最懂得“己所不欲必施于人”的交换道理，因为商人本质上就是把“此地不欲”的东西运到“彼地欲之”的人手里，这样既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又赚到了个人的利润。商人就是成功地扮演了交换的中介。

94. 对牛弹琴的后话

在 成语“对牛弹琴”中，首当其冲的是面对琴声而“伏食如故”的牛的无知或不可理喻，生活中人们说“你跟他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也是这一用意。然而，后来人们深追起来，牛可能是无辜的，真正的责任反而在于对牛弹琴的人。因为是他做事不看对象，才造成了牛们“伏食如故”的不协调场面。

对此现代科学技术显示未必尽然！研究表明，习惯听音乐的奶牛，不仅听到音乐就会自动走进挤奶室，每天每头还可以多产 0.5 公斤牛奶。据专家解释，音乐会让奶牛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安全，还可以刺激奶牛乳房腺体分泌，使它们能够高产，而且牛奶的质量也相对提高。

由此得到启发，既然音乐都可以用于养牛，那么其他方面的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大量用于提高养牛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养牛专业户们的种种大胆探索，无不闪烁着经济学方法的光芒。

经济学中有一个联合生产原理，就是如果同一个生产过程产出不止一种产品，生产者要获取最大的收益，就不能只从单个产品角度考虑，而是要从联合生产的多种产品的整体上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内蒙古开鲁县胜利村村民田荣合赔钱办酒厂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老田和村里大多数村民一样，长期从事活牛贩卖生意。但是从 2000 年开始，老田突然不贩牛了，而是投巨资在村里建一个白酒厂，又在酒厂边盖起了大规模养牛厂。老田生产出来的酒，在市场最高的时候也还是赔钱的。但是老田为什么还要办酒厂呢？原来老田发现了用酒糟养牛的奥妙。和普通草料相比，用酒糟养出来的牛不仅长得快而且肉质好，所以这样出栏的牛销路好价格高。所以，通过老田酿酒的生产过程，一方面产出白酒，另一方面也产出了酒糟，对于以养牛为主业的老田而言，酒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产出。由此，老田是在实践着联合生产的经济理论。

■ 品出经济学三味

按照经济理论,生产和流通是相辅相成的,流通不到位经济就不活,生产不到位经济就无本,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以说,把经济做大做强首先是从生产环节开始的,当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又要求一个强大的流通体系来配合。

内蒙古开鲁县胜利村在老田的带动下,实现了较大的经济转型。以前这里是以贩牛为生,主要是搞流通。现在按照老田的模式,不用到集市奔波贩牛,科学养牛的利润比贩牛还高,这就使当地多数乡镇都有了像老田那样办酒厂养牛的人。在他们的带动下,以前只出产普通牛肉的开鲁县已转型为生产高档牛肉的基地。目前这个基地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养牛产业集群。以老田为龙头,村里原来贩牛的人都开始给老田提供半育肥牛,到老田这里再用酒糟精心调养,确保牛肉品质不变,老田的育肥周期也缩短了一个多月,他腾出资金扩大养殖规模。这样,大家都从这个产业集群中赚到了钱,关系也更和谐了。

养牛产业带来的不只是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科学养牛撬开了循环经济的一番新天地。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王守红是安徽省临泉县长官镇人,和田荣合一样,老王也利用酒糟养牛,只半年时间,就净赚了一万多元。初试养牛就首战告捷,尝到了甜头的老王想得更远了。因为他发现经过晾晒的牛粪居然有很大的市场。根据老王的养牛规模,估计每年光牛粪收入就高达12万元。结果老王把牛肚子变成了“取款机”。几年下来光牛粪收入就高达几百万元,老王一年的牛粪成交量,竟占全国份额的半壁江山。当老王挣钱的示范效应发挥以后,市场竞争加剧,老王又开始在循环经济的道路上另辟蹊径,尝试用牛粪种植双孢菇。经过多次试验,老王成功地培养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无公害绿色食用菌,并很快打开销路,产品全部出口,远销四大洲十几个国家。

老王多年来坚持在牛粪上大做循环经济的文章,道路越走越宽广。在牛粪上实现了多种开发:牛粪晒干打包可当成商品出售,种过双孢菇的牛粪培养基还可以用来养殖蚯蚓,养过蚯蚓的牛粪,经腐熟处理,装进编织袋,可当活性生物有机肥出售,也可加工成养殖饲料出售。对于那些不能搜集的牛粪,则引入沼气池产生甲烷气体解决一家人的做饭照明取暖等问题,其中沼渣可替代化肥,沼液可替代农药,又可喂牲畜,施用沼渣和喷沼液的农作物不但产量高品质好成本低,而且无化学农药残留,是市场上紧俏的有机食品,剩下的秸秆再来喂牛。这样既减少了牛粪对环境的污染,又通过沼气池使牛粪转化为便利清洁的能源。循环经济彻底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

95. “为” 不是 “不为”

在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在魏蜀吴三国中综合国力是最弱的。虽然刘备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沾了帝室之胄的光，人们还是把刘备政权视为正统。从《三国演义》来看，作者罗贯中扬刘抑曹的倾向是昭然若揭的，这多少对在当时发展生产力做得最好的曹操有点不公平。若说才学，刘备远逊于曹操；如论勇猛，刘备不及孙权，但通过攻心战术笼络人心则是刘备的强项。以眼泪作武器，刘备居然能屡屡绝处逢生，逢凶化吉。靠此强项刘备终于以白手起家而立于东汉乱世，成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业。

刘备不是学者，所以不能像曹操那样为后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墨迹，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倒有一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名言为世人所传颂。此告诫的意义在于教育人们做事情：一方面要从小做起，积少成多，方能成就一番事业；另一方面又要防微杜渐，修身立德，才不至于误入歧途。这是在封建正统社会符合儒家学说的至理名言。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忠告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我们将这里的“善”泛解为一切好的事情，“恶”泛解为一切坏的事情，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还需要做出另一番思考。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但不能固守“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诚言，而且可能还需要具备“勿以善大而为”的气魄。“为之”还是“不为”，一定要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选择相比较意义上的“大善”，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举例来说，一位生命科学家每天去替环卫工人打扫街道是一件普通的好事，即“小善”，但他去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则是更大的好事，是“大善”。那么，在这位生命科学家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只能放弃“小善”而选择“大善”，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应的，“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只能在无需做出择一选择的情况下才是可行

■ 品出经济学三昧

的，但在很多必须做出择一选择的情况下，它就未必能成为行动的定律。对于一定要发生的坏事，正如俗话有云：“两害相衡取其轻”，这是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的。有些所谓的坏事如果不做，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坏事。

美国一位擅长对人类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贝克尔，曾对犯罪行为进行过经济分析。社会容忍犯罪是一件坏事，但在贝克尔的分析中，并非所有的犯罪活动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解决。

有些犯罪活动必须允许它的存在，因为解决犯罪问题是需要花费社会资源的。从经济学边际分析的角度来看，有些犯罪活动之所以能容忍，在于这些犯罪活动有可能：一是它本身危害程度较轻；二是要完全解决它而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至于即使解决了也不合算，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解决，“小恶”没了，“大恶”却产生了，社会反而得不偿失。

例如，社会发展中出现污染是件坏事，但一个社会倾尽全力治理了所有污染所付出的代价，与社会上没有污染而带来的好处相比，可能社会得不偿失，反而变成了更大的坏事。这样，允许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污染这样的“坏事”，我们不妨也可以“为之”。正如科斯所言：“如果禁止排放烟雾，伦敦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小山村。”

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不让人们多生孩子，对那些想多生孩子的人来说，不让多生孩子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如此说来，不让多生孩子是一件坏事，是我们不得不为的“小恶”，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小恶”，社会就会出现人口失控、资源紧张等等影响民族发展的“大恶”。看来，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不为小恶则难避大恶”。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刘备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需要我们有条件地调整为“勿以善大而为为之”，可能还有更大的“善”；“勿以恶大而不为”，可能还会产生更大的“恶”。

强调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这也是达到最佳经济效果的唯一方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我们不能去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另一方面，有些事情虽然痛苦，但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也不得不做。除了少数原则性的大事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解决之外，通常事物必然是要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其最佳的处理方式。

后 记

本书历经八年时间写成，其中融入了我对经济学的点点滴滴的感受与体会。写作的动机既简单又自然，那就是我所一贯倡导的，用经济学讲述生活中的故事。从故事或事件讲起，又必深挖其背后的经济学哲理，是这本书的风格。虽然涉及范围较广，但我保证每每都是有感而发的。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先后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在本书公开出版时，各部分的内容都尽量保持了原貌而未做大的调整，有些只是做了一点微调。这些内容都是在过去八年的种种特定背景中写就的，读者在读时应该能有所体察。本书成书之际，我想起了很多，特别是对此书有帮助的朋友。海南日报社的吴泽明先生在八年前邀我在《海南日报》开辟“经济茶座”专栏，并不时督促，才会有本书今天的规模；由詹小洪先生任执行主编的、山东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经济学家茶座》也是本书的摇篮之一。在此，我要谢谢他们的督促和帮助。同时，还要感谢“海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最后，还想说的是，本书的文字一经诞生，第一个读者总是我的夫人李师慧女士，她不仅帮我斟酌帮我校对，而且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能安心写出这些文字。这些想来是无法用感谢一词所能交待的。

李仁君

2008年10月28日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品出经济学三味

三味

上架建议 经济知识读物

ISBN 978-7-5017-8958-0



9 787501 789580 >

定价：39.80元